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季刊）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2018年第1期（总第135期）

主管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辑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9-88493140

电子邮箱：shekexuebao@nwpu.edu.cn

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印刷：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87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2447

国内统一刊号：CN 61-1352/C

定价：8.00元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战军 邬大光 刘献君
杨叔子 潘懋元

主 任
万小朋

副 主 任
尹晓煌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社教 万小朋 王海燕
车阿大 尹晓煌 边燕杰
任宗哲 刘第红 李 辉
杨云霞 张 军 张近乐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 丹 刘 怡 田 锦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月

目 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探讨

/ 白暴力 董宇坤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 杨云霞 刘 源 10

高等教育研究

个性化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 刘献君 15

“双一流”背景下研究型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专家经验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 李硕豪 富阳丽 22

以卓越计划2.0版为契机 推进高等工程教育改革

/ 刘志军 夏远景 朱 泓 35

牢记使命 创建新时代“一流课程”

——基于机械原理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实践

/ 葛文杰 40

“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

- 走进“一带一路”：跨体系的文明交汇与历史叙述
——汪晖教授访谈
/ 汪 晖 臧小佳 45
- 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之挑战
/ 何成洲 54
- 小问题，大历史：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
/ 李伯重 62
- 宏观丝绸之路，见识文明交融
/ 胡 戟 72

军民融合研究

- 军民融合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
/ 谭云刚 82
- 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初探
/ 栾大龙 薛 莲 唐 波 92

区域发展研究

- 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及路径优化研究
——基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的分析
/ 吴 刚 刘晓惠 冉淑青 98

CONTENTS

A Probe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ism productiv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 Bai Baoli Dong Yukun</i>	3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 Yang Yunxia Liu Yuan</i>	10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i>/ Liu Xianjun</i>	15
Research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ndergraduate Classroom Teaching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Word-class" <i>/ Li Shuohao Fu Yangli</i>	22
Tak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n of Outstanding Engineers 2.0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i>/ Liu Zhijun Xia Yuanjing Zhu Hong</i>	35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and Create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i>/ Ge Wenjie</i>	40
Reaching the “Belt & Road” Regions: A Trans-system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sections of Civilizations and Historical Discourses <i>/ Wang Hui Zang Xiaojia</i>	45
The Challenge of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i>/ He Chengzhou</i>	54
A “Minor” Issue but a Larger History: The “Western Exile” of the Emperor Yong Li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 Li Bozhong</i>	62
The Macro Silk Road Shows the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 <i>/ Hu Ji</i>	72
The Research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i>/ Tan Yungang</i>	82
Probe the Form and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 Luan Dalong Xue Lian Tang Bo</i>	92
The Research On The Growth Capacity Evalu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Market Subje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 Wu Gang Liu Xiaohui Ran Shuqing</i>	98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改版词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顺应媒体转型发展的新形势，落实推进“双一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新要求的今天，《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以下简称“学报编委会”）广泛征求国内外学者意见，组织专家深入调研讨论，决定将创刊于1999年的《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进行改版，于2018年西北工业大学迎来建校八十华诞之际，以崭新的面貌，更高的起点出版发行。

这是一次拥有明确办刊定位的改版。学报编委会对改版后的《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确立了以下宗旨：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推动理论创新，刊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贡献；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将本刊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学术性期刊。

这是一次具有崭新栏目设置的改版。改版后的《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要反映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专家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重点和前沿问题。主要栏目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和“军民融合研究”；还设有“科学与艺术”“区域发展研究”“国防科技与工业”等临时性栏目；同时将在精选基础上不定期推出“名家访谈”。栏目设置既突出重点，又体现特色，面向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征稿，同时为国内外相关学者提供学术交流、探讨的平台。

新时代展现新气象，新的一年，我们把全新的《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奉献给您。期待这份“新”意，能带给您一段充实而有意义的学术阅读体验。

是为改版词。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委员会

2018年3月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改版寄语

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位于古城西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之高校。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航空、航天、航海等学科之教学与科研，始终为国内前沿。西工大这所极具科学实力之高校也始终坚信，不仅要在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具有重大影响，也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在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位于古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工大，更愿肩负起传承丝路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之时代使命。

“学报”乃是一所大学科研水平与学术理念之象征。《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具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和学有所长的编委及编辑团队，有体现鲜明地域特色和学校特长的专栏。《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将秉承自由原创、追求真理的学术探索，坚持开放包容的情怀，牢记提供思想文化资源的初心，进一步发挥人文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我们相信，改版后的《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必将为西北工业大学建设“双一流”大学和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伟大事业添彩助力。



2018年3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探讨

白暴力 董宇坤

摘要: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我国发展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以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人民主体,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加强社会各要素的整合与协同发展,实现国内经济高质量、动态协调发展;积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03-07

生产力布局是生产要素与经济资源的合理分布与配置,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大气磅礴,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布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出发点

生产力布局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就是在生产力布局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

场”^[1]。这就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要以人民主体为原则展开。

(一) 人民主体决定生产力布局的目标

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11-12]}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现实基础,要适时根据发展变化了的经济现实进行全新的生产力布局。

人民就是人民群众,主体就是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利益。坚持人民主体决定了生产力布局的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社会主要矛盾下,人民主体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经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ZZD028。

作者简介:白暴力,男,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二级),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董宇坤,女,天津人,经济学博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信息管理系副教授,从事经济理论研究。

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获得更多获得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23}。

新社会主要矛盾下, 坚持人民主体, 就是坚持“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2]23}, 这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 人民主体决定生产力布局的效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要通过对社会生产力进行合理调整, 充分、有效利用社会经济资源,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才能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是否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结构优化和水平提升是生产力布局成败的关键。人民(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重要和唯一能动的因素。坚持人民(劳动者)主体, 充分尊重劳动者的地位和贡献, 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的前提。因此, 人民主体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效率。

劳动者在劳动进程与生产力发展中发挥主导和能动作用。首先, 人民(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因素。“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3]201-202}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自始至终都在劳动者目的的指导下进行, 按照劳动者的需要而展开。其次, 人民(劳动者)是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 其中包括: 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3]53}。其中, 劳动者素质技能水平是关键因素, 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方面。此外, 马克思还认为,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204}。可见, 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资料, 或者说是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量。劳动者对于生产过程的热情与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都决定了“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才能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目标任务。人民(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生产力布局的效率, 进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以及劳动热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只有在人民主体的主导下, 才能更有效率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三) 人民主体是检验生产力布局的标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改造和地域协调发展, 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产力布局工作的成败以是否更好地坚持人民主体为检验标准。人民主体作为检验生产力布局成败的标准可以具体化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生产力布局是否有利于增进民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2]23}。增进民生包括: 真正做到贫困地区脱贫、帮扶弱势群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做到兜住底线;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做到“幼有所教、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23}, 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居乐业。有利于增进民生的生产力布局才是真正合格的生产力布局, 才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布局。

第二, 生产力布局是否有利于人民素质技能的提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日益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 人民的需要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领域, 而转变为更加高层次的需要。这就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物质生产上满足人民的安居乐业, 还要全方位满足人民素质技能提升的需求。生产力布局要着眼未来, 积极构建人才培养机制, 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为人民提升素质技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成败的标

准在于是否增进民生, 是否有利于人民素质技能的提升, 总而言之在于是否坚持人民主体。

人民主体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目标与效率, 是生产力布局成败的检验标准, 因而, 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出发点, 人民主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主导思想, 表现为通过充分、平衡发展生产力, 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高质量发展中的生产力动态协调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适应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决战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工作的重点就是要通过崭新的生产力布局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 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以人民主体, 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开创了国内生产力动态协调新思路, 即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观为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 以实现国内生产力充分、平衡发展, 增加人民福祉, 推进经济高质量、动态协调发展。

(一) 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总原则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要求, 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表现为实现国内生产力的充分、平衡发展,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次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强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作用。国内生产力的充分、平衡发展要在“五位一体”的原则下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1. “五位一体”总原则与国内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以“五位一体”为总原则, 即在国内生产力发展方面充分发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这五方面的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 以实现国内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拓展了生产要素范畴。在传统经济理论中, 生产要素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生产力要素的理解进行了拓展, 除了坚持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外, 还创造性地将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因素纳入到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体系中,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要素内涵, 为新时代生产力充分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丰富了发展生产力的途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 使发展生产力不再仅仅局限于三大产业上, 不再限于经济领域, 而属于整体的社会范畴, 民主法治的进步、思想文化的发展、民生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等都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充分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实现途径, 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新思路。

2. “五位一体”总原则与生产力的平衡发展

坚持“五位一体”总原则有利于国内生产力的平衡发展, 有助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主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五位一体”总原则下, 国内生产力布局应充分重视全面协调发展, 致力于区域协调发展; 积极利用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发掘各地的比较优势, 加强各地的合作共赢, 优化生产力结构、均衡地区生产力水平。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布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原则, 坚持平衡发展理念, 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等方面下功夫, 在发展中不断补齐短板, 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动态协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习近平同志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2]30}。这就要求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生产力动态协调发展, 解决新的社

会主要矛盾,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内生产力布局的思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 提升生产力水平, 另一方面注重解决结构性问题, 通过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 推动生产力的平衡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向与国内生产力布局所追求的生产力平衡、充分发展是一致的。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结合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一方面从供给方入手, 注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从结构性入手, 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要素的再配置, 提高经济效益与质量, 实现生产力的平衡发展, 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动态协调发展。

2. 国内生产力布局的途径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 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 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 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不仅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途径, 还要依靠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也是国内生产力布局的主要途径,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根据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作为国内生产力布局的主线, 从供给侧、结构性入手, 通过新经济增长点的培养, 提升生产力水平; 通过内涵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增强资源利用的效率; 通过产业结构的转移, 实现区域内现有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通过创新驱动, 增强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与活力, 从而实现国内生产力的充分、平衡发展, 解决新的社会矛盾, 实现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经济的高质量、动态协调发展。

(三) 以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旧突出, 直接影响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效率和水平。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在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基础上, 发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其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课题, 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内容。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 探讨区域协调发展实施路径。

1. 注重区域间的共同发展和功能互补

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僵化发展模式, 坚持合作共赢理念, 力争实现三个地区的共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注重功能互补。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6]。三地的功能地位是“北京市: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天津市: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河北省: 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6]。

2. 注重立体化、错位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除了注重以往社会分工领域中的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产业梯度的有机转移对接、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等经济因素外, 还特别强调, 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要以立体化方式展开, 具体表现为交通一体化、人口流动一体化、社会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 真正实现三地的有机融合、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对接, 实施错位发展既有

助于疏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又有利于河北的经济基础的强化与经济增长极的培育,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注重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北京、天津、河北共同面临着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等社会生态问题。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强调注重三地间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控。三地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有效布局有机结合,开创了新的绿色发展模式。

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受“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观统领,注重全社会、全要素的系统化发展;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生产力合理布局;以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缩小差距共同发展,实现生产力布局的国内均衡,以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动态协调发展。

三、全面开放中的生产力国际布局

全面开放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全球生产力布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发展对外交往、开展全球化活动。全球生产力布局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核心,重新调整各国关系,追求从更广的范围实现分工协作、合作共赢,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一) 全球生产力布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全人类谋幸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访问时第一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化和国际交往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日益成熟,这是向世界各国贡献的中国智慧。全球生产力布局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

1. 全球生产力布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要求全球生产力布

局要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全球生产力布局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导的生产力布局。资本主导的生产力布局,受资本的支配,人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为了追逐利润而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资本的生产力布局,是资本“血腥”进行掠夺的过程,是为过剩的产品和资本寻找市场的过程。而全球生产力布局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主体为指导思想,目标是全体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全球生产力布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目标回归到人民自身。

只有将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全球生产力布局才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才能摒弃旧有的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才能真正激发各国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为各国生产力水平提升提供充足的动力,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2. 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为核心概念

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生产力布局的集中体现。“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围绕“开放、包容、互利、共赢”这四个核心概念。“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74]“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74]全球生产力布局强调的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追求的目标是合作共赢,致力于在全球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全球生产力布局,符合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国际

大趋势;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核心概念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世界人民一道革新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世界各国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求,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二) 全球生产力布局充分尊重和利用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各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的不同一定会在发展中留下印记,表现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从而使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3]390}。这也就是说,不同国家按照各自的发展轨迹运行,导致生产力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

全球生产力布局充分尊重差异。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世界市场的经济合作得以发生;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为全球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合作空间。全球生产力布局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差异发展国际贸易、进行国际生产技术转让和产业结构转移,形成多层次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构建有层次的有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各国间可以互通有无,互相提供市场,互相补充,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国家间的合作日益全面深化,影响日益加深。这些互利互惠的国际经济关系还会逐步渗透到各国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促进各国经济更快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三) 全球生产力布局中贡献中国力量

全球生产力布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推进全球人民同心协力、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积极为全世界贡献了中国力量。

中国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差、底子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

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取得的成绩令世瞩目。

“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2]3}各项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这些成绩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具体实践开创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崭新模式,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中国道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模式。

中国在不断取得经济成就、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提供发展红利。在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生产力布局,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仅2017年,中国与11个国家签署15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文件;中欧班列开行近7000列,运行线路57条;与“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建有34条跨境路缆和多条国际海缆;前三季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0.1%,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企业2893家,同比增长34.4%;中国与58国签署各类投资贸易协定,“单一窗口”综合简化率达59%;亚投行成员数增至84个,批准20多个投资项目,总额超37亿美元;丝路基金已签约项目17个,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达800亿美元^[8]……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诸多的资金和技术,积极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贡献着中国力量。

全面开放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全球生产力布局,坚持人民主体和人类共同利益,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进行协调合作,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劳动者的自由发展,拥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和更广阔的前景未来,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以人民

利益为出发点, 坚持人民主体,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新形势的特征与发展需求, 适时调整国内充分、平衡发展生产力布局思路、拓展生产力布局的国际视野, 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生产力水平的最大提升, 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有力支撑, 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N]. 人民日报, 2015-11-25 (1).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3]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4] 坚守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立场——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劳模表彰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N]. 人民日报, 2015-05-02 (1).
- [5]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5-10 (1).
- [6] 邓琦, 金煜, 饶沛.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获通过 [N]. 新京报, 2015-05-01 (1).
- [7]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N]. 人民日报, 2015-03-29 (4).
- [8]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 “一带一路”的2017 [EB/OL]. (2018-01-12) [2018-01-15]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3662.htm>.

A Probe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ism productiv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Bai Baoli Dong Yuku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ism productiv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akes the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we must maintain the people's principal position in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meet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strengthens th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elements of society, and achieves high-quality and dyna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ism productiv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ctively establishe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ness. The socialism productive forces layou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laid a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vity; Marxis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杨云霞 刘 源

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10-0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这艘已高速行驶的巨轮靠什么能保持其未来发展的持续力,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未来继续引领中国的发展,在于中国的未来会对世界的发展产生哪些深刻的影响。而回答这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最新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于十九大报告,融入新的党章,也已经载入我国的宪法。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科学社会主义未来发展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对于我们看清世界发展趋势,明确历史方位,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

一、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现实制度的批判继承与对美好制度的设计,是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正是围绕着全人类解放的目标展开的,迄今已经有502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正在新的实践中实现着自我的丰富和完善而更趋成熟。1516年以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式诞生,在300多年的发展中,诞生了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杰拉德·温斯坦莱、梅叶、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克劳德·昂列·圣西门、夏尔·傅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政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ZZD008;陕西省社会科学院2018年度重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对‘三农’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研究”。

作者简介: 杨云霞,女,山西稷山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刘源,男,湖北十堰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陕西省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叶和罗伯特·欧文,在他们的著作中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论证了未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对未来制度的构建提出了一些积极合理的构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启示,特别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1]。但由于处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的哲学思想共同局限是唯心史观,“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元素”^[2],因而无法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深刻背景下,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而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上,阐述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式和一般特征作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但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主要是理论上的,如何付诸实践,是后来人的使命。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先进制度纷纷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这两次飞跃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曙光。但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又成了新的历史课题。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艰辛的探索,但并未交上满意的答卷,伴随着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到重大挫折。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出路在何方?20世纪初,正是在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与探索,使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坚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

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经过97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新的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创新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什么时候结合得好,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取得成功,什么时候结合得不好,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遇挫折。中国革命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指导革命的实践却是在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中得出的。面对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认真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和对策。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总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

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早期我们向苏联学习促进了国家建设，但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越来越显现出诸多的不相适应性，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使苏联模式的弊端进一步显现，逐渐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模式的迷信。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3]并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20世纪末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担和希望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作为第二个大国能否建设好、发展好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继续前行，受到世界的关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的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针对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进行伟大的探索实践，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历史方位下，不变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尤其是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反映新时代实践发展需求的理论创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等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我们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有信心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既需要中国在这条道

路上健康地发展,也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出更多的花,结出更多的果实,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理想。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的健康发展来讲,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讲,它为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最新国家治理方案和制度蓝图。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出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我们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基于这一科学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紧扣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基于这一科学的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确立了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等,是我们党完成新时代“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根本遵循。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有三点:一是为世界各国的治理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中国模式;二是为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提供可以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纷纷发来贺电祝贺,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2017年11月16日,应邀出席“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与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的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阮春强在会上发言时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思想和方案。中国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经验,也是中国的智慧。中国开辟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了新的样本和选择,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也提出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以坚持不懈地从严治党来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中国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值得越南借鉴^[5]。三是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事务,

为建立新时代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正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在全球治理中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当前，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谱写更辉煌的乐章。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24.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
- [5] 荣蓉.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所长: 中共十九大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EB/OL]. (2017-11-17) [2018-01-05] <http://news.cri.cn/20171117/a53999ec-e932-e294-279c-758a812d84c7.html>.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Yang Yunxia Liu Yuan

Abstract: A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our Part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has realized another advan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our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socialism develop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ought and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the guiding ideology that our Party and nation must adhere to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the world.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Scientific Socialism; Historical Position

个性化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刘献君

摘要: 开展个性化教育,首先要弄清个性、个性化教育的内涵、特征,明确开展个性化教育的深远意义。个性一般具有倾向性、复杂性、独特性、发展性、积极性等特征。个性化教育是尊重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发掘个体生命的潜能、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独特个性,促进个体生命自由和谐发展的教育。个性化教育是对教育真谛的深刻领悟,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诉求,有利于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开展个性化教育要立足“生本”教育,基于和谐教育,突出自我教育,体现渗透式教育。

关键词: 个性; 个性化教育; 和谐教育; 渗透式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15-07

2010年,我国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1]自此,部分高校开始探索个性化教育。开展个性化教育,首先要弄清个性、个性化教育的内涵、特征,明确开展个性化教育的深远意义。

一、个性

个性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语Personal,开始是指演员所带的面具,后来指演员——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人。一般来说,个性就是个性心理的简称,在西方又称人格。对个性有多种理解,例如:

个性就是个别性、个人性,就是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这个特质表现于外就是他的言语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等,任何人都是有个性化的,也只能是

一种个性化的存在,个性化是人的存在方式。

个性可界定为个体思想、情绪、价值观、信念、感知、行为与态度之总称,它确定了我们如何审视自己周围的环境。它是不断进化和改变的,是人从降生开始,生活中所经历一切的总和。

个性就是个体独有的并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的整体特性,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稳定的、本质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一个人共性中所凸显出的一部分。

个性是类特性、民族性、阶级性、地区和社区特点、教育特性和时代特性在具体的个体身上的独特组合。在某一个人身上,它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不同的个性。

无论以何种方式理解,个性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倾向性: 个体在形成个性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出每个个体对外界事物的特有的动机、愿望、定势和亲和力,从而发展各自的态度体系和内心环境,形成了个人对人、对事、对自己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个性倾向。

复杂性: 个性是由多种心理现象构成的,这些心理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别人看得清楚,自己也觉察得

作者简介: 刘献君,男,湖南宁乡人,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华学院院长,从事高等学校管理、大学德育、院校研究。

很明显，如热情、健谈、直爽、脾气急躁等；有些非但别人看不清楚，就连自己也感到模模糊糊。

独特性：每个人的个性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是同卵双生子甚至连体婴儿长大成人，也同样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性。

发展性：婴儿出生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随着其成长，心理不断丰富、发展、完善，逐渐形成其个性。从形式上讲，个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心理发展的产物。一旦形成，个性就具有相对稳定性。

积极性：个性是一个动力倾向系统的结构，不是被客观环境任意摆布的消极个体。个性具有积极性、能动性，并统帅全部心理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认识个性，还要把握以下三个关系：

（一）个性是独特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独特性是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是人的生命属性。任何事物，它都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它跟其他事物不能区分。共同性是人类群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的典型特征，如人性、阶级性、民族性等。一个是独特性，一个是共同性，独特性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区别的特征，共同性是所有人共同的典型特征。

唯物辩证法认为，“共性”即普遍性，“个性”即特殊性，两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另一方面，个性也离不开共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如何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总要服从于这类事物的一般规律，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的，即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不体现共性和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如哲学与具体科学、物质与物质的具体形态、普遍联系与具体联系、运动与具体事物的运动、辩证矛盾与具体矛盾、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哲学上的价值与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关系等等，都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二）个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自然性和社会性涉及范围很广，我们以思维为例。思维是大脑的机能，我们的思维方式、思维的

深度、思维的广度首先取决于我们大脑的状态，然后又取决于实践的锻炼，取决于教育。恩格斯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分子和化学的运动。”我们的思维归根结底是物质的运动，我们每个人在思考问题时，最终是蛋白质、电信号等的活动，为什么有的蛋白质、电信号活动产生了高尚的思想，有的就产生了卑劣的思想呢？有的活动在想这个，有的在想那个，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完全把它弄明白，所以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还差得很远很远。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很不容易。大脑是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统一。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个体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起一定社会作用的有意识的个体。个体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它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个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和这个人所具有的意识。个性的社会性是个性的最本质特征。从个性的发展性与个性的社会性来看，个性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个人的心理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有赖于个人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个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研究人的个性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为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只有在实践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考察社会因素对人的个性形成的决定作用，才能科学地理解个性。

（三）个性是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统一

个性是指那些在个体身上经常地表现出来的具有一贯性和持久性的特征。这是稳定性。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活动，不仅在变化和发展，而且在不断地丰富和成熟，可以向积极方向变化、也可以向消极方向变化。这是可变性。所以个性既有稳定性又有可变性，个性是这两者的统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三条结论：个性是可以认识的、把握的；个性是可以改变的；个性修养和教育是无止境的。这就奠定了个性化教育是可行的。

二、个性化教育

孔子提出“因材施教”“和而不同”，是我

国最早有关个性化教育的阐述。诸子百家对个性化教育亦有诸多论述。他们强调,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前提下,根据学生不同知识基础与个体特长采用不同教育方法、达成不同教育目标。但后来,特别是汉代“以经为学”时代,强调填鸭式“注经教育”,忽视自我教育,注重同质教育,并愈演愈烈。2010年,政府颁布《教育规划纲要》,在《教育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我国开展了个性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西方个性化教育思想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通过与学生讨论问题,采取启发引导和质疑的方式,与一个或多个学生进行辩论,从对方熟知的事物开始,逐步揭露对方的矛盾之处,从而使之得出结论。

中世纪以来,大学在宗教统治下所有思想活动都指向单一目标:创造一套可充信仰基础的知识体系。大学统一教授古典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心智和品格。当时的课程都是统一必修课,主要包括数学、逻辑、英语、古典语言。直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业缘关系”取代血缘和地缘关系,追求高度的独立自主民主,社会关系从“机械单一模式”走向“自主共和模式”,人的个性和自由和谐发展受到关注,个性化教育也开始由空想走向实践。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崇尚理性和自然,夸美纽斯、卢梭等提出了“自然适应原则”,将自然基因作为个性化教育的基础。

此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欧洲的“新教育”思潮对个性化教育思想影响巨大,如:新教育思想以人的自然本性为起点,提倡个性要在教育中得到尊重,主张教育的民主化与自由化,倡导创办新学校;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引导个性自由发展;“合作教育”思想强调人的尊严、自尊、价值以及个性都要受到尊重;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观提倡教育要培养“一种新型的理智、新型的情操和新型的个性”^[2],提倡人的个性发展不但有利于人自身素质的提升,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为应对科技主义的盛行带来人的片面发展、模式化发展弊端,英、法、德等国家的“新教育运

动”打破班级授课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美国实用主义相结合,形成“新三中心”:从教室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从学习以间接经验为主的系统知识转变为重视个体直接经验和兴趣,从班级授课制的集体讲授转变为学生个人活动。“新三中心”的提出为个性化教育范式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个性化教育理论指导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个性教育实践逐步深化。个性化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教育范式,在探索 and 实践中,人们形成了多种认识,视角各有不同:“个性发展说”从心理特征出发培养人的稳定独特个性特征;“主体差异说”关注主体个性差异及其社会化过程;“个别化教学说”将个性化教育作为本科教学的原则或教学策略;“定制化教育”的观点集中于发展组织和教学策略中,以确保每个学生的教育是为他们的需要定制的,从而支持更高水平的学生发展成就,等等。

从过程哲学的视角,从学生主体价值出发,着眼教育本质规律,我们认为“个性化教育是尊重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发掘个体生命的潜能、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独特个性,促进个体生命自由和谐发展的教育”。

个性化教育不等同于个别教育,也不同于差异教育,扬长教育,特长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 立足“生本”教育

教育是对人的成长发展的引导与塑造,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教育中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学生为本”(生本),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本。“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3]发展是人的自身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是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是精神性的存在,人是自由性的存在,人是创造性的存在。因而,在教育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个性、需要,重视学生的个体的差异,谋求适合差异的教育教学方法;要实现教育民主,建立民主型的师生关系,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优势潜能,寻找最合适自己个性的发展方式。

(二) 基于和谐教育

个性=共性+特性。个性不等于特性,个性化教育不等于特性教育。个性化教育不是对个性某一

方面的教育,而是以全部现实个性为起点,以理想个性为归宿和目标,对完整人的全部个性的和谐教育。个性化教育中的和谐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个性具有全面性,但个性化教育摒弃平均发展,整齐划一的发展,强调诸要素和谐发展。二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人的个性化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化过程。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统一^[4]。三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是社会性存在,也是自然性存在,人是“自然的社会动物”。个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渗透、紧密联系,构成一体,这对个性化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 突出自我教育

个性发展是一个自主自由的过程,个性的形成必须经过“自我建构”。学生个性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人的主体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自我意识越强,与社会的互动、选择能力就越强。人的良好个性的形成需要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人的个性形成的内在因素,是受教育者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是个体把自身作为教育对象,按社会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发挥主体的自主性,主动求教,使自己成为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的活动”^[5],自我教育是受教育者形成自我意识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反映。积极倡导和践行个性化教育的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自我教育的重要作用。他反复强调,“自我教育是学校教育中极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6]。个性的发展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因此,要给学生一片自主的天空。教育者要通过情景假设、心理暗示、信息聚焦、目标锁定、自我激励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增强自信,启迪智慧,发掘潜能,从而达到自我成长,自我实现,自我超越。

(四) 体现渗透式教育

个性化教育不是外在于现行教育体系的独立的教育过程、教育体系,而是要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渗透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首先,要运用个性化教育思想重新审视教学目标、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评价和教学手段,在实践中

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个性化教育体系。其次,要以个性化教育思想审视教育教学的各项工作,使之体现个性化教育。再次,要将个性化教育渗透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社会教育无处不在,要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增强个性化教育的有效性。

三、个性化教育的意义

现在,重视个性原则已成为世界教育改革趋势。1999年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Adelaide)的宣言提出:在21世纪的国家教育目标中被称为个性化学习议程的关键因素,包括终身学习,加强学校作为学习社区,运用新技术,参加信息和交流技术。在2007年的《澳大利亚学校的未来(澳大利亚联邦委员会2007)》^[7]报告中指出澳大利亚教育的未来,识别高质量教学、个性化学习和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就推出了“定制个性化服务”的概念,到2004年,英国政府正式在教育政策框架内支持个性化学习。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报告中明确指出“打破教育事业中的划一性、僵死性、封闭性和非国际性等弊病……确立重视个性原则”,体现了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自律的精神。我国2010颁布《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在《学会生存》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培养人的自我生存能力,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和谐的发展,并把它作为当代教育的宗旨。”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一个人的个性并为他们进入现实世界开辟道路。”这项改革旨在创建对个体需求多样化更直接的服务,个性化教育已在世界范围不断深入,并嵌入了更多国家的公共服务改革。实现个性化教育的改革不仅是世界教育改革的共识,也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开展个性化教育,首先要认识个性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通过多年的探索,我们认为高等学校开展个性化教育意义重大,十分必要,主要体现在:

(一) 对教育真谛的深刻领悟

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而人是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教育是培

育人的主体性, 启迪人的精神生活的独立性, 从经验的发展来实现个体发展的完整性。教育的根本在于个体自身, 任何教育都要回到个体;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世界, 每个人成长的问题, 最终只能由自己解决。从教育的本质看, 教育是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发展, 教育就是个性化教育。

早期的教育, 重视个性化教育, 教育的性质类似于农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则忽视了个性化教育, 教育的性质类似于工业, 表现之一就是大班教学。工业社会以来, 随着科技发展速度加快,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为适应时代发展, 夸美纽斯首创大班教学, 并在教育教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大班教学拥有高效率、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等优势, 但其较少考虑学生个性、社会需求及人生目标的多样性, 仅仅依据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统一的进度教授统一的内容, 就像在工业社会生产标准件一样。为了纠正这种倾向, 各个国家都进行探索, 个性化教育正在兴起, 例如: 1996年6月召开的“世界教育大会”通过的《萨拉曼卡宣言》中提出“全纳性教育”, 意即, 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体系的设计和实施方案的实施应充分考虑每个儿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 都有特殊需要, 教育活动应当以儿童为中心, 学校应当努力去适合学生的状况;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必须进入社会的普通学校, 特殊教育不是残疾儿童的专利, 作为一种有效的精致的教育, 特殊教育可以为所有儿童的学习发挥作用, 等等^[8]。

在个性化教育中, 提出开发学生的优势潜能具有重大的意义。潜能是一种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的, 在合适条件下可以被激发的, 并对人的其他能力、行为产生重要作用的隐形能力。潜能靠开发和发掘, 正如弗罗姆所说: “如果我们说, 种子现在已经潜伏着树木的存在, 那么,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粒种子势必长成一棵大树。潜能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 例如种子在这种情况下, 条件就是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等。”^[9]个性化教育首先强调发掘学生个性潜能的优势, 即寻找每一个学生身上的个性的最优点和闪光点。因此, 如何引导及帮助大学生有效开发及运用自身的潜能, 提高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 培养健康的个性, 则已是我们高等教育

的重中之重。

(二) 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诉求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大众化最显著的外在特征是学生人数规模的扩大。我国1952年大学招生人数仅为6.6万人。在校学生人数, 1998年为643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9.8%; 2002年为1600万人, 毛入学率为15%; 2016年为3699万人, 毛入学率为42.7%。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提出大众化理论的美国学者马丁·特罗 (Martin Trow) 提出: “在每一个现代社会中, 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都与增长相关。增长给实施增长的教育系统和支持增长的社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等教育的每一个方面冒出来, 如财务、控制与管理, 招生与学生选择、课程与教学方式、教职工的招聘, 培训与社会化, 标准设置与维护、考试方式与资格授予的本质、学生住宿与工作安排, 动机与士气, 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中学教育的关系, 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等。增长冲击了高等教育形态与行为的各个方面。”^[10]在这些变化和要求中, 大众化呼唤个性化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方面。

首先, 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分析。大众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现在我们正开始进入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已经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表现出全新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一种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形态; 在社会方面, 表现为具有信息基础设施完备性、社会服务包容性、社会发展协调的网络化社会; 在生活方面, 形成了生活工具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生活内容数字化的数字化生活; 在政治上, 要求建立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信息社会需要品种多样的生产, 有多种职业要求, 社会发展节奏加快, 适应信息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 发展自己的个性特征。信息社会, 对教育提出了培养个性化教育的时代要求。信息社会又是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信息社会中, 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离信息和知识, 使个人、社会

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因而信息社会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有利于开展个性化教育、培养个性化人才。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为个性化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大数据，进行学习分析，包括学习预测分析、行为分析和学业分析等，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时间、知识模型、学习兴趣、学业状况、思维方式、潜在问题、学习效果并预测学习未来可能。这有利于促进学生成长，特别是个性化教育的开展。

其次，从学生的特征和需求来分析。与精英教育相比，大众教育的学生来源具有更大的多样性，个体之间具有更大的差异性，如何推动所有的学生走向成功，是一项重大课题。大众化时代与精英时代比，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欲望、学习成绩有极大的差别。学习障碍学生（指学习不良、成绩落后的学生）的人数大为增加，而且这些学生之间的差别也十分明显。文华学院一个课题组曾对学习障碍学生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学生学习不良、成绩落后的表现多种多样：学习态度不端正，目的不明确，处于漫无目的的学习倾向；缺乏学习热情和自觉性，自制性和坚持性差；学习动机短暂、肤浅、游移、摇摆；缺乏学习兴趣，缺乏好奇心；注意力不集中，缺乏时间观念和任务感；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自我控制能力差，社会活动、游艺活动过度；缺乏正确的自我评价，自卑、封闭、忧郁、焦虑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是千差万别的。面对大众化时期学生极大的多样性、差异性，实行个性教育是最佳选择。面对信息化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种工作和生活，都与知识和信息密切相关，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需要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实用型专业人才。学生将进入各种千差万别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差别巨大。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岗位，学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需求。学生的多种需求，呼唤个性化教育。

（三）有利于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

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意味着改变、付出、风险，培养创新人才对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创新与个性化教育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创新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独立探究的精神，关键在于突破常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探究、独立发现，而不是迷信、盲从、墨守成规。以“独创”为特色的创新思维必然是一种个性化思维。另一方面，个性发展从根本上来讲，体现在人的创造精神与创造能力，即个性发展的核心是创造精神的发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才可能具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

创新的范围很广，创新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去发掘每个人各自的优势潜能，找准自己可能的创新的方向和创新点，最大限度地产生创新成果。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认为，一个人至少有七个方面的潜能：语言潜能、数理逻辑潜能、空间潜能、身体运动潜能、音乐潜能、人际关系潜能和自我认识潜能。但是人的潜能因个体差异而呈不均衡分布状态，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潜能，也有弱势潜能和一般潜能。而且不同人的潜能显现的时间不同，有的显现较早，有的则显现较晚；潜能显现的方式也不相同，有的超常态显现，有的以负面形式显现，有的则以平庸方式显现。在个性化教育中，要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的优势潜能，从而明确自己的创新方向，增强创新能力。

（四）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社会公平就是在平等的规则及制度保障体系下，社会成员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社会公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规划纲要》），十分重要。社会公平包括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四个方面的内容。机会公平是指以公正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教育，保证人们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及社会生活，能够通过法律及制度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教育规划纲要》）。现代教育的发生，首要问题乃是从教育平等开始。

有学者将教育机会公平分为“就学机会公平”“就读优质学校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参与机会公平”三个层次。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教育机会公平主要是实现“教育过程参与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参与机会公平”要求学校和教师不论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实践活动、学生管理中,都不要把有助于学生成长发展的机会(课堂表达的机会、与教师互动的机会、担任管理角色的机会、参与科研的机会、获得奖励的机会、社会实践的机会、勤工助学的机会等)长期地或过多地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而应将这些机会公平地给予所有的学生,“教好每一个学生”(《教育规划纲要》)。学校要营造一种良好氛围,为每个学生提供参与教育过程的公平机会,即公平的教育机会。

文华学院在2005年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要“尊重每一个学生”。因而在实施个性化教育的过程中,尽力给优秀学生创造条件,让他们更好地发展,同时,十分关注学习困难的学生,为每一个困难学生量身定做适合自己的课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取得好的成绩。事实充分证明,个性化教育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总之,在个性化教育中,我们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发掘学生潜能的优势,激励每一个学生乐观向

上,自主自为,努力成才。

参考文献

- [1]人民出版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13.
- [2]J Dewey. Individualism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M]. Westview Press, 1930: 64.
- [3]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 [4]刘彦文. 个性化教育的内涵与特征浅析[J]. 教育评论, 2012(4): 16-18.
- [5]张晓静. 自我教育——当代学校教育的主题[J]. 教育研究, 1994(10): 32-35.
- [6]王天一.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47.
- [7]DO Premier. The future of schooling in Australia[C]. Department of Premier&Cabinet, 2007.
- [8]贺红. 特殊教育思想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特殊教育管理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6): 43-44.
- [9]张云. 高等学校个性化教育体系的构建[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4): 88-92.
- [10]马万华. 多样性与领导力: 马丁·特罗论美国高等教育和研究型大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Liu Xianjun

Abstract: The top priority in carrying out the personalized education is to clarify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and to make clear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carrying out the personalized meaning. Personality i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tendentiousness, complexity, uniqueness, development, enthusiasm and so on. Personalized education is a kind of education in which it shows respect for special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and it excavates the potential of individual life, as well as it cultivates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unique personality of students and it also promotes fre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life. Personalized education is the deep comprehension of the education essence, the appeal to adopt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education fairness. Carrying out the personalized education is based on “students-centered” education and harmonious education, as well as highlighting yourself education and embodying the infiltration education.

Key words: Personality; Personalized Education; Harmonious education; Infiltration Education

“双一流”背景下研究型大学本科 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专家经验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李硕豪 富阳丽

摘要: 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卓越教育,应回归课堂教学,着力于课堂教学评价,通过其价值导向作用引导课堂教学实践新的教学理念、推行新的教学模式。作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先锋院校,研究型大学任重而道远。文章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与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特征,以及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初步构建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Delphi法广泛征求一线教师对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意见;最后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检验与修正。最终得出结论:一线教师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其建构评价指标的意见理应受到重视;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信效度良好,验证了理论假设模型;评价要素涵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交流互动”“师生关系”“学习效果”“学习态度”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其中“交流互动”与“学习效果”在课堂教学评价中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22-12

一、引言

本科教学是一流大学的灵魂,坚持“本科为本”,是我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迫切需要与必然选择。然而研究型大学作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先锋院校,却陷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实问题之中,致使本科教学地位屡受冲击,本科教学质量频遭质疑。从“胡适之问”到“钱学森之问”再到“为什么中国与诺贝尔奖缘浅”,无一不是在向教育要人才、向教学要质量。保证教学质量最直接的因素则是课堂教学,但是目前的课堂教学也令人堪忧:教学主体偏于教师中心,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落实;教学内容偏于知识中心,学生的能力训练被忽视;教学模式偏于课堂中心,开放式课堂发展被轻视等。如此情形,何以保证本科教学的高质量和高水平?根基不

稳,又如何冲击世界一流大学?

毋庸置疑,课堂教学评价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首先,课堂教学评价本身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可以引导教师传承新的教学理念,践行科学的教学方法;其次,课堂教学评价具有监督管理作用,可以督促教师有效教学,从而在此基础之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然而当前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过于陈旧,已不能顺应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在以这个“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和建设“双一流”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根本无法满足新理念的诉求,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课堂教学评价的内容,即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重建。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怎样实现其科研与教学的真正融合,发挥其研究性教学的特殊作用,通过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来指导

作者简介: 李硕豪,男,甘肃秦安人,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富阳丽,女,甘肃民勤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新的教育理念无疑是个有效的方法。但是目前各高校所用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单一，功能定位不明确，甚至沉陷于“一表量多校”的现象，忽视了不同类型学校的特性与主要功能的突出。尽管已有研究指出课堂教学评价量单一、指标僵化、应考虑学校差异性和学科差异性问题，但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很好地解决。另外，现有研究对于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逻辑性和结构性，而且构建方法缺乏科学性，很少采用结合专家咨询与广泛调查于一体的系统处理与验证的定量分析，大都停留在仅专家设计（没有教师或学生的参与），或借鉴套用国外现行的指标体系上。

本研究将从一线教师对于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要素的认知角度出发，通过对新时代的教育理念、经典教育理论和现存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问题的分析，以及研究性教学特征的探究确定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的要素，采用专家咨询法验证一线教师建构意见的可靠性，然后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验证其与理论假设模型的适配度，确定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效度，进而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构建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目的在于为研究型大学提供一种科学构建课堂教学评价指标的方法，使其能够随时依据教学目标及新的教学理念修改和制定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研究型大学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的确定。第一，着眼具有时代特征的教育理念，进而构建时代价值突出的教学评价理念。根据“以人为本”的时代理念，选取人本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生命教育观、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分析，以此确定整个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以及指标内涵，最终指标以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为主线，顺应学生的个性特点与成长规律，实现学生的自我发展；第二，根据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的特征，突出研究性教学的教学内容及教

学方法；第三，收集有关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统计整合其中的评价指标体系加以借鉴，尤以Marsh的SEEQ量表、美国的RTOP教学观察方案为主。最后，结合上述三种方式初步构建了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框架，共含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交流互动、师生关系、学习效果、学习态度等6项一级指标，以及45项二级指标。

本次研究基于已经构建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借鉴Marsh的SEEQ量表、美国的RTOP教学观察方案编制了“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重要程度专家咨询问卷”，问卷主要包括评价等级、判断依据、熟悉程度以及相关建议四大部分，共有59道等级评价题，1道意见反馈题和7道基本信息题。其中，59道等级评价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满意度选项分为“很不重要”“不太重要”“一般”“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五个等级，相应赋值为1、2、3、4、5。

（二）样本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般情况下，研究所选取的咨询专家都是界内资深的权威人士，但本研究确定的专家不同于一般模式，而是将其界定为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所有教师。一是因为他们熟知课堂教学活动，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其意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课堂教学评价指标的内涵更贴近实际的课堂教学；二是因为其中有以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资深教授，这类专家对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构架有着重要的把握。另外，根据因子分析对样本量的特殊要求（样本量应是题项的5—10倍），本研究拟遴选240名教师作为咨询专家。于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15日期间在L大学（研究型大学）进行数据采集，主要通过推送问卷星以及向专家发邮件的形式展开咨询，所有问卷设计为必答提交式，从而避免了缺失值的问题。

本次咨询的专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以36—45岁的教师居多，占样本总量的47.67%；最高学历为博士的人数最多，占67.88%，其次为硕士（21.76%），本科学历的最少，仅占10.36%；参与咨询的教师多以教学岗为主，占样本总量的94.82%；教师教龄分布均匀，各区间均在21%左右，教龄在11—20年区间的较多，占35.23%；咨询专家中

表1 咨询专家基本情况列表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05	54.4%	女	88	45.6%
年龄	35岁以下	52	26.94%	36—45岁	92	47.67%
	46—55岁	42	21.76%	56岁以上	7	3.63%
学历	本科	20	10.36%	硕士	42	21.76%
	博士	131	67.88%			
岗位	教学岗	183	94.82%	行政岗	3	1.55%
	教学兼行政	7	3.63%			
教龄	5年以下	44	22.8%	5—10年	41	21.24%
	11—20年	68	35.23%	20年以上	40	20.73%
职称	助教	7	3.63%	讲师	77	39.9%
	副教授	82	42.49%	教授	27	13.99%
所授专业	哲学	3	1.55%	经济学	5	2.59%
	法学	9	4.66%	教育学	27	13.99%
	文学	11	5.7%	历史学	5	2.59%
	理学	79	40.93%	工学	10	5.18%
	农学	0	0	医学	9	4.66%
	管理学	20	10.36%	艺术学	15	7.77%
	军事学	0	0			

副教授居多（42.49%），其次是讲师（39.9%）、教授（13.99%）；十三大学科门类中，除了农学和军事学外，其他学科的教师均有参与咨询，其中，理学教师最多，占样本总量的40.93%，其次是教育学教师（13.99%）、管理学（10.36%）。

（三）研究步骤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四个阶段来构建研究型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对所选样本进行专家可靠性分析，以确定一线教师观点意见的权威性与可靠性；第二，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所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理论假设模型的结构变量是否合理；第三，对第二步验证下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指标体系的整体建构效度和各指标间的内在联系；第四，根据最终形成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的标准化系数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所用到的统计软件有AMOS22.0、SPSS21.0、EXCEL2013。

三、专家可靠性分析

（一）专家积极程度

专家积极系数就是专家对所设计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的关心程度。计算公式为： $K = \frac{m_i}{m}$ ，式

中， m_i 为实际参与指标评分的专家人数， m 为全部应该参加评分专家人数。一般用专家咨询量表的回收率来衡量专家的积极系数，本研究则是以实际回收与预期回收的问卷数之比来表示专家积极系数。专家积极系数越高，说明专家对本研究的关心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预计回收240份问卷，实际回收193份，回收率为80.42%，即专家的积极系数为80.42%，可见一线教师对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比较关心。

（二）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权威程度（ C_r ）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专家的判断依据（ C_a ），判断系数间于0—1，0为无影响，1为影响程度最大；二是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 C_s ），简言之，专家权威程度就是判断依据与熟悉程度的算术平均值，用公式表达即为：权威程度 = （判断系数+熟悉程度）/2。本研究对于熟悉程度的赋值为很不熟悉（0.2）、不太熟悉（0.4）、一般（0.6）、熟悉（0.8）、很熟悉（1），对于判断依据的赋值见表2。

经测算，本研究的专家判断系数（ C_a ）为0.89，说明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对专家的填答结果影响很大；专家熟悉程度系数（ C_s ）为0.77，说明专家对所列指标比较熟悉。综合专家的判断系数与熟悉程度，可得专家平均权威系数（ C_r ）为0.83。相

表2 专家判断依据及赋值

判断依据	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 (Ca)		
	大	中	小
实践经验	0.5	0.4	0.3
理论分析	0.3	0.2	0.1
同行了解	0.1	0.05	0.01
自我直觉	0.1	0.05	0.01

关研究表明,当 $C_r \geq 0.7$ 时就认为是一项较好的专家咨询^[1]。所以,本研究的专家权威程度较高,咨询结果可靠性强。专家权威系数具体分布见表3。

(三) 专家协调程度

专家协调程度可以由变异系数 (V_i) 和kendall协

调系数来进行解释。其中,变异系数是代表评价波动大小的重要指标,表明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认识上的差异程度。变异系数越小,专家协调程度越高^[2]。

计算公式为: $V_i = \frac{S_i}{C_i}$, 式中, C_i 为指标 i 的

表3 专家权威系数分布情况 (C_s)

类别 区间	权威系数		判断系数		熟悉程度系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系数	人数	百分比
0.9—1	37	19.17%	143	74.09%	1	23	11.92%
0.8—0.89	92	47.67%	31	16.06%	0.8	82	42.49%
0.7—0.79	50	25.91%	14	7.25%	0.6	37	19.17%
0.5—0.69	15	7.77%	3	1.55%	0.4	1	0.52%
0—0.49	0	0	3	1.55%	0.2	0	0.00%
平均值	0.83		0.89		0.77		

重要性均值, S_i 为影响指标 i 得分的标准差, 即

$$S_i = \sqrt{\frac{1}{m_i} \sum_{j=1}^{m_i} (c_{ij} - c_i)^2}$$

计算获得,6个二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均小于等于0.21;45个三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均小于等于0.25,其中有23个三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小于等于0.2。由此可见,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变异系数都很小,说明本研究的专家协调程度较高。

为了使结果更为可靠,这里用kendall协调系数 (W) 来再次验证专家意见的一致性。 W 越大,专家意见的一致性越高。

计算公式为 $W = \frac{12 \sum_{j=1}^k R_j^2 - 3b^2k(k+1)^2}{b^2k(k^2-1)}$, 式

中, b 为咨询专家的个数; k 为观察指标个数; R 是分配给第 j 个指标的观察对象的秩次的合计。

通过SPSS分析得出,咨询专家对于45个三级指标的协调系数为 $W_1=0.1$, 且 $P < 0.01$, 可见三级指标专家意见的一致性较好;同理,咨询专家对6个二级指标的协调系数为 $W_2=0.12$, 且 $P < 0.01$, 所以二级指标专家意见的一致性良好。具体情况见表4。

综上所述,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专家咨询的协调程度都比较理想。

表4 专家意见的一致性程度

项目	W值	卡方值	P值
三级指标	0.10	858.11	0.00
二级指标	0.12	115.02	0.00

四、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量表的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量表工具所测得结果的稳定性及一致性，量表的信度越大，其测量标准误差越小。检验信度的方法有多种，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简称系数）、项目间平均相关系数、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变异抽取量（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来检验问卷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对于 α 系数，吴明隆综合诸多学者的看法，总结出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指标判断原则：各层面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最低要在0.50以上，最好能高于0.60，而整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最低要在0.70以上，最好能高于0.80；CR是所有测量指标信度的组合，近似于Cronbach's Alpha系数，CR值越高表示构念的一致性越高，一般认为组合信度应在0.60以上，表示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良好；AVE是计算潜在变量之测量变量的变异数解释力，其值

越高表示构建的信度和收敛效度越高。其理想上的标准值须大于0.5，0.36—0.5可接受^[3]；对于项目间平均相关系数的测算，是为了通过各因素与全量表项目间的平均相关系数来检验该量表的同质性，其优势在于系数值不受项目多少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各条目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要求大于0.4^[4]，项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大于0.2。

经检验，本研究整个问卷的 α 系数值为0.981，可见问卷信度非常理想；并且各维度的 α 系数也很高，其中只有师生关系的 α 系数在[0.8,0.9)区间内，其他维度的 α 系数均在0.9以上，因此，各层面的 α 系数都达到了理想状态。CR值均在0.90以上，可见各维度内指标间的组合信度较好；AVE值均大于0.50，说明各维度的信度和收敛效度都很理想。经计算，本研究各维度以及整个问卷的项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为0.472—0.701（均大于0.2），可见本问卷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具体见表5。

表5 量表信度检验系数分布表

构面	项目间相关系数	项目数	α 系数值	CR	AVE
教学内容	0.472	12	0.914	0.938	0.550
教学方法	0.546	8	0.905	0.906	0.550
交流互动	0.687	7	0.939	0.939	0.687
师生关系	0.631	5	0.893	0.895	0.631
学习效果	0.699	8	0.948	0.949	0.701
学习态度	0.701	5	0.920	0.920	0.698
总量表	0.545	45	0.981	-	-

五、探索性因子分析

统计学上，检验结构效度的方法一般为因子分析。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检验各题项间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选取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进行验证。KMO值介于0至1之间，其度量标准为：小于0.50表示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大于0.80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大于0.90表示非常适合^[5]；Bartlett's球形检验的统计量越大越好，其伴随的P值小于0.05，则证明可

进行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各维度的KMO值均在0.80以上，总量表的KMO值为0.962，而且各维度和总量表的Bartlett's球形检验所伴随的P值均为0.000，显然，本研究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具体检验见表6。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考虑到因子间的相关性，则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从而获得萃取结果。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因子负荷量的要求，样本量越少对因子负荷量的要求越高，当样本量为150时，

表6 教师量表的KMO与Bartlett's检验

维度	KMO	Bartlett's χ^2	Sig	验证结果
教学内容	0.916	1221.826	0.000	非常合适
教学方法	0.880	927.802	0.000	合适
交流互动	0.917	1098.086	0.000	非常合适
师生关系	0.820	594.050	0.000	合适
学习效果	0.930	1371.082	0.000	非常合适
学习态度	0.831	765.215	0.000	合适
总量表	0.962	8202.041	0.000	非常适合

因子负荷量须达到0.45以上；当样本量为200时，因子负荷量须达到0.4以上；一般情况下以大于0.5为宜。经检验，除了教学内容维度下的C3因子负荷量为0.483（大于0.45）外，其他指标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可见总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因此，经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仍然保留45项指标，总累计解释变异量为70.98%，具体见表7。

表7 量表结构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维度	变量	观测指标	因子载荷	特征值 解释变异量	维度	变量	观测指标	因子载荷	特征值 解释变异量
教学内容	C1	细节知识	0.648	3.718 8.26%	交流互动	I1	鼓励提问	0.816	4.764 10.59%
	C2	术语知识	0.589			I2	及时反馈	0.835	
	C3	要点知识	0.483			I3	启发思考	0.824	
	C4	类别性知识	0.603			I4	调整节奏	0.781	
	C5	原理性知识	0.541			I5	师生自由商讨	0.803	
	C6	理论性知识	0.662			I6	生生相互评议	0.782	
	C7	技能性知识	0.639			I7	生生相互合作	0.828	
	C8	准则性知识	0.700		师生关系	R1	教师关爱学生	0.811	1.825 4.05%
	C9	方法性知识	0.683			R2	教师尊重学生	0.790	
	C10	策略性知识	0.693			R3	教师融入学生	0.719	
	C11	情境性知识	0.794			R4	学生敬重老师	0.736	
	C12	条件性知识	0.739			R5	师生相互合作	0.781	
教学方法	M1	问题式	0.752	4.003 8.89%	学习效果	E1	善于理解	0.852	6.309 14.02%
	M2	支架式	0.794			E2	善于推断	0.802	
	M3	合作式	0.685			E3	善于应用	0.839	
	M4	指导式	0.608			E4	善于比较	0.859	
	M5	讨论法	0.722			E5	善于评价	0.824	
	M6	案例法	0.762			E6	善于分析	0.812	
	M7	多媒体	0.668			E7	善于创造	0.765	
	M8	练习法	0.705			E8	善于探索	0.762	
学习态度	A1	充分利用机会	0.769	11.323 25.16%	总累计解释 变异量	70.98%			
	A2	积极主动	0.813						
	A3	有信心	0.818						
	A4	感兴趣	0.821						
	A5	探究欲望	0.809						

六、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归于一般结构方程模型，旨在检验假定的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进

而验证模型的可靠性。本研究运用AMOS22.0通过加权最小平方法（Generally Weight Least Square; WL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理论架构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在此构建6因子45指标二阶

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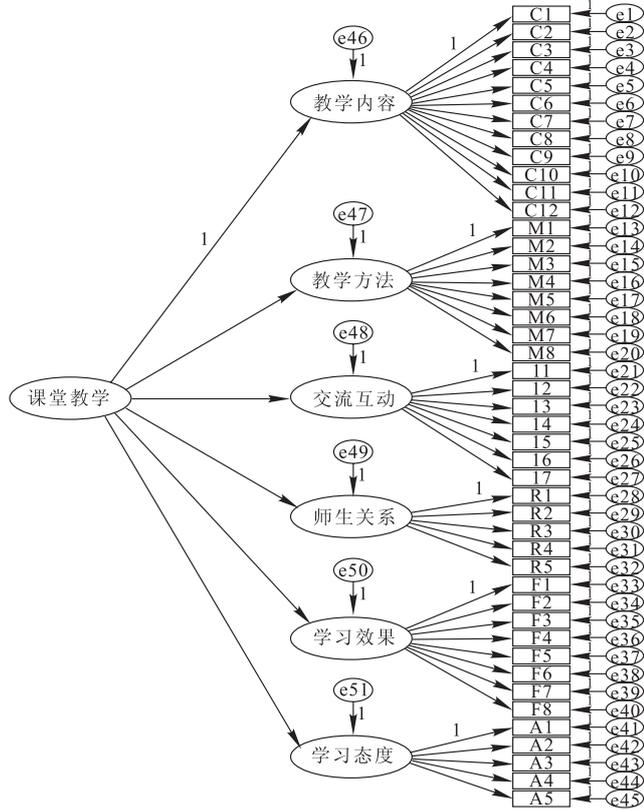


图1 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假设模型

经检验，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整体模型与各维度的测量模型均没有达到适配标准，可见原始模型建构效度欠佳。通过对修正指数分析发现，C1与C3，C2与C7，C4与C5，C11与C12；M1与M2，

M3、M4与M5；I5与I6；R1与R2；F1与F4，F6、F7与F8等10对指标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而且从内容上来看，两两之间或三者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共性，如C2与C7，前者涉及的学术术语与后者涉及的学术动态和科研成果有所交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学术术语可以通过学术动态和科研成果来进行传达；又如I5与I6，前者表示“师生互动”，后者表示“生生互动”，从实际教学活动来看，师生间的商讨与生生间的相互讨论大都是同时进行的，专家也建议将二者作为整体进行评价……关于其他相关指标这里不再一一说明，他们的共性在内容上都有所兼容，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这里统一对相关较大的配对指标采用取平均值的方式进行合并处理。除此之外，M7与诸多指标存在相关性，思考其原因在于信息技术只是教学过程中的辅助工具，而非一种教学方法，因此直接剔除M7；无独有偶，I7也与诸多指标存在相关性，究其原因在于，学生之间的合作与帮助体现在各个交流互动活动之中，无需单独列出，因此直接剔除I7；R2在内容上包含了R1，故直接剔除R1，同样A1与A2也是如此，故剔除A2；F5虽然在“学习效果”测量模型内部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在整体模型检验中发现其与“教学方法”中的M2存在显著相关，于是认为F5最初设计欠佳，不具代表性，直接剔除。具体见表8。

表8 六维度分模型适配指标分布表

维度	模型类别	χ^2 值	df	χ^2/df	TLI	CFI	RMSEA	剔除	合并因子
教学内容	原始模型	204.125	54	3.780	0.845	0.874	0.120	-	-
	修正模型	39.977	20	1.999	0.957	0.969	0.072	-	C1&C3,C2&C7,C4&C5,C11&C12
教学方法	原始模型	148.366	20	7.418	0.804	0.860	0.183	-	-
	修正模型	7.428	5	1.486	0.989	0.995	0.050	M7	M1&M2,M3&M4&M5
交流互动	原始模型	84.264	14	6.019	0.904	0.936	0.162	-	-
	修正模型	9.053	5	1.811	0.988	0.994	0.065	I7	I5&I6
师生关系	原始模型	33.471	5	6.694	0.900	0.950	0.172	-	-
	修正模型	0.523	2	0.261	1.012	1.000	0.000	R1	-
学习效果	原始模型	90.136	20	4.507	0.928	0.949	0.135	-	-
	修正模型	2.025	2	1.013	1.000	1.000	0.008	F5	F1&F4, F6&F7&F8
学习态度	原始模型	69.516	5	13.903	0.831	0.916	0.259	-	-
	修正模型	3.299	2	1.649	0.991	0.997	0.058	A2	-
整体模型	原始模型	2120.15	939	2.258	0.843	0.851	0.081	--	-
	修正模型	656.057	371	1.768	0.931	0.937	0.063	5项	9项
适配标准		-	-	<5	>0.9	>0.9	<0.08	-	--

经修正后，各维度测量模型的适配度指标均达到了标准，在此基础上构建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一阶因子模型（见图2），检验发现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在0.50以上，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显示出同一构面内的各因子间具有相当的同质性；所有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各维度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教学方法与交流互动的关系度最高，达0.93，这表明当教学方法这个因素对课堂教学评价的贡献提高一个百分点时，将促使交流互动因素对课堂教学评价的贡献提高0.93个百分点；交流互动与学习效果、学习效果与学习态度之间的相关程度次之，达0.92，这表明当交流互动这个因素对课堂教学评价的贡献提高一个百分点时，将促使学习效果因素对课堂教学评价的贡献提高0.92个百分点；师生关系与学习态度、教学方法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度也在0.90以上，分别为0.91、0.90；除了教学内容与学习态度的相关性最低，为0.78外，剩余各维度间的相关程度均在0.85以上。从各维度间的高相关性来看，一阶潜在变量还能够共同反映一个变量，下面将通过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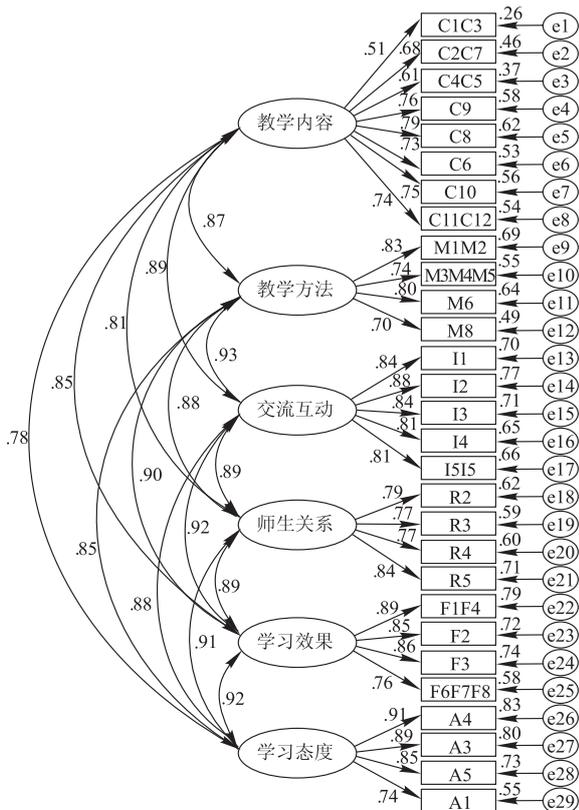


图2 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一阶因子模型参数估计

经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二阶模型通过验证（见图3），模型适配度指标均达到标准：卡方自由度比值=1.768<3.000，RMSEA值=0.063<0.080，TLI值与CFI值均大于0.9（具体见表8）。综合来看，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二阶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作为后续分析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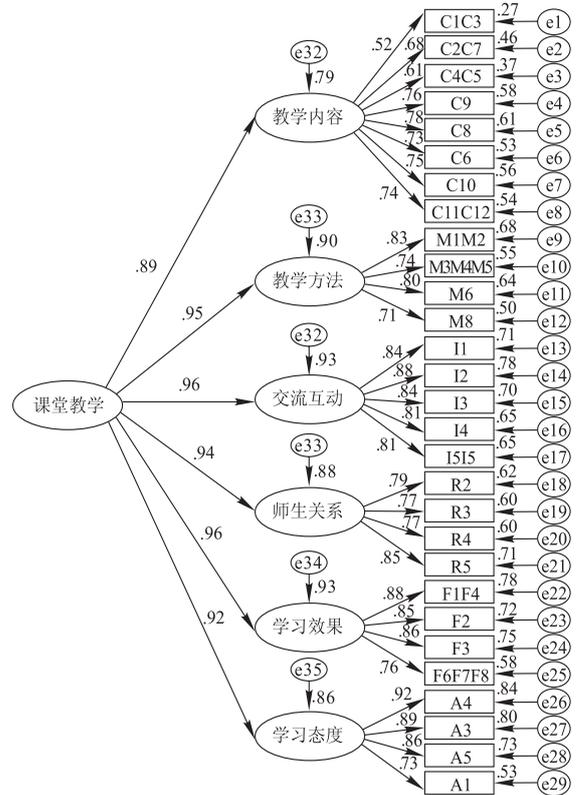


图3 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修正模型

七、基于教师观点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常用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中，主观赋权法对专家意见的依赖性较强，存在太多的主观性；客观赋权法只能通过数据信息提供公共因素，出现异常情况无法修正；而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权重既可以兼顾主客观的意见，又能避免主客观赋权法的缺陷^[6]。主要方法在于对同一构面内指标的标准化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确定其权重，计算公式为^[7]：

$$W_{ij} = \frac{c_{ij}}{\sum_i c_{ij}}$$

如教学内容的权重为：

$$W_{61} = \frac{c_{61}}{\sum_6 c_{6j}} = \frac{0.89}{0.89 + 0.95 + 0.96 + 0.94 + 0.96 + 92} = 0.158$$

同理可得其他指标的权重，从而形成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9所示。

（一）指标权重大小的原因分析

从各项指标权重来看，在课堂教学评价的评价因素中，一线教师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交流互动与学习效果，尤以交流互动中“及时反馈”的重要性的学习效果中“善于理解、善于应用”的重要性最为突出。这是由于一线教师依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加之主流教学思想的倡导，他们已经领悟到了“师生学习共同体”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理念。

一方面交流互动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共同发展，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互动，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也可谓研究型大学关于科研最直接、最简单的“课堂沙龙”，这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认知拓展，还有助于师生间的情感互通，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推进了师生的共同发展，达到了真正本真的教育^[8]；另一方面，衡量大学教学质量不只是取决于教师的“教”，还在于学生的“学”，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时代，重视学习效果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并且诸多研究已经提出用“以学

表9 基于一线教师观点的研究型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变量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内涵	
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教学内容	0.158	C1C3	细节知识&要点知识	0.093	阐述所讲概念的背景知识，普及著名专家的事迹与成果 通过学科前沿、学术动态和最新科研成果讲授专业术语和学术术语 详细介绍学科知识的理论架构和原理推导过程 讲明理论产生的实践依据和现实针对性 阐述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过程 讲授论证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引导学生记录自己完成某项任务的思维过程 引导学生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或技能并运用到不同情境中启发式地给学生提供产生问题的情境，并给予自主解决问题的机会
			C2C7	术语知识&技能性知识	0.122	
			C4C5	类别性知识&原理性知识	0.110	
			C6	理论性知识	0.131	
			C8	准则性知识	0.141	
			C9	方法性知识	0.136	
			C10	策略性知识	0.134	
			C11C12	情境性知识&条件性知识	0.132	
	教学方法	0.169	M1M2	问题式&支架式	0.269	开展专题讨论，以学生发言为主，教师引导、纠正并总结 善于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布置一定程度的课前与课后的作业练习
			M3M4M5	合作式&指导式&讨论法	0.241	
			M6	案例法	0.260	
			M8	练习法	0.230	
	交流互动	0.171	I1	鼓励提问	0.202	鼓励学生积极发表意见、回答问题、提出疑问 对学生的问题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 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根据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上课的进度与难度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有行为的互动、情感的交流、思维的碰撞
			I2	及时反馈	0.211	
			I3	启发思考	0.201	
			I4	调整节奏	0.193	
			I5I6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0.193	
	师生关系	0.166	R2	教师尊重学生	0.248	教师尊重和欣赏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 教师主动亲近和融入到学生中去 学生敬重教师，听从教师的指导 师生相互合作、配合默契，教学相长
			R3	教师融入学生	0.244	
			R4	学生敬重老师	0.243	
			R5	师生相互合作	0.266	
	学习效果	0.171	F1F4	善于理解&善于比较	0.263	学生学会将教师的讲解转化为自己的理解，并能与以前所学知识联系起来 学生学会从已知信息中推断出结论 学生学会把知识熟练运用到特定情境中去 学生学会基于所学知识提出假设，并可以独立或指导下完成研究，进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F2	善于推断	0.253	
			F3	善于应用	0.257	
			F6F7F8	善于分析&善于创造&善于探索	0.227	
	学习态度	0.165	A1	积极主动	0.215	学生充分利用课堂上所创造的一切学习机会 学生对学习充满信心 学生对探究性学习感兴趣，乐于探究、勤于思考 学生具有再学习和探究的欲望
			A3	有信心	0.263	
			A4	感兴趣	0.270	
A5			探究欲望	0.252		

评教”代替“以教评教”的观点，主要特点在于关注学生的发展状况，重视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评价^[9]。然后，位于第三重要的是教学方法。各方法中，教师倾向于推崇“问题式”教学，显然教师们已经意识到“问题式”教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问题式”教学对于研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已有学校付诸实践，如北京大学在医学教育中全面推行了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方法，一种是以科研思维训练为目标的PBL教学，另一种是以临床思维训练为目标的PBL教学，实践研究发现，PBL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了学生思辨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从而为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与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10]。

其次，根据一线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重要程度感知，发现一线教师对“准则性知识”和“方法性知识”给出了较高要求，说明在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应该以“教学生如何学会学习”为主要任务，多选择方法性知识、技术性知识、应用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等作为教学内容，简言之，教师需做到的是“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另外，教师对于“师生关系”和“学习态度”的重要程度感知不相上下。其中，在“师生关系”上，对“师生相互合作”的重要性感知最高，加之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科研项目大都是由师生团队来完成的，很好地实现了师生的共生、共创、共同发展，因此相互合作的师生关系在研究型大学的课堂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学习态度”上，对“学生对探究性学习的兴趣

与热情”的重要性感知最高，说明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更为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教师教学热情的最大动因，也是推动科学研究最大的内在动力。

（二）主要评价指数及评价等级的确定

综上所述，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整体以及其各维度的具体评分公式可以确定为：

课堂教学评价指数=教学内容*0.158+教学方法*0.169+交流互动*0.171+师生关系*0.166+学习效果*0.171+学习态度*0.165

①教学内容指数=C2C7*0.122+C3*0.093+C4C5*0.110+C6*0.131+C8*0.141

+C9*0.136+C10*0.134+C11C12*0.132

②教学方法指数=M1M2*0.269+M3M4M5*0.241+M6*0.260+M8*0.230

③交流互动指数=I1*0.202+I2*0.211+I3*0.201+I4*0.193+I5I6*0.193

④师生关系指数=R2*0.248+R3*0.244+R4*0.243+R5*0.266

⑤学习效果指数=F1F4*0.263+F2*0.253+F3*0.257+F6F7F8*0.227

⑥学习态度指数=A1*0.215+A3*0.263+A4*0.270+A5*0.252

最后，为了直观地体现研究型大学的课堂教学效果，从而使学校能够依据课堂教学评价得分来衡量目前的课堂教学质量处于怎样的一个水平，是否达到所应达到的教学目标？本研究将课堂教学评价指标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指标体系评价分值的分布，设计如下等级，见表10。

表10 课堂教学评价反馈修正标准

评价分值	课堂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质量	改进程度
[1,2]	效果不好	低	大力改进
(2,3]	效果一般	一般	日臻完善
(3,4]	效果比较好	比较高	稳中求进
(4,5]	效果很好	非常高	精益求精

八、结论与讨论

鉴于当下关于构建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不够科学严谨，本研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方法对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探究过程中采用了严格的统计学方法，如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上述分析，获得如下结论：

一是一线教师可以被作为强有力的咨询专家。一般而言，咨询专家都是理论界的佼佼者，而本研究选取一线教师形成庞大的“专家群体”也通过了专家标准的一系列检验，专家积极程度、权威程度、协调程度都趋于理想，这表明一线教师对于参与构建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有较高的积极性，在对指标的看法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并且其意见与建议有相当的可靠性；就实际而言，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线工作者，他们对于课堂教学的所见、所闻、所感对于建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第四代教学评价理论曾指出，教学评价的因素不应只考虑教学管理者的需要，而应该包括与教学相关的所有价值主体的需要^[11]。因此，在构建课堂教学评价指标时，应该考虑到教师与学生的需求，鼓励其参与课堂教学评价指标的构建。本研究只考虑了教师的观点，后续还将对学生关于课堂教学评价指标构建的观点进行分析探究。

二是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基本诠释了最初建构的理论假设模型，各指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良好的适切性。关于量表信度，不论是维度层面还是整体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与组合信度系数CR均达到了理想值，说明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关于建构效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均能分类归入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交流互动、师生关系、学习效果和学习态度六大维度之中，从而表明指标体系量表关于维度的选择和各题项的设计符合理论假设模型的意义与涵义。并且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所确定的指标权重，避免了主客观赋值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与科学性。可见，结构方程模型在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体现了良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三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交流互动、师生关系、学习效果与学习态度六维度之间高度的相关性，符合理论假设模型中六维度共同反映课堂教学的架构体系。具体来讲，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即是一种相互促进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对课堂教学评价的贡献发生变化时，会相应地引起另一个相关因素对课堂教学评价贡献的变化。因此，从六维度的相

关关系来看，评价课堂教学时需要同时纳入课堂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交流互动、师生关系、学习效果与学习态度等因素，缺一不可。然而，当前国内课堂教学评价的内容还主要集中在教师素质和教师教学行为的评价上^[12]，并没有涉及交流互动、师生关系、学习效果和学习态度等评价要素。这种建立在传统教学思想上的评价指标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所以现在迫切需要转变评价理念，着眼“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习为中心”的评价理念，从评价教师的“教”转向评价学生的“学”，指标应本着注重学生的学习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等原则进行设计，将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师生关系、学生的学习态度与效果等指标纳入到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中，从而构建系统化与多样化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四是所构建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模型拟合度良好，符合理论假设的二阶因子模型，各维度在指标体系模型中的重要程度平分秋色。根据6维度的权重，交流互动与学习效果被赋予的权重最大，教学方法次之，然后是师生关系与学习态度，教学内容所占权重最小。由此可见，对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交流互动、学习效果与教学方法的评价相对与其他指标显得尤为重要，这无疑聚焦了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的着力点。首先，研究型大学的课堂教学应该强调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推行一种广泛交流、交互影响的课堂，充分体现交流的价值与意义^[13]，同时还应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学习，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师生之间基于任务展开合作、对话和探究，在彼此知识、思想的碰撞中，达成意义生成，实现情感体验和精神升华^[14]；其次，教师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着眼学生的学习效果，培养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意识，加强程序性知识与元认知知识的学习，即教师引导学生应用知识、转换思维方式，掌握研究的思路与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达到学生学会学习目的；再次，教师应以“问题式”教学为主，辅以“讨论式”与“案例法”教学，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交流沟通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发展；此外，随着教育国际化及创新创业教

育的需要,创新能力无疑成为当今社会对人才要求的首要能力,同时也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驱动力,而探究式学习对促进创新能力的发展得到了国际认可,被认为是一种创新学习模式和有效学习方式^[15],相应地,研究性(探究性)教学同样如此,不仅有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有助于探究式学习方法的掌握。可见,探究性教学是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灵魂,也是契合现代社会发展对创新人才的要求^[16]。因此,研究性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理应得到研究型大学重视与推行。

九、结语

当我们在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卓越教育时,应回归于课堂教学,着力于课堂教学评价,通过教学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课堂教学实践新的教学理念、推行新的教学模式。本研究所构建的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兼顾了经验的观点,并通过了严格意义上的检验与修正,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可以作为研究型大学改进和完善研究性教学的有效工具。但由于教学评价指标的选取往往映射的是最新的教学理念或是最新的教学目标,所以随着新理念与新目标的树立,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也要随时更新,决不能“一劳永逸”。因此,研究型大学在借鉴本研究评价指标体系时也应考虑本校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目标,适当地加入新的指标,形成适于自己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从而适时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发声、发力。

参考文献

- [1]吴建新,欧阳河,黄韬.专家视野中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设计:运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进行的调查分析[J].现代大学育,2014(5):74-84.
- [2]樊长军,张馨,连宇江,等.基于德尔菲法的高校图书馆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J].情报杂志,2011(3):97-100,169.
- [3]C Fornell,D F Larcker.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1(18):39-51.
- [4]胡平波.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维度结构及测量[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111-115.
- [5]吴明隆.问卷设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 [6]胡荣华,陈琰.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统计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1):80-91.
- [7]王国颖.民营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18-127.
- [8]龚放.大学“师生共同体”:概念辨析与现实重构[J].中国高教研究,2016(12):6-10.
- [9]瞿振元.着力向课堂教学要质量[J].中国高教研究,2016(12):1-5.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研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示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
- [11]刘佳.第四代评价理论视阈下高校教学评价制度的反思与重建[J].教育发展研究,2015(17):56-61.
- [12]孙超.美国研究型大学学生评教的政策、特点及启示:以斯坦福大学为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8):38-40.
- [13][16]卫建国.以改造课堂为突破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J].教育研究,2017(6):125-131,128.
- [14]吴仁英,王坦.翻转课堂:教师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因应策略[J].教育研究,2017(2):112-122.
- [15]邱文教,赵光,雷威.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探究式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6):138-143.

Research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ndergraduate Classroom Teaching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Word-cla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pert Experience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Li Shuohao Fu Yangli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t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should be returned to classroom teaching, focus on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guide classroom teaching to practice new teaching concepts and promote new teaching models through its value-oriented role. As a pioneering institution that impacts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research universitie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ased on the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Bloom's educational target taxonomy, this article initially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en it uses the Delphi method to widely solicit the first-line teachers' opin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lastly, it use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test and corre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inally, it draw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the opinions of front-line teachers are quite reliable, and their views on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deserve attent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 good, an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is verified; the evaluation elements cover 6 first-level indicators like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interac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learning effects", "learning attitudes" and 29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the indicators of "exchange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s" in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Key words: Research Tea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以卓越计划2.0版为契机 推进高等工程教育改革

刘志军 夏远景 朱 泓

摘要: 分析并总结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情况,阐释卓越计划的实施理念以及培养学生工程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从分段培养、统筹安排;面上推进、点上突破;强化实践、搭建平台;校企协同、产学研一体;面向世界、拓宽视野;强化认证、注重评价六个方面剖析实施卓越计划需要把握系统性、实践性和全面性。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指出实施卓越计划2.0升级版对持续深化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加快新工科建设、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教育体系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高等工程教育;卓越计划;创新实践;新工科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35-05

一、引言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大改革项目,也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目前,全国共有208所高校1257个本科专业点参与,涉及20余万本科生;共有514个工学学科的专业型硕士专业点参与,涉及近4万名研究生的培养^[1]。卓越计划从2010年启动以来,各高校纷纷出台各项举措,不断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持。卓越计划历经七年的探索改革和系统推进,促进工科专业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密切加强专业与产业界协同育人、持续提升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随着卓越计划2.0升级版的实施,对深化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必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卓越计划的实施理念

卓越计划是一个工程教育改革项目,不是“优中选优”,不是让学校评选优势专业进行重点建设。卓越计划要形成一套各具特色的专业教学改革方案,不必也无需统一设定标准或规范。卓越计划实施高校和专业必须认同和认可卓越计划的关键要素,不能脱离核心要素另搞一套自认为特色突出的实施方案。卓越计划还要根据各校的校情和专业的办学定位、发展现状及历史积淀,制定各具特色的实施方案。卓越计划突出工程师后备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应该是卓越计划实施专业进行专业整体卓越的定位规划和行动方案,不能办成“尖子班”的培养模式。

卓越计划需按不同的培养模式,实行“工程教育不断线、创新实践不断线、企业合作不断线”的课程配置体系,改革传统的按科学家培养工程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加大实践环节和企业学习的内容,注重工程系统的思维训练。在工程、技术、科学、人

作者简介: 刘志军,男,内蒙古赤峰人,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家工作组秘书,从事化工过程机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夏远景,女,吉林松原人,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办公室主任,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朱泓,女,江苏无锡人,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家工作组成员,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文、社会、伦理等方面按不同比例分别设置一定的学分,构建“大工程观、大系统观、大集成观”的工程知识体系,使学生掌握会做的本领、判明该做的论据、懂得可做的界定、估量工程的价值。

三、强化工程创新与实践

学校在实施卓越计划时,必需着重强调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培养要高起点、高标准、高层次,要立足于很高的综合素质之上,特别要强调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国际视野,尤其是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卓越计划要防止将工程教育简单地工程化处理,即面向工程不能简单化为面向企业,面向企业不能简单化为面向岗位,面向岗位不能简单化为面向技能。

卓越计划强调面向工业界,但不能是低层次的定岗和顶岗实习,需要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锻炼能力、启迪智慧、创新思维,并在学习中强调科学素养、工程素养、人文素养、国际视野的培养。卓越计划需要在注重理论知识扎实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在不改变学制的条件下,实施工程型本科、研究生分段统筹培养模式改革试点,构建了“本科”“本科+工程硕士”“本科+学术硕士”“本科+硕士+博士”“本科+博士”等贯通式工程人才培养模式。要本着“行业指导、校企合作、分类实施、形式多样”的原则,参照通用标准和行业专业培养标准的基本要求,结合学校特色和人才培养定位,重新修订卓越计划实施专业的工程师培养标准,并建立标准实现矩阵。

卓越计划实施专业的企业学习阶段计划,不是原有实习计划的简单延长,也不是实践教学改革项目,而是卓越计划总体方案中的子方案,需要在学校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考虑,在专业层面形成形式多样、各具特点的子方案。卓越计划的实施要注重企业环境,尤其要选择规模适宜、技术先进、管理科学、创新突出的企业,小作坊式的生产企业以及小规模在校办企业等都不适合作为学生企业学习和工程实践的合作基地。也就是说,合作企业要适合本专业学生培养的需要,还要规划设计好学生

在企业的教育培养标准和具体教学内容。

学校和专业要梳理相关的工程实践课程,强化毕业设计等工程实践环节的训练。在课程重组中,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研究哪些知识需要补充完善,哪些内容需要重新设计,哪些环节需要重点强化,要全面审视工程教育的课程体系和内容,既不完全否定已有的培养体系,又要体现在高水平学术素养上强化工程意识和工程素质。学校和专业还要研究和规划需要聘请高水平的企业界人士讲授的部分课程或某些课程的部分内容,要让卓越计划实施专业的学生真刀真枪地去做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要密切结合工程实际。

四、卓越计划的实施方案

为保障“卓越计划”的顺利实施,各高校需以“工程教育”为重点,建立“工程”与“科学”、“工程”与“技术”相融通的课程体系。针对“工程科学”型、“工程研发”型、“复合交叉”型、“技术创新”型、“技术开发”型、“技术应用”型等不同类别的工程师培养,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各高校也要树立“现代工程师”的人才培养观念,从制度保障、组织管理、实施方案、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管理模式、资源建设、质量监控、企业合作、政策支持等各个方面,构建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卓越计划实施专业要完善与卓越工程师培养相配套的机制体制,如工程学习、企业实训、奖学奖励、学业规划、执业培训、接续教育、教师聘任、师资培养、人事考评、兼职教师、校企联盟等运行和管理机制和体制问题。

(一)分段培养 统筹安排

实施卓越计划的专业,首先要考虑修订培养方案。在制定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时,必需致力于建立坚实的全面素质教育基础,可在不改变学制和学位授予条件下,采用“4+2”的两段贯通式培养模式,即通过4年的本科培养和2年的工程硕士培养,造就未来的卓越工程师人才。

以大连理工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为例,专业秉承了原“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60年来所形成的鲜明学科特色,并推出了全新的培养方

案。其核心思想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重心由单纯“设备设计”向“开发高效节能单元设备以及先进成套装备技术”转变；二是人才培养目标由“建设型”人才向“开发型、创新型”人才转变；三是人才培养模式由“狭隘于技术和技术上狭窄”的模式向“可再塑的工作材料（即进行工程师素质培养）”转变；四是注重于学生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培养。

（二）面上推进 点上突破

各高校根据校情选择了不同的卓越计划实施方案，有的高校成立的求是学院、工程学院、工程教育学系等，在这些机构内全面实施校级卓越计划培养模式改革试点；有的高校在卓越计划实施专业单设了卓越计划班，选拔少部分学生进行卓越计划班学习；也有一些高校在部分工科专业对全体学生实施全面卓越计划培养改革。

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学校采取“面上推进、点上突破”的方式，实施专业全口径卓越计划。学校全面实施了卓越计划专业培养方案调整，面上做到整体推进，同时学校也统筹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协同育人实践基地，点上力求深入突破。学校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在其下属的苏州热工院建立核电人才培养基地，从2007年至今，每年约有25—30名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在该基地集中学习实践一年后，进入中广核集团公司工作。与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大工—米其林卓越计划班”，从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分子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6个本科专业选拔25—30名本科生进入卓越计划班学习，双方还共同建设和管理“大工—米其林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完成了大工—米其林卓越计划班的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与百度、浪潮集团、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大连石化、中化集团等公司合作建设实习、实训和实践平台，建设了30个高水平的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从卓越计划的内容、途径、措施、方式等多方面进一步明确校内和校外平台的建设任务和重点。

（三）强化实践 搭建平台

卓越计划实施高校要努力搭建校内外创新实践平台建设，加强学生的实践创新教育。大连理工大

学加强校内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建成8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卓越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资源保障。学校继续推进4个“一”制度，支持大学生开展大规模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每年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700余项，参与学生比例超过50%。国家级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设立研究型实验和学科体验性实验，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共开出181个实验项目，为学生自主学习与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卓越计划的实施要以学校为主体，但需要企业深度参与学生培养。企业需要建设高水平的校外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基地。大连理工大学先后与30余家企业合作签署协议，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其中20家企业获批为第一批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单位。“大工—米其林”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了“全开放制造岛式FMS实践教学系统”等实践平台；“大工—中化沈阳院”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成了“MiniPlant 农药产品及各种化学中间体”公斤级成套装置等，满足了卓越计划专业学生进行工程研究和开发设计工作。

（四）校企协同 产学一体

高校需要做好卓越计划的教师培养和外聘工作，需要建立一支校内外共同参与的卓越计划实施的人才队伍，还要重视校内教师的培训和评价转变工作。卓越计划需要大学和工业界共同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学校围绕卓越工程师应具备什么知识、能力和素质，明确哪些是大学阶段培养的、哪些是大学毕业后培养或实践提升的；大学阶段的人才培养哪些在校内完成、哪些在企业完成。对这些问题，校企要协同制定校内外培养内容、计划、职责分工明确，并提出具体的培训要求和阶段要求。学生学成毕业后，由企业负责后续培养工作，企业要明确把工程师培养成什么、培训些什么，并制定出具体的培训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校企协同、产学一体。

为加强工科专业青年教师工程实践培训，大连理工大学规定，自2008年起，1968年1月1日后出生的教师在晋升副教授或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时，原则上应具有在大中型企业累计6个月以上的全职工作经历。同时，学校也积极做好卓越计划的校外导师聘任工作，

并为相关企业人员发放卓越工程师联合指导教师聘书。聘请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开设部分课程,并且承担各个教学环节,如专题报告、认识实习、生产实习以及毕业设计等。每个实施“卓越计划”的专业均与合作企业共同确定了10名左右的企业兼职教师,并确定了兼职教师的工作职责。学校与企业联合开设包括“企业文化”“企业与生产管理”“项目设计与实训”“汽轮机原理及装置”“基本电气设备”“核工程概论”等近100门课程。

(五) 面向世界 拓宽视野

卓越计划需要培养学生懂得国外工程技术的实施过程,要对国外工程规范、规程、标准、程序等有所了解和把握。这就需要卓越计划专业的部分课程内容进行重组和改造,使之既能体现我国的工程技术标准和行规,又体现国外的工程技术标准和行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理解国外标准、用好中国标准的国际化人才。

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学校通过国际访学、国际企业实习等手段,加强国际化工程人才的培养力度。学校加大与欧洲工程类高等学校务实合作的力度,在人才培养、教师培训、教材开发和科研合作等方面开展务实交流与合作,与44所法国高校进行了实质性的接触和合作,积极推进相关的专业领域的师资培训和人才培养工作。学校还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法国IFMA机械学院及法国Clermont工程学院在工程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事宜展开了务实的合作与交流。2010年开始,学校从高等教育国际化需求出发,开设了3个国际班:化学工程与工艺国际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班、土木工程国际班,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的精英人才为目标,从培养定位、课程体系、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

(六) 强化认证 注重评价

以“成果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三大理念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卓越计划专业完善工程人才培养的评价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卓越计划实施专业要积极争取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从而进一步完善工程人才培养的评价机制。专业认证和评估从理念、目标、方式等各方面均与“华盛顿协议”

成员的国际工程教育实现接轨,可进一步营造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氛围和环境。

卓越计划的实施也需要建立卓越计划的咨询指导和组织管理机构,组建校外咨询和评价委员会,制订相应的质量标准和培养方案。对教师的评价从侧重评价理论研究和发表论文,转向与评价工程项目设计、专利、产学研合作和技术服务等并重考虑,不能只强调前一个方面,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二者并重。

五、打造卓越计划2.0版

当前,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国家要实施重大发展战略、产业要实现创新转型升级、产品要用中国标准说话,这些都需要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的强有力支撑。在此大背景下,各高校都面临主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产业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卓越计划开始确立的目标是“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但现在,需要打造卓越计划的升级版,需要从“面向”转向“引领”、从“适应”转向“带动”、从“跟踪”转向“领跑”,这就需要各高校持续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快新工科建设,做好“理念引领、结构优化、模式创新、质量保障、分类发展”五方面的工作,尽快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教育体系。

六、结束语

2017年6月,新工科研究与实践专家组成员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标志着新工科建设的正式“开工”。新工科作为卓越计划的升级版,主要从八个方面对卓越计划的内涵进行深化、拓展和丰富,包括:教育教学理念、学科专业结构、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多方合作教育、实践创新平台、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新工科应对新经济、新业态和新形势,对传统工程专业人

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卓越计划着重强化工程实践能力,新工科更需要创新能力强、研发引领性好、技术化能力快、国际竞争力高、具备高素质复合型的新工科人才。学校要打破学科与专业的壁垒,培养学业精深、原始创新能力强、交叉融合、技术优秀、同时又懂得经济、社会和管理,兼具良好人文素养的人才,满足我国新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 [1]林健.新工科建设:强势打造“卓越计划”升级版[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3):7-14.
- [2]朱泓,李志义,刘志军.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6):68-71.
- [3]胡锦涛,银建中,刘志军,等.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探索[J].化工高等教育,2013(2):11-14.
- [4]刘志军,郝杰.美国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实施[J].中国大学教学,2016(10):43-47.
- [5]李志义,朱泓,刘志军,等.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导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2):29-34,70.
- [6]李志义,朱泓,刘志军.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5):130-134.
- [7]吴爱华,侯永峰,杨秋波,等.加快发展和建设新工科主动适应和引领新经济[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1):1-9.

Tak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n of Outstanding Engineers 2.0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Liu Zhijun Xia Yuanjing Zhu Hong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e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n of Outstanding Engineers 2.0 and expounds the implementing ideas of Outstanding Plan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that cultivates students'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bility. The paper tak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at implementing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Plan requires grasping systematicness, practical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well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staged training, overall arrangement; promotion on the surface, breakthrough in points;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e, building the platform; college-enterprise integration,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integrated; facing the world, broadening the horizon; strengthening authentication and focusing on evaluation. The paper indicate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Outstanding Plan 2.0 Upgrade in deepening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sustainabl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as well as forming the world-class engineering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

Key Words: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n of Outstanding Engineers;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New Engineering

牢记使命 创建新时代“一流课程”

——基于机械原理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实践

葛文杰

摘要:当前高校“双一流”建设要求回归一流本科教学,呼唤一流课程教学。如何建设新时代本科教学的“一流课程”?本文基于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建设实践,提出了新时代“一流课程”建设的理念、思路、做法与实践效果。

关键词: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教学模式;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4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等教育要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是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课程教学又是本科教育教学的核心。建设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回归本科教学,呼唤一流本科教学,建设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1]。面对经济全球化、科技日新月异和互联网发展,知识、产品及产业更新加快,知识学习的变革和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高等工程教育进入了一个“互联网+创新教育”的新时代,迫切要求加快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如何创建新时代背景下的“一流课程”?“一流课程”建设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课程教学的三个基本条件是教师、教材及教法^[2]。但在互联网背景下,知识学习已经不再是单一教材内容学习,教材学习只是课程学习的基础,而还要基于在线开放课程共享资源和互联网相关课程内容最新知识进行多元化学习,所以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教学应该在“互联网+教材+课程”资源背景下来组织课程教学,课程教学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知识传授,而是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新时代“一流课程”建设的标准应具备“五个一流”:一流教师队伍、一流精品教材、一流共享课程、一流教学

方法和一流教学质量。课程教学要能体现立德树人和学生能力培养,能促进个性化、多样性及创新型人才培养,并能发挥出教学示范带动作用。当前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推进新时代“一流课程”建设,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与水平。

机械原理课程是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的一门核心技术基础课程,在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尤其在机械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占据重要的教学地位。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原理课程,在前辈孙桓教授带领下于1957年建立,课程历史悠久,教学底蕴深厚,教材使用广泛,示范引领性强,一直在全国同类课程教学中有广泛的影响。近十多年来,本课程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创建“一流课程”的使命,坚守本课程师德业精育人文化,传承课程建设与教学优势,积极探索课程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和创新教学,推进新时代的教师队伍转型提升、教材内容深度改革和数字化课程共享资源建设,推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创新能力,创建新时代机械原理“一流课程”,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基于这一教学改革与实践,提出了“一流课

作者简介:葛文杰,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机械基础课程教学基地负责人,国家级教学名师,从事机械原理与结构学、仿生机构、关节及仿生机器人学研究。

程”建设的理念、思路、做法与实践效果。

一、坚守课程师德业精育人文化，创建新时代一流课程教学团队

教育的根本是立德树人。课程教学的本质是教书育人，也是本科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当下本科教育改革是由过去以教师和知识传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和以价值塑造、知识学习及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创新教育转变；而课程改革是由学生被动学习和单一考试评价的人才培养模式，向学生自主学习与能力培养和个性化、多样性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方向变革。在这样改革发展背景下，课程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要解决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和教书育人责任担当落实问题；其次要解决适应新时代信息化教学和创新教学能力的提升问题。因此，适应新时代高校教师发展的要求：师德业精，教研兼备，始终能处在知识创新的前沿，并充满创新活力。

当前高校教师存在职业倦怠，教学投入与育人担当和教育敬业与奉献精神不足等普遍问题，是影响当前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教师队伍建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中国优秀的师德师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实践。对此，本团队前辈们数十年用毕生精力投身于的机械原理课程建设与教学，长期开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教学法研究活动，树立了“以德为先、敬业奉献、潜心教研、精心育人”的师德业精育人课程文化，建立了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和“试讲制”等一系列做法，并形成了“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也形成了教师课程教学的师德师风和教书育人文化优势。但也存在传统专业基础课教师，长期科研薄弱，自身创新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创新教育教学发展的要求。对此，本课程提出了“传承与创新”的队伍建设理念，采取本课程师德师风与业精教研文化传承，并与信息技术融合和创新能力提升措施创新的教师队伍转型提供建设思路，解决教师适应新时代师德师风、教书育人能力和转型提升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实施“三个措施”：

一是坚守基础课教学一线和课程教学试讲制、教学法活动和教学研究与课程建设等教研活动且不断线；坚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和潜移默化的教书育人的课堂教学教风；传承前辈在本科教学的优秀职业情操和敬业奉献及教学工匠精神。

二是不断探索课程教学与网络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更新课程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新方法和新技术，开发教学共享资源，提高新时代教书育人的能力。

三是采取在职攻博提升学历层次、出国交流访学增强国际视野和与专业课程教学融合及争取课题促进科研，提升教师知识创新和创新能力。

实现了本课程由传统基础课教学型的教师队伍向适应新时代高校教师发展要求转型提升。通过多年实践，本团队教师的教学与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获得极大提升，承担了2003年以来教育部立项的所有相关课程的国家级教学项目10项和国家级科研项目11项，教师的博士化率、出国交流访学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率均由零获得突破，并均达80%；教师中获省部级师德楷模、优秀教师奖及特等奖共6人次，获国家教学名师1人，并获评国家级课程教学团队。这一教师队伍建设经验，在省内外部分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教师培训、教育部教师网络培训中心面向全国机械原理教师的培训和教育部机械基础教指委的骨干教师培训活动中，产生了新时代教师建设的示范效应。

二、教材传承与内容深度改革，建设新时代一流精品教材

教材是课程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基础，教材内容是对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和课程教学思想、教学方法与教学适应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发挥课程教学改革、教学示范引领、成果推广及应用的重要载体。因此，一流课程必须有一流精品教材为支撑和引领。

一流精品教材建设，首先要有长期课程教学积淀和一版又一版不断修订和教学精品锤炼，形成课程自身优秀的教学思想、精品内容和教学适应性强的教法，能获得好教好学和优秀的育人质量教学效果，深受学生和教师欢迎。本课程所编《机械原理》（高教版），第一版教材1961年就被确定为该

课程唯一本全国通用教材,已经七次修订再版,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四次被列为国家重点规划教材和全国精品教材,在全国同类课程教学中有广泛应用和影响,形成了精品教材建设的优势。其次,教材还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反映时代发展要求,适应时代教学与人才培养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强国建设”战略,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也就是说,实现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和目标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撑和引领。新时代高等教育是由支撑型向支撑与引领型的教育转变。于是教材内容建设,已经不仅仅只是满足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和技能培养,还要着眼于国家未来的创新引领发展和国际创新竞争力人才的培养,还要能反映具有创新引领的新内容。因此,新时代一流精品教材建设,也必须坚持“传承与创新”建设理念,开展教材内容深度改革。

为此,本课程先后以“十五”至“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七版和第八版修订为契机,着力解决前几版教材的专业面窄和内容陈旧以及与新时代教学不适应问题,采取了传承本教材的教学与图文匠心设计、教学文字严谨和好教好学等教学优势,汲取国外优秀教材先进经验和科研反哺教学,与信息技术和创新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开展教材内容深度改革,要做到四个面向:面向学生能力培养,面向数字化技术与工程应用,面向未来创新引领发展和面向教师教与学生学。具体体现在:充实优化经典内容,加强图解法内容,突出厚基础、强思辨和强化课程图解逻辑思维和科学与工程问题的简图抽象思维以及创新想象力培养;扩展了适合数字化分析与设计的解析法,通过实例和案例教学引入新例题与新习题,设计反映与现代生活、现代工程和科技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的关联和需求;尤其率先引入机器人机构及其设计一章新内容,提出了一套空间运动副表示符号,特别是首创引入中,引入“最小阻力定律”和欠驱动、冗余驱动、变胞机构及柔性机构等许多最新机构知识,突破传统机械设计概念,具有引领未来机械向“人一机器人—环境共荣”的绿色环保和安全高效

的创新发展,增强未来我国机械产品创新设计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前瞻性教学。不仅使教材内容具有时代感和大工程观与创新视野,又适合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学习和启迪创新,并引导学生利用互联网获取最新相关知识学习。

修订再版后的《机械原理》第七版和第八版,先后获评“十五”至“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教材,第七版获评普通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已有国内314所各类高校使用,累计发行量为81万余册。教材也取得学术影响力极大提升成效:据中国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版)17.7发布的各学科TOP3名单:本教材在“机械、仪表工业”学科榜上有名排第三,可见教材对知识创新研究的引领作用。本教材改革与建设经验“《机械原理》教材建设的传承与创新”被教育部“2015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研讨会”受邀大会报告,对全国高校“十三五”教材建设产生了示范引领性作用,获普遍认可。

三、课堂优秀教学法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创建一流精品数字化共享课程

当下高校课堂教学信息化:课堂教学普遍采用单一“PPT翻片+照本宣科”讲授方式,又同时普遍存在学生课堂参与度和抬头率低而教学效果差的突出问题。追其原因:“文字+图片”的PPT多媒体教学,虽教师讲起来比较顺,但绝大多数教师属受PPT主导式的讲授,呈现照本宣科的效果,互动效果差,学生难于参与。其问题在于:一是教学法设计不足,缺乏像黑板粉笔教学那样引导学生一步一步认知过程;二是PPT的翻片,缺乏像黑板那样的长时间保留促进学生思考,学生一旦前面没听或没听懂,后面就无法再跟上并继续听下去。因此,传统黑板粉笔教学虽传达信息有限,但在课堂教学仍有不可完全替代的教学优势,尤其教师引导学生认知示范作用和较长时间的保留有利于学生思维和参与。

本课程前辈孙桓教授将多年教改研究总结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措施和过程优化”教学法(曾获国家教学成果奖,并发表论文)。为此,传

承这一课堂优秀教学方法,并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采用能随讲解步步显示又能灵活控制和重点保留的多媒体编程技术,开发课程的知识点和例题及案例讲解等多媒体教学素材,以及供教师课堂教学使用的电子教案和素材库等电子教学资源。

为了基于网络在线教学与学习资源,构建在“互联网+教材+课程”的资源背景下,学生多元化地自主学习课程,并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本课程以主持5项国家级教学项目(网络课程、网络精品课、资源共享课和在线课程MOOC(慕课)以及教学资源库等)和校级网络流媒体视频课等项目为推动,先后建设了新世纪机械原理网络课程、网络流媒体视频课(48和32学时两种课)、网络教育国家精品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等最丰富完善的网络教学共享资源,以及线下学生自主指导学习光盘。从而为实现新模式教改提供了最完善的一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资源。

四、线上线下教学深度融合,创建课程教学一流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质量

当前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效益,加大改革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一是要加强课堂教学中教师言传身教和育人担当的教风;二是改革课堂讲授模式,将灌输式变为引导启发式讲授,增强课堂教学互动的学习效果;三是改革课程教学仍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学生仍处于被动学习,学习效果及效率不高的现状,尤其缺乏个性培养,同质化现象严重;四是促进课程教学与创新教育融合和教学机制建立问题,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因此,要改进课程教学方法,推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创新教学育人的质量和教学效益。

为此,基于线上与线下、面向教师线下课堂教学与面向学生在线学习的优质教学资源,推动构建以教师为引导,以学生为中心,在“互联网+教材+课程”下的课程教学新模式改革:

一是用“黑板粉笔+教具+电子教案素材”手段,改变课堂填鸭灌输式为引导式、启发式和探究

式讲授,突出课程思想方法和知识架构教学,回归课堂教学言传身教和教书育人的本质,提高讲授与学生互动效果,弥补互联网知识学习碎片化不足。

二是基于慕课和资源共享课,构建“引导讲授+慕课学习+翻转课堂+讨论课+研讨课”的线下与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和课程成绩综合评定机制,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与教师课内外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效率,激发学生创新兴趣和思维。

三是课程实践教学——课程设计以设计为内容,与课程理论教学的启迪学生创新兴趣和创意密切结合,从设计理论教学到鼓励学生创新选题,再到创新方案设计的内容贯通,以3—4人成组化的设计小组,开展个人提出创新方案和小组讨论优选,再到大班交流和讨论,最后到协作一起完成,并与课外机械创新设计竞赛活动和课外创新实践与创业训练项目对接贯通,从而形成课程教学与创新创业实践融合的创新教学机制,形成以课程教学为支撑和引导,让学生在学中做,以赛促学、以创求业,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教学效益。

经近年来的教改实践,课程教学显著提高。学生的知识学习由单一教材学习转变为以教材为基础、在线课程为拓展和互联网为最新的知识学习模式;课程教学由教师引导讲,到最后研讨课由学生主讲最新知识的完全翻转的教学模式,推进了校内机械创新竞赛活动,受益学生约400人/届,获国家级奖12项和省级奖70项;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和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3项,学生作品获发明专利30余项,并由学生注册公司1项,获金砖国家创客大赛二等奖和优秀奖各1项。因此,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

参考文献

- [1]吴岩.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J].中国大学教学,2017(11):4-12,17.
- [2]张大良.因时而动 返本开新 建设发展新工科——在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大学教学,2017(4):4-9.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and Create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course for Mechanical Principles

Ge Wenjie

Abstract: At present,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request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call on first-class discipline teaching. How to establish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s, thoughts, ways and practice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course for Mechanical Principles.

Key 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Teaching Reform; Teaching Modes; Talents Cultivation

征稿启事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正式学报类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军民融合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名家访谈等。

本刊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关于投稿,具体事项如下:

一、来稿要求

1. 来稿须为学术论文,结构完整,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2.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省**市)、职称、所在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
3. 获得基金资助的稿件,请注明立项单位、项目名称、时间、编号。
4. 参考文献格式请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5.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愿改动,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稿件的审理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理办法,将在1个月内回复初审结果。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7. 优稿优酬,嘉奖名篇。

二、投稿事宜

1. 来稿请发至shekexuebao@nwpu.edu.cn。
2. 本刊地址:西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楼A座127室 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3140。

三、其他约定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超星域出版平台”等数据库,并授权网络合作方使用本刊稿件。不愿通过网络媒体发布者,请在来稿中注明。

走进“一带一路”：跨体系的文明交汇与历史叙述

——汪晖教授访谈

汪 晖 臧小佳

摘 要：汪晖教授基于历史、地理、政治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必然与中国智慧，同时也深刻地指出该倡议实施过程中将面临的潜在挑战；汪晖教授于全球性的时空结构变换与跨国间的新兴交往模式中，以“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之概念，创造性地叙述了当今重塑我们生存方式与想象空间的全新世界秩序。汪晖教授同时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新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这也是这项伟大倡议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汪晖；“一带一路”；跨体系社会；跨社会体系；历史叙述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1-0045-09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与中国智慧

臧小佳（以下简称“臧”）：很荣幸汪晖教授能够出席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所”成立仪式。您来到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西安，和以“三航”（航天、航空、航海）为特色、正在积极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西工大，有何特别感受？

汪 晖（以下简称“汪”）：我从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故乡古城扬州出发，一路上也在思考我的故乡与西安这两座城市在千年间的地理、历史变迁，感慨颇多。扬州在地理上属长江北，文化则属江南。在唐朝，西安相当于现在的北京，扬州等同于今天的上海，各领风骚。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并开始实践的倡议，意味着一个新型全球化、跨文化时代的开始。

今后如何发展，是一个持久而重大的议题。就此而言，西工大成立的“‘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所”有着巨大的学术研究与想象空间。而“一带一路”同时也意味着海洋与陆地和空间的区分有别以往，这一倡议可以被视为海洋时代的“大器晚成”。西工大所关注的“三航”，正是超越早先海洋时代的最基本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工大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使命。

臧：作为人文与社科领域的学者，您认为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格局巨变之后，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何历史、文化、政治及地缘前提及背景？

汪：实际上我们今天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上述前提与背景是无法回避的。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视。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①，2015年来清华演讲时曾说：“假定‘一带一路’最终能成功，就是中国模式的国际

作者简介：汪晖，男，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从事文学史、思想史研究；臧小佳，女，四川成都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从事法国现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普鲁斯特研究。

说 明：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思考如何冲破传统理念束缚，探索与当今变迁相匹配的社会与文化交往模式，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所”。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应邀出席揭牌仪式，就丝绸之路与跨文化体系交往等话题发表演讲。本文系根据汪晖教授的演讲和访谈由臧小佳副院长整理并添加注释而成。

化成就,这就意味着(我的)历史终结论不能成立。”苏联解体时,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命运的讨论。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世界历史学界出现一种现象,即试图解释:在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20世纪之前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国家,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国家,为何却仍能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地缘和人口统一。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等其他一些旧帝国就都解体了。

而中国,恰恰在这一历史时期显示出其独特性。如果理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可以说它体现为两个独特性,二者分别体现于20世纪的起始与结束两端,且相互关联。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世界各大历史帝国解体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一战结束时解体了,奥匈帝国消亡了,俄罗斯帝国则分崩离析。旧有帝国形态逐渐解体,意味着19世纪的政治模式走向终点^②。这一传统大国(帝国)体系起支配作用的框架随着帝国解体,即奥斯曼和俄罗斯这两大相邻帝国的解体,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进一步推动了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开端的独特性即显示出,在各大帝国解体之时,中国在清朝覆灭、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内忧外困中,衍生出一系列各个区域的自治运动。这一状况乍看与欧亚间各大帝国的分崩离析状态相似,但却似而不同:恰恰是经历了20世纪早期的动荡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产生了中国革命,导致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变化,重新奠定了国家政治模式的基础。所以两者看来相似,实则不同。

其次,从地缘上来说。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瓦解后,中国和其他帝国相比,命运完全相反,今天谈论的“中国”含义也有变化——国体变得相当稳固。以近代中日关系为例,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到甲午战争(1894—1895)实行的大陆政策中,中国正是其核心部分。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1938)(思想形成于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剖析了为何在日本最强盛的时期,其大陆政策仍趋向失利的诸多因素。其中之一为:日本如果真正了解中国历史就应知道,中国即便失去沿海地区所有主要城市,也不意味着中国的瓦解,而结果相反。从地缘上说,在其所谓的“大陆”

政策中,日本人理解的(中国)大陆与中国人、尤其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中国,完全不同。日本人理解的(中国)大陆受到欧洲思维影响。英文中China的含义,通常指的是长城以内的中国,而长城之外的区域是独立的、另外的想象空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就中国国情而言,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为地大物博。周总理这句话包含了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区在西北、西南等地之意。而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中,所谓“大陆”并无此含义。日本人并不理解中国国土辽阔、有着极其宽广的战略纵深之巨大意义。他们自以为已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但实则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所以当时西北、西南地区成了拯救中国的重要地域。如果没有大西北和西南地区,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毛泽东从战略的角度说的第二段话是:如果战争发生在欧洲,敌人占领了几个中心城市,比如伦敦、马德里、巴黎,对这些国家来说是灭绝性的结果,因为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经济命脉都在这些中心城市。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沿海和内地之间差别巨大。这种高度不平衡(区域差别、贫富差距、城乡差别)确实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但在地缘上看,在中国即便占领了南京、上海,对西北和西南内地的影响却极为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战略纵深。今天的中国发展仍不平衡,这是我们需要克服的;但另一方面,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通过经济转型,大大缩小了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转而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不像有些国家,一旦经历经济危机就会垮掉。当然,前提条件是国家必须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能够协调内部。反观欧洲(欧盟),看起来每个国家内部发展都比中国平衡,但其整体政治结构问题却无法解决。欧盟当时处理希腊债务危机的代表团来华访问时,曾经问我,如果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在中国,中国会怎么做?我说,这在中国不会发生。即便中国发生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也不过仅仅是某个相对贫穷一些的省份发生的财政问题,并无可能衍生为全国性危机。

最后,从政治上来看。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发展的年代,中国都有其政治独特性。

而中国的状况,常常被外界忽略的问题,除了地缘上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还有政治传统的独特性。例如,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却迥然不同。我们都知道,199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一些我们熟知的人士和“预言家们”,都认为中国差不多三个月就要垮掉,或者五个月。后来这种说法变成一年,再后来是三年。大概说到五年的时候,就有人发现,中国又重新崛起了。流行一时的“中国崩溃论”突然在某个时刻论调转变,结果是“中国崩溃论”自己先“崩溃”了,演变为“中国崛起论”。

这就是为何我们今天讨论“一带一路”、探讨跨文化问题,实际上必须讨论其历史、地理、政治前提,这样也就能解释19世纪以来为何世界各主要帝国相继崩溃后,以及1991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成为全球唯一能够持续地理、人口、文化多元统一的国家。

臧: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体现了哪些历史的必然以及中国文明和政治智慧?同时您认为倡议实施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潜在的挑战?

汪: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20世纪90年代,有很多关于“区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的讨论。区域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受了1992年欧洲统一进程加速、冷战终结,以及欧盟形成的影响。而今天欧盟却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麻烦,例如英国脱欧、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倾向等问题。其实“一带一路”的真正智慧正是体现在与上述区域整合观点的差异之中。

20世纪80和90年代,中日关系有一段蜜月期。当时日本有学者和媒体提出过“亚洲区域整合”这个话题。我记得当年日本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亚洲区域整合要学习欧洲模式,学习法德和解,以达成中日和解,促成亚洲共同体。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先提出了“10+1”合作机制^③,日本随即提出了“10+3”机制^④。日本后来为平衡中国力量,又提出了“10+6”合作机制,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也纳入其体系。但这一地缘政治区域整合很快也出现了麻烦,即:欧洲的区域整合问题在亚洲也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亚洲地区制造一个类似大欧盟

的超级国家计划非常困难。因为亚洲内部的文化体系、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历史问题均异常复杂,难以构成基本统一。欧洲(欧盟)的政治制度有其统一的西方民主制度为基础,他们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他们有着不愿意承认、实际上潜在的共同文化根基:基督教文明。换言之,欧洲各国之间的共同性使其具有建立超级国家(supra-nation)的可能。但在亚洲地区,我们没有这样的根基。

美国的中国研究先驱者、哈佛大学费正清^⑤教授曾提出一个重要概念,称之为“朝贡体系”^⑥,即是针对当时欧洲所谓的“条约体系”而来^⑦。日本学者滨下武志^⑧,在其关于朝贡体系的著作中提出,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原有连接中国与亚洲各国的朝贡体系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是变化的方式(主要是贸易)在继续。日本的研究重点是亚洲沿海区域,主要是海洋的朝贡关系。但如果我们研究尼泊尔历史、英属不丹历史,更不用说缅甸、泰国、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史,都会发现存在很多朝贡关系。滨下武志所提出的朝贡体系中,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提出网络(network)概念,即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就是一个网络,虽然是以中国为中心,但每一个地区都保持其相对自主性、能动性,灵活地参与到朝贡关系中。“朝贡”这个词虽然听起来有中心倾向,但实际上更具有参与性,只是维系于一个统一的朝贡关系网络,而每一个朝贡关系都会根据其参与的朝贡主体之位置和力量而决定。同时,朝贡模式具有弹性(一年一贡、两年一贡、三年一贡亦有差别),所以用网络的概念是为了突出其弹性。这一结论已预示了亚洲与欧洲共同体制度之不同^⑨。

因而在亚洲地区讨论其跨社会体系,其中的历史传统有二:一是朝贡,另一为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其实包含着古老的概念,尤其是丝绸之路(虽然“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为欧洲人首先采用)的实践是非常古老的,它是亚洲各国古代文明之间发生关联之处。它可以被称为丝绸之路,或者盐茶之路,也可以叫玉石之路,这些关联都是在这条路上产生的。这一概念与欧洲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叙述的概念重心并非国家势力,而是连接各个国家的纽带。简言之,这是“路”,是纽带,

而非势力。

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四个字：“路”“带”“廊”“桥”。这四个字是具象的，它们意味着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前提必须是能动的、主体的、参与的、相互关联的、邻国的，也意味着这一概念不可能从上至下而是平行互联。所以中国强调“一带一路”不是战略，而是倡议（initiative），其重点就是不希望“一带一路”变成一个绝对中心主义之体系；恰恰相反，“一带一路”要求沿线国家不断参与，强调各国互联互通，相互不断交流，保持灵活性，也因此能保留对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尊重。当然，“一带一路”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挑战。就文化的重要性来说，我遇到一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大企业负责人，他们认为现在最困难的是文化层面的交流。我们的互联网、金融、铁路都通进去了，但是如何与当地人民交流，如何让所在国家有参与感，而并非仅仅是我们强加于人，不只是我们为投资者，他们是资源输出者，这是一个挑战。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倡议是巨大的机会，但也有人心存疑虑。我们强调“路”“带”“廊”“桥”的互通性，而不是强调主体性，这是具有高度智慧的。它正是凝聚了中国古代的智慧思想所产生的结果。

面对质疑和疑虑（例如有人说“一带一路”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我们至少可以与欧美相比较，同时也可自我提醒：不要重复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模式，应该真正强调平等、尊重、相互沟通和交流参与。我们可以将“一带一路”的最基本概念与构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几个最主要特征相比较。后者首先是对领土的占领^⑥，而“一带一路”不涉及对任何领土的控制，而是尊重当地国家主权，促进参与。其次，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规模屠杀和驱除当地原住民（在北美、澳大利亚、以及很多非洲西方殖民地，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清洗），这在“一带一路”概念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第三，对河海的垄断，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和奴役，这是高度殖民化的政治体制之结果。而“一带一路”则以尊重当地国家的文化、政治及主权为前提，所以它不构成剥削、垄断、殖民的关系。第四，后者对自然资源

的垄断，即对当地资源的垄断。殖民主义势力也曾掠夺过旧中国的矿产和森林资源，它们对中国自然资源的垄断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而实现的。与此相反，“一带一路”是通过与当地国家、政府和社会建立的网络关系来重构相互贸易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应自我提醒，如果有重复旧殖民主义的迹象，那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即为正常。我们都经历了20世纪的历史，中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民是经过殖民统治的，我们不应、也不会对别人进行霸权统治，这也是“一带一路”思想的重要凸显。

二、“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的历史叙述

臧：您刚才提到了跨社会体系。在面对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社会文化交往难点时，是否可以借鉴您曾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即“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这是两个突破传统历史叙述的概念，可以在历史的横截面上，观察和讨论民族在社会交往中的渗透、社会间的体系跨越、以及不同体系间的复杂关系。可否请您分别解释这两种概念的提出背景？

汪：一般来说，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时，通常把一个社会看作是相对同质，即具有很高共同性的社会族群。但事实上，中华民族有其复杂的体系交错和融合。

先说我们占中国93%人口的汉族。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制度被重新建构，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万世一系”^⑦。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羡慕西方，希望我们的社会和文明体系也能追溯到最古老的根源。章太炎先生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深知民族本身带有政治和文化内涵），其实就是想把中华民族解释成一个种族、一种文化和政治构架，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其实很难做到。晚清很多民族主义者甚至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血统之“混杂”而自惭形秽。确实，中华民族具有高度融合性。曾有一位德国友人首次到北京，我陪他去长城。在长城上我沿路告诉他，哪个是日本旅游团、哪个是韩国旅游团，因为中国人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当时这位德国友人未置可否。但

晚餐时,他说:“我是德国人,对种族问题很敏感。当你说谁是日本人、韩国人时,你没说还有很多其他人来自哪里。我根本分不清谁是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倒是你没说的那些人,虽然都是中国人,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一目了然。”后来我意识到,我们自己很少觉察到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性,因为我们有很多共通点,往往无需思考差异问题。而在长城上的南方人、北方人,福建人、广东人、西藏人、蒙古人,在欧洲人眼中,差异非常大,他们反而无从区分日本人、韩国人与中国人。在中国的边疆地区,这一差异情况更加复杂。我在云南丽江的朋友,他的家庭就存在着四个族群通婚:他们父母之间,他和他妻子(穆斯林)之间。四个族群各有其历史、文化、语言、信仰,但他们却组成同一个家庭。所以我提出了“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体系是什么?粗略说,是语言、宗教、文化、族群。它们都可以被称为自身体系。但这些体系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错的,大到社会,小至家庭,更小可以到个人。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跨体系的。每个个体都可以有多重身份认同。虽然身份认同在很多人看来是冲突的,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的多重性是常态,它并非必然是冲突的,多重中反而有很多共同性。这就叫“跨体系社会”。

那么为何我要提出这个拗口的概念呢?而没有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儒家文化,这些很多人都在用的词汇,特别是儒教文明、儒教文明圈、汉字文化圈。这些在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通过日本传到中国的词汇和概念,中国人自己也在用,说我们是儒教文明圈,我们是东亚文明,在西方也常见此类表述。而我则反复强调,中国虽然确实是一个东亚国家,但中国不仅仅是东亚国家,也可以被视为中亚国家,中国还有部分区域可以属于南亚和东南亚。中国不是像日、韩一样仅有单一的东亚文明。中国的文明甚至可以延伸至北亚文明,因为我们的东北地区邻近西伯利亚。上述这些概念的套用,其实是来自西方人看中国的眼光。我常想,儒教当然伟大,我自己也研究儒教。但如果说中国文明就是儒教文明,就过于将我们的文明简单化了。那么伊斯兰文明是否中国文明?换句话说,中国文

明,其实比一般所说的儒教文明要更广阔,它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智慧,儒教智慧是其中的一部分^②。而文明的概念本来就是混杂的,任何一个文明都带有其它文明的痕迹,西方语言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他者”(other)的痕迹。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并非源自欧洲(欧洲流行的其他很多宗教也都是外来的),但到了欧洲就变成了它的文明。可见构成其文明主体性的,并非一定源于本身,而完全可能来自他处。再如佛教,可以被视为我们内部的宗教,但它不可避免的也包含着他者,这个他者不是简单的外部因素。我们必须清楚,他者,可能有两层含义:一个他者就是别人,还有一个他者就是自身的另一部分。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很多他者,既存在于内部,又内外关联。对于这一点,自我认识是前提。与此同时,它带来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如何叙述自己的历史文化,包括最具包容性的“文明”这一概念。就此意义而言,我提的“跨体系社会”概念并不敢说有多重要,而是觉得多少能借助它指明,如果我们单纯沿用旧有概念,本质现象可能会被模糊、被掩盖的。

将第一个概念倒过来说,是我的第二个概念,叫“跨社会体系”。跨社会体系这个词,我多少受了一点望文生义的启发,受影响于法国重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③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叫“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 system)。在莫斯的时代,对社会的认识都带有政治特点,社会在那个时代越来越具有实证性。莫斯的超社会体系指出,其实人不是单个的人,超社会体系中存在着习俗、礼法、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说人与人的交往并非仅源自物质利益,也不是单个的个体交往,人与人的交往背后其实有着一整套体系。时常在我们不自知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常常已经不止是两人。这背后通常有一整套体系,我们的习俗、价值观、想象,甚至整个宇宙观都在其中,影响着我们与他人发生交往。莫斯提出这一体系概念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研究社会学不能仅仅是基于实证意义。如果没有文化,不了解习俗礼法,就无法真正理解社会。

我把莫斯的概念稍加变化称为“跨社会体系”,与“跨体系社会”相照应。因为一个社会本

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完全封闭的,它一定是向另外一个部分开放。我们可以试想在新疆,有哈萨克、乌兹别克或其他等等族群。然而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联想世界和宗教世界却与外部的文明相关联。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跨社会的体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痕迹。就少数民族来说,我们中国少数民族有内地的民族,有跨境民族,有些少数民族有母国,有些没有。这些地区不同体系之交往逐渐衍生出一个新的社会,其中每个社会均相互关联,但每一个社会内部又是跨社会的。就一个体系而言,它是跨社会的。我们会发现语言、宗教、族群往往都是跨社会的。以上两个概念也是相互连带的。

臧:您在“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全球范围的共时性关系之诞生,即空间关系被纳入时间关系中的叙述(最经典的表述是传统/现代),时间关系也被不断地重新空间化(东方/西方)。“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这种打破传统时间和空间政治历史叙述策略的概念,是否正是形成于这一新的全球化共时性关系以及海/陆空间关系的变迁中?

汪:实际上中国的经验是与中国历史变迁模式有关系的。在历史叙述中,学者们关于中国的历史应该从哪里叙述,从何方向去叙述,一直存有多种争议。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桑原鹭藏^⑥在其重要著作《南北的中国史》中认为,中国历史是以南和北的运动为中心,例如晋人南渡、宋朝南迁,南和北都是历史巨大变化的轴心。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加剧,中国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写过一本暗含批判日本学说的著作。他提出,东汉前很多历史变迁是以东/西为轴心的,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东洋史学的重要学派,称之为“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很多著作都被译为中文,我们习惯于把它们作为史学著作来看,却往往忽略了其中的历史叙述。京都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内藤虎次郎(1866—1934)有个著名的假说叫“唐宋转变”^⑦。在他的描述中,唐朝是一个大帝国,有贵族体系和四通八达的陆上贸易,但唐朝政

治制度还没有像宋代一样发展出最正规的科举制。虽然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但是唐朝的宰相除个别以外,几乎都是贵族出身。到了宋代,文官制度、郡县制度的兴起以及规范化,可被视为早期的,或者说准民族国家的雏形。此外,宋朝另有几个重要特征:一为国家版图较小,二是以运河为中心。因为北宋迁都从洛阳到开封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国家发展从黄河中心向运河中心的过渡。由于运河通向沿海,内陆和沿海贸易又促进了内陆的分工,形成了宋代所谓的铜钱经济^⑧。所以唐朝到宋朝的政治制度模式之转变,实际上代表着贵族体系解体。另一方面,从内陆移向沿海的贸易发展,促进了海洋和沿海贸易、商业性的城市化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矛盾。所以由唐到宋的区域性转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黄河到运河的转变,也促进了明清之际江南的兴起。因而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历史,而宋朝以后就是以运河为中心的历史。另一位京都学派的学者叫宫崎市定^⑨即持有这一观点。

在谈到宋朝时,我们有必要解释“东洋”这一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东亚已经是个正常的地理范畴。但日本学者当时谈到东洋,包括提出东洋史这个概念,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日本近代史。日本在近代崛起时,一直很难处理它与中国的关系,因为日本始终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日本应该如何叙述自己的历史呢?所以它将中国置于东洋的范畴,这样它就可以把自己也放在东洋文明之内。一方面日本可以作为东洋的独立文明与西方文明竞争,另一方面在东洋文明内部存在着中心的转移,即原来东洋文明以长安为中心,后来是以洛阳、开封为中心,再后来以江南(运河)为中心,到了19世纪,就是以沿海为中心。如此一来,这一转移也意味着东洋文明权力的中心由中国逐渐趋向日本。所以东洋史的核心是借此来论证17世纪(德川时代)之后,为何日本成了东洋的核心。过去有日本学者关于日本的历史叙述,认为早期近代日本的开端,第一阶段始于10世纪宋代,第二个阶段源自14世纪的朝鲜,第三个阶段就是德川时代的17世纪。从这一叙述中可以看出,日本东洋史的内部叙述,实质为论证权力中心的逐次转移。

史学家研究历史，当然要做很多考证。但有时这些考证研究往往我们自己都未能明白，实则受制于其背后的知识和权力。因而在美国讲学时，我提到唐宋转变这一历史叙述之本质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观念实际上是当时日本帝国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中的一种透视，尽管它的政治涵义今天已经消失。

历史叙述的关系在19至20世纪间，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变。19世纪是日本的崛起，20世纪以来，是美、英等国进入历史叙述，并由此造成叙述权力关系的大转变。这一大转变立刻引发的重大挑战既是实证的、也是知识的，就是海洋对内陆的挑战。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就是现在中国国内研究蒙古史、伊斯兰区域史的很多学者提到的欧文·拉铁摩尔[®]，其经典著作名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1940）。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种新“中心观”——长城中心观：即中国历史不一定非得以长安、开封、江南为中心来叙述，也可以长城为中心来叙述。拉铁摩尔认为，早期长城是游牧和农耕民族相互交往的纽带。长城本是军事防御工事，但是游牧与农耕两个文明之间相互交往的走廊就是长城周边。所以他将边疆（*frontier*）又解释成互通边疆（*inter-frontier*）：既是你的边疆，也是我的边疆。边疆由此成为一个边疆地带，且是模糊并不断转移的。但实际上，拉铁摩尔提出边疆地带真正的背景是，历史已发展到西方列强和海洋力量，也就是工业化力量和军事影响起支配作用的年代。所以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扩张，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都是来自北方。但到了19世纪，由于西方的介入而形成倒置，即海洋力量向内陆，以工业化为转向动力，促进城市力量迁徙，资本由沿海走向内地。他的这一论点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并非完全正确。因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极为悠久，特别是当帝国统一之时，它的内部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统一之后，其流向具有高度灵活性。所以说中国历史不都是简单的由北往南，相反方向的运动也有很多，这也就解释何为文化多样性。所以近代以来海洋中心的出现，是近代民族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的联系，产生了所谓海洋势力的调整。工业与先进技术均源于海上，

所以西方人称之为“海洋时代”。因而日本人谈其历史，很明确地说，我们的历史就是海洋。

臧：您刚才提到海洋时代的“大器晚成”，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全球化时代之新的海陆关系？

汪：这也是我思考今天的“一带一路”的内涵。我认为这意味着在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海洋时代并未终结，而是大器晚成，也就是说海洋的重要性重新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和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两位欧洲哲学家曾经探讨过海洋时代的终结问题。但在我看来，欧洲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中海有重要关系。地中海被欧洲人看成是内海，尽管它其实并非内海。今天是怎样的时代呢，不再是只有地中海为内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都可以被视为内海。所谓的大洋如果是内海的话，就意味着大洋和内陆的关系再也不是19世纪以前的关系了。也可以说海洋和陆地的截然区分正在消失。

我们现在有“路”“带”“廊”“桥”，有高铁，更不用说还有互联网。也就是说原来由交通主导的工业资本主义对内陆文明的绝对主宰性、压迫性、霸权性，正在消失。就此意义而论，如果“一带一路”成功了，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仅为中国带来变化，而且是全球性的变化。因为这就意味着从16至19世纪，欧洲，以及后来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中心论，必然走向终结。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这一论点，而是它被重新消化，转变为“一带一路”。当年海洋时代，塑造国际关系基础性的力量，即欧洲最重要的势力，就是海洋国家。英格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等，还有海盗。海洋的背后其实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历史。这一历史今天并未真正成为过去，其过程还会继续。未来会有很多国家、很多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黑客，都会参与这一新的秩序塑造，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想让这个局面向更加和平、更加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向发展，超越16至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19至20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想象这些新的秩序和世界就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想象模式。当然这也不仅仅局限于想象模式，还要有内涵和能量。康有为早在1884年即创作了《大同书》，但“大同”如果缺乏能量也不行。这一能量

如何运转,与想象和智慧有极大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这是自1493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世界关系发生变化直到今天,在东亚从未有过的能够重新塑造世界关系的新时代。它确实需要高度的原创性和综合思考才可能构成。

臧:随着这一新的世界关系时代之到来,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该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

汪:每一代人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们这一代也一样。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史叙述基本上都是朝西方看,看美国、看欧洲、稍微近一点是看日本,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严重失衡。我们几乎不了解非洲、不了解拉美,对我们周边的邻居也鲜有了解,使得我们在这些领域几乎找不出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因而“一带一路”同时也带来了知识的挑战,这不仅是一点点,而是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有不少人精通俄文,但现在我们这一代学者能说俄文的已经不多了。然而,俄罗斯,以及印度问题,都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挑战。整个中亚地区高度不稳定,突厥语系国家的研究也需要真正的专家,不仅懂其语言,还须懂其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还有非洲、拉美,更不要说我们周边的若干第三世界国家。所以除了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这些语言专家,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泰语、印地语、爪哇语、孟加拉语等等语种的人才和学者。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之了解也微乎其微。我们现在有很大的经济体量,有金融、有高铁,这确实值得自豪。我们也为自己的历史文明而自豪,因为这些精神财富不是每个民族都拥有的,这种自豪感我们必须保持。可是今天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我希望我们在上述语言与学科领域能够产生真正的学者,做出真正需要的成就。未来半个世纪,中国不会再过多依赖欧美,但中国学者自身是否能在知识、思想、心态以及其他方面也能有相同的转变?我们这一代人说起欧美头头是道,谈到“一带一路”许多国家却非常无知。应对这一挑战就是你们的使命,就是你们这一代年轻学者超越我们这一代人的最重要的方向。

爱德华·萨义德^⑨当年在评论塞缪尔·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⑩概念时曾说:这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而是无知的冲突。要知道,我们在很多时候确实是非常无知的。这也是今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们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在知识上要有重新改造自己的激情和勇气,就好像19世纪晚期康有为的一代、“五四”一代人,真的想要重新改换自身知识结构那样,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头脑。唯如此,才能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才能真正走进“一带一路”。这既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机遇。

注释

- 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日裔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其主要著作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的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
- ②19世纪政治形态的标志可被视为世界几大帝国体系:英、法、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可参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③“10+1”即东盟十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与中国的合作机制。
- ④“10+3”即东盟十国与中国、韩国、日本的合作机制。
- ⑤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学术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泰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 ⑥参见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 1987.
- ⑦日本学者虽惯用“册封体制”“华夷体制”的表达,但实质则暗合于费氏“中国世界秩序”之说。此外,滨下武志等重要学者也曾直接采用了“朝贡制度”的说法。
- ⑧滨下武志(はました たけし, 1943-),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等。
- ⑨在这点上,有很多关于欧盟的批评,即认为欧盟其实是专制体系,而非民主制度,因为它没有投票选举,没有民主

协商, 其运行只是基于几个主要国家的寡头协议。

⑩参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⑪即指所有天皇都来自同一家族, 因而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历史那样的皇朝更迭。

⑫儒教中最有政治性的部分恰恰是它的民族融合性, 即各种各样适应变化的方式, 把这些差异统一在一个共同体内, 这是儒教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⑬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1875-1950), 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是埃米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的学术继承人。主要研究早期人类社会的交换, 以及交换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独特的关系。

⑭桑原鹭藏 (わばらじつぞう, 1871-1931), 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蒲寿庚之事迹》《东洋史说苑》《东西交通史论丛》和《东洋文明史论丛》等。

⑮“唐宋转变”是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绕过的一个基本命题, 在美国已成为关于中国历史的核心命题之一。

⑯宋代内部是铜钱经济, 外贸则用白银, 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或黄金的硬通货。实际上银锭也是双重货币。

⑰宫崎市定 (みやざき いちさだ, 1901-1995), 日本东洋史学家, 战后日本“京都学派”导师, 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第二代巨擘之一。

⑱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1900-1989), 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 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幼年时随父来华。1922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后周游新疆、内蒙和东北各地, 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因其同情中国革命, 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时期受政治迫害, 被迫迁居英国。

⑲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 Said, 1935-2003), 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其主要著述有《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

⑳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 曾谈及, 其名著《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之再创》(1993) 一书, 题目为编辑所定, 他并非完全赞同。参见J. S. R., “Samuel Juntington, Prophet,” *Harvard Magazine*, January-February, 2018, p. 20.

Reaching the “Belt & Road” Regions: A Trans-system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sections of Civilizations and Historical Discours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Hui

Wang Hui Zang Xiaojia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Hui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geography and politics. Meanwhile, he points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profoundly the Initiative will face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 modes of global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national emerging exchanges, he narrates a new world order that nowadays reshapes our life style and imaginary space creatively with the concept of “trans-systemic society” and “trans-social system”. He also points out that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not only provides new chance to understand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for Chinese scholars, bu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hich also shows the meaning of this great Initiative.

Key words: Wang Hui;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rans-Systemic Society; Trans-Social System; Historical Narration

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之挑战

何成洲

摘要: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偏见带来的隔阂。这个问题虽长期存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复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际学术和文化界的争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西方学界常常用他们认可的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甚至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本文首先回顾近年来围绕世界文学的争论,在此基础上讨论莫言、北岛等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在西方传播接受过程引起争议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新形势下中西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文化交流的缺乏。有鉴于此,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需要采取一些新的策略和措施。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反思新出现的问题,在新时代不断开拓我们的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莫言;北岛;世界文学;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54-08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与挑战是学术界和文化界长期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长期以来,有关讨论的出发点是:在西方图书市场上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非常稀少,图书馆里收藏的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少之又少,西方人阅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少得可怜。对比之下,中国图书市场上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相当多,中国各类图书馆收藏的西方文学作品多如牛毛,中国人阅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相比西方人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要多得多。有鉴于此,有关学者和文化管理部门提出,要大力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觉得有必要首先澄清几个问题:首先,大家讨论这一议题中的“世界”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欧美”代表的西方,而非真正指世界。道理很简单,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周边国家的文学?比如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国家的文学?我们了解多少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甚至,中国的年轻读者了解多少俄罗斯的当代文学?其次,我觉得在这些讨论中,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

的翻译和接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希望西方国家多了解当下中国的变化,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这也是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所决定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需要增强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再次,与我们现阶段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与文化软实力有关,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被翻译到了西方,而是要真正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喜爱。过去有一些失败的翻译项目和作品,就是因为虽然传播到了西方,却没有能够吸引读者。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个议题修改成“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的问题与挑战。

对于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接受的尴尬状况,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总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中国文学的翻译严重滞后,不仅总体数量小,好译本更少。而且语种分布上不均匀,英语的翻译相对来说偏少。“从语种分布看,中国当代文学有25种语言的翻译,应该说分布还是比较广的。但各语种之间明显不平衡,英

作者简介:何成洲,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从事欧美戏剧、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研究。

文翻译明显偏少。”^[1]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才非常有限，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屈指可数。第二，西方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文学缺乏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欣赏的困难，另一方面是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公正评价，他们常常拿西方的标准来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一些英文翻译的质量问题又往往挫伤了西方读者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损害了当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知识界的声誉。第三，全球范围内图书市场不断地萎缩，受到影视和多媒体出版物的影响，欧美的出版商出版纯文学的热情在下降，更何况是翻译的文学作品^[2]。其它观点还有不少，包括有人引用西方翻译家的观点指出，有些中国作家语言比较粗糙，写作缺乏国际视野^[3]。下文会对此进一步分析，这里暂且点到为止。

需要指出的，不满意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接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期待有很大的距离，而并不是因为这个接受情况持续恶化。恰恰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由于国内和国外因素的推动在不断地得到改善。“现在的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则呈现出多元的格局，从经典的纯文学，到商业化操作的流行文学，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层次的作品都有译介。当代文学翻译成为展现中国现实、透视中国文化的载体，承载了多向度的复杂意涵。”^[4]^[29]我本人也觉得近年来，尤其是在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欧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在加快，投入其中的资源越来越多。但是，要取得根本上的改变仍然非常困难。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码事，而要让西方读者愿意阅读进而喜欢上中国当代文学是另外一码事。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探讨。本文认为，以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讨论当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带来的隔阂与偏见，即使像莫言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依然被误解，甚至被攻击。西方学界常常用他们认可的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甚至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在分析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在西方传播接受的个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回顾

一下近年来围绕世界文学的争论。

一、近期世界文学之论争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的概念是德国大文豪歌德首创的。1827年，歌德有感于当时各国文学之间的互相关注与交流而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在书信和谈话中反复提及。他提出“诗是人类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5]。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借用了这一术语，认为在新的全球贸易语境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虽然世界文学的概念早已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学术界也作了很多研究，但却没有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确切定义或精准界说，成为众说纷纭的“世界文学难题”^[7]。

2002年，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出版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由此世界文学的讨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学术界对于世界文学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各个国家优秀文学作品的总和，还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包含所有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达姆罗什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文学能够在本民族之外传播和接受，由此他提出了构成世界文学的三个方面：翻译、流传与阅读。可以看出，翻译对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层面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往往决定它的文学被翻译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西方的文学被大量翻译成中文，而鲜有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的语言，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另一个是语言层面的，英语作为全世界通用语言，掌握的人多，容易被翻译成其它语言；而西方掌握中文的人非常有限，将中文翻译成英语等西方语言困难重重。更何况，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而翻译的低质量和数量又极大地妨碍了文化上的交流和合作。因此，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

在其著作《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

治之维》中，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讨论了所谓的“欧洲纪年问题”，这一问题是由文学历史与批评的西方范式一直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而造成的。比如，文学历史分期在各个文化中都有所不同，而这主要依赖于不同地区的政治和历史。在中国，“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文学。阿普特认为，“这些不同的时间标准或许可以被界定为时期不可译性”^{[8]61}。在摒弃单数的世界文学之后，阿普特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周蕾也敦促比较学者思考“世界文学在非西方情形中意味着什么或者已经意味了什么”^[9]？因此，从中国视角反思和讨论世界文学，将对当前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理论建构有所贡献。

为了规避世界文学造成的负面意义，西奥·德汉（Theo D’haen）提出了“全球文学”的概念。他认为世界已经不能再按照白人/有色人种或者殖民/后殖民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区分，需要采用“全球方法”和“全球视角”来观照文学。“全球文学”并不否定比较文学、后殖民研究及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允许一种更加超越的视角，用更长更广的视阈考察特定作品、特定作家、具体文类的内在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在相同或相似的压力、境况和情形下‘世界化’它们的世界”^[10]。德汉试图用一种更加中立的、全面的、超越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阅读方法，纠正以往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倾向，将英语文学与其它语言的文学放在同一个全球语境下进行考察，构建一种平等的世界文学图景。

近些年，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非常特殊。一方面，外国文学被大量翻译、阅读和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尤其突出，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当代汉语文学——无论哪国作家创作的，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特别是青年一代读者太少。当然，长期以来人们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学习一切有益于中国文学发展之知识。但另一方面，令中国知识分子尴尬的是，外国人翻译、阅读中国文学非常少。这种极不平衡的文学交流不仅表现在只有少数中国作品被收录在英语的世界文学选集里，还表现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和批评受到政治与

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一些负面的评价强加于人。随着中国成长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人们期望外界对中国文学有更浓的兴趣和更好的理解。“理想情况下，应该重新设计文学教学以便对新出现的世界体系格局做出及时反应。”^{[8]39}然而，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比如欧美国家学校和大学课程中的中国文学相关教学没有显著增加。相反，西方已经在指责中国推行语言、文化帝国主义，这体现在某些欧美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抵制和批评中。在当前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既存在由来已久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和偏见，又存在全球化时代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新中国威胁”论。在这个背景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引起的争议值得我们反思。

二、莫言、高行健与诺贝尔文学奖之争议

2012年10月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外的一些人，其中有旅居海外的华人或者中国人，便开始批评莫言，有些人甚至公开指责诺贝尔委员会犯了错误。在一次访谈中，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竟然过分地说，诺贝尔委员会选择莫言是“对所有维护民主和人权人士的一次打脸”^①。对于莫言的批评在这一年12月诺奖颁发前夕达到了一个高潮。在题为《该作家配得此奖吗？》文章中，林培瑞（Perry Link）批评莫言，说他自觉地向中国政治制度妥协。“像莫言这样的作家清楚地知道体制策略，或许他们并不喜欢，但在实践中却选择让步。这就是在体制内写作的代价”^②。莫言有一个官方身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于是，西方的学者就认定他的文学就是替政府歌功颂德的，没有采取文学创作上一贯的反思和批评现实的立场。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对瑞典学院将诺奖授予“一个屈服于体制甚至参与歌颂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作家”表示怀疑^③。在某些情况中，反对授予莫言诺奖的批评与反对所有中国作家的论调没有什么差别。在2012年10月1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

上题为《作家、国家与诺贝尔奖》的文章中，作者不但质疑诺贝尔委员会选择莫言的决定，而且认为没有任何中国作家配得此奖，其理由仅仅是他们都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创作。文章以专横挖苦的语气结尾：“那么问题是：伟大的、永恒的文学能出自那里吗？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可以。你觉得呢？”^④

2012年12月7号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他的诺贝尔演讲《讲故事的人》^⑤，他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⑥

无疑，这是莫言的自我辩护，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公开承认“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了争议”。其实，在我看来，莫言采用极为地方化的叙事书写中国乡村，既避免了过度政治化，又建构了“一个对官方历史叙事构成补充而非解构的乡村历史”^⑦。

也有学者，如查尔斯·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夏谷（Göran Sommardal），为莫言辩护，反驳针对莫言的批评。罗福林反问道：“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批评莫言的人：除非中国作家和艺术家更‘勇敢地’直接批判政府和政治制度而招致入狱或流放，甚至更糟，他们的艺术劳动和成果就永远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国际认可？”^⑧很明显，围绕莫言获奖的争议并没有多少关于文学自身美学价值的，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

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发生在莫言获诺奖上，也出现在莫言的翻译上。通常，西方翻译者在选择翻译中国作品时也在考虑西方读者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于中国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他者的想象。在谈到自己为市场目的而翻译《酒国》时，葛浩文作了如下解释：“在《酒国》中，莫言已经抛弃了像《红高粱》那样激情四射的小说风格，华

丽辞藻和尖锐评论，那些引起读者强烈情感的有关中国近期悲剧性感伤故事的自传色彩都消失了。这里，一切让位于超脱的讽刺作家，他运用机智、单调人物和模糊事件，冷静地解剖当代的政治和社会结构。”^[11]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翻译家，葛浩文知道美国读者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感兴趣，特别是对体制的讽刺性和否定性批判^[12]。

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心态，评论者不惜抬高翻译者的作用。一些人甚至声称，葛浩文提升了莫言汉语原著的文学水准。“莫言小说的英文翻译，特别是优秀的葛浩文所做的翻译，实际上在美学统一性及确定性上优于汉语原著。”^⑨译文是否优于汉语原著应该通过翻译研究来判断，主观臆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比如，我发现葛浩文翻译的《檀香刑》中，很多原著的内容没有被翻译，例如，地方戏曲中的古汉语歌谣。总之，在莫言作品的选择、翻译和宣传的整个过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政治与意识形态也关系到另一位用中文创作获得诺奖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高行健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文作家，他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而闻名。在新闻发布会上，瑞典学院给高的颁奖词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话剧开辟了新的道路。”^⑩高起初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位实验戏剧家。而之前，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学生，高受到西方，尤其是法国文学和戏剧的巨大影响，他的早期戏剧与贝克特的荒诞剧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高的早期戏剧极为推崇个人主义，这在当时得不到赏识，他的大部分戏剧被禁演。为了逃避文化大革命，高来到长江流域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旅行。后来，他以此经历为基础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灵山》。在小说中，他批判了中国的主流文化，特别是集体主义思想。1987年，高移民法国，从此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永久地居住在那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高行健创作了戏剧《逃亡》，立刻吸引了西方知识界的关注。随着更多的高行健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他也因反思自由和

个人主义而广为人知。

《野人》和《灵山》的灵感都来自高1983年从北京逃离的经历……那是一次逃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放逐。重要的是，当他身处未遭破坏的环境和文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一个人独处时，他感觉自由自在……这次旅行是一个有意识的颠覆行为，一次精神的逃离，这更使他确信，只有通过逃离，一个人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保持他的完整^⑩。

作为一个旅居国外的中国流散作家，高行健引起了马悦然的关注，他将高的主要作品翻译成了瑞典语。马悦然是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中的唯一汉学家，他在高获得2000年诺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翻译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刘靖之说：“如果没有马悦然的翻译、支持、游说，高行健就不会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这样说并不过分”^[13]。同样，这是在夸大翻译的作用。这些人在做出如此推断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系统地阅读过莫言和高行健的作品？其实在中国文学走向西方的过程中，拿翻译说事一直没有消停过。

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国语言并在国外传播时，一些海外读者习惯于在固定的意识形态对抗模式内阅读它们。因为中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他者，当代中国作家与其作品也常常被作为中国官方文化的代表，而不是作为超越民族、政治、文化藩篱的个体艺术家或艺术作品。在《跨文化文学史：超越狭隘的世界文学观念》中，安德斯·彼得森（Anders Petterson）说：“某一外国作家用这一外语创作出文本，对该国文化历史的具体问题作出反应，发出不同声音，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特别关注。因此，我们应该用对话的方式对待它，将它视为个人声音，而不是整个文化的代表性标本。”^[14]文学作品表征文化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不应该狭隘地将它们阐释为某些特定政治体制的显现。在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争论，文化也影响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很多争论不仅涉及中国政治，而且涉及学者对中国持有的预先设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莫言获奖的争议在于，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艺术

上取得成就，但是没有足够的批评性；高行健获奖的争议在于，有人认为他得益于自己的流亡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艺术上没有达到很高的成就。由此可见，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暴露了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此外，他们争议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有人认为他们获得诺奖很大程度上得之于翻译，是西方人的翻译提升了他们作品的吸引力。二十世纪末北岛的诗歌引起争议也与翻译有关，尽管问题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

三、北岛与“世界诗歌之问”引起的讨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发生了一场关于政治与当代中国诗歌问题的著名争论，这场争论由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的文章《什么是世界诗歌？》引发。他质疑北岛诗歌的原创性，特别以《八月的梦游者》一诗为例。

“总体来看，北岛的诗属于国际诗歌。虽有地方色彩，但极少。那些真正的国际诗歌也不仅仅是翻译者的功劳，尽管她译技很高：大部分诗歌翻译了自己……如果这是美国诗人用英语写的，这本书还能得到出版吗？能被著名的出版社看上吗？”^[15]宇文所安认为，北岛以及当代中国诗歌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些中国诗歌是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而为西方读者创作的。“通过创作非常具有可译性的诗歌，再有幸遇到才华横溢的译者和出版人，他就能从当代中国诗人中脱颖而出，在西方获得在中国无法获得的绝对优势。”^[15]

宇文所安对北岛的解读震惊了评论界，引起了一股批评浪潮。周蕾在她的《书写离散》（1993）中，开篇就对他进行了尖锐批评：“当一个哈佛大学教授指责来自‘第三世界’的男女将自己出卖给西方时，他玩的是什么文化政治？当他批评北岛这样的诗人为自我利益而屈从于跨国文化中的商品化倾向时，他忘记了自己的思想也是被他投资的社会机构塑造的。”^[16]周蕾指责宇文所安被某种“东方主义的忧郁”所困扰。她所建议的“介入策略”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历史为参照来阅读北岛及当代

中国诗歌。

在专著《跨太平洋位移》中，黄运特对以上争论进行了回顾。他一方面认为宇文所安的论断是“诽谤性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满周蕾对字的批评，他说：

实际上，从主题上看，很多翻译成英语的当代中国诗歌往往生产了读者所期待的内容，是美国政治学熟悉的的东西，也是为自己服务的、假设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中应该遭受痛苦的美利坚叙事所熟悉的。被译介的典型诗歌一般讲述这类故事：为民主而战、渴望自由、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换句话说，这些诗歌可能容易被语境化为美国读者所熟悉的当代中国形象^{[17]166}。

这样的政治、历史语境化问题在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与批评中广泛存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创造了“先验的意识形态决定论”这一术语来指涉这种有问题的文学阅读和研究模式^{[17]176}，它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有害的。

宇文所安对于北岛的批评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北岛的诗歌模仿了西方的诗歌，因此没有自己的独创性。有学者指出，西方一些人（即使是貌似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学者）通常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解读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非西方的文学作品，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乏艺术性，目前仍停留在现实性描写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小说作品不会令人达到人们对法国普鲁斯特和爱尔兰乔伊斯的满意；比这更为有损害性的是，也许是其发展倾向使我们想起第一世界文化发展已过时的那些阶段，使我们得出他们仍然像德莱塞或安德森那样写小说。”^[18]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往往暗含西方为传播者，中方为接收者，限制了对于中国文学创造性和丰富性的认识。“西方读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固有偏见，对当下中国人的真实经验与审美表达不可避免地带着东方主义式的凝视。”^[4]陈思和提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观念，强调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把握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国外文学的启发，同时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要讨论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世界性因素，首先就是要破除这道迷信，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覆盖地球村各种文化区域的多元多姿的庞大格局，然后才能公平地探讨这一庞大格局下的多元因素如何在平等层面上构成人类世界的丰富文化。我们在讨论所谓曹禺的悲剧“命运观”时，不但应该追溯古希腊悲剧和西方现代悲剧的影响的蛛丝马迹，也应该注意到非古希腊传统以外的艺术家对悲剧“命运”的独特理解，从而来评价曹禺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舞台表现，在世界性的悲剧命运观谱系中增加了独特的东方文化精神的“命运”艺术^[19]。

中国话剧是从西方借鉴来的，作为话剧的奠基人之一的曹禺无疑在艺术创作上深受易卜生等西方戏剧家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抹煞他戏剧成就的理由。同样，北岛的诗歌有西方的影响，但是他的独创性不应该受到质疑。“只有突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价值异质性，这个问题才会是真实的，并且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中国文学的价值独特性。所谓挑战和困难就在于此。”^[20]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在于它的独特性。

四、小结

海外中国文学翻译、阅读与接受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绝不是只针对中国的独有现象。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重新架构世界文学。要解释政治为什么且如何成为中国文学全球化的重要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因素：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最近几十年的巨大社会变革，国内的文化政治，国际关系等等。世界文学的未来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通力合作，超越文化偏见，调和和文化差异。希利斯·米勒曾说：“文学的西方现代形式甚至不到三百年，将这一狭隘的文学概念全球化具有合法性吗？……世界文学学科怎样才能尊重全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理念？”^[21]因此，由世界文学的地区性引发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西方世界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耐心，一方面调动国内方方面面的力量和资源来推动，另一面还要有待于西方国家知识界和出

版界转变认识, 积极地采取主动措施来引进中国文学。在这个背后,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方的普通读者产生阅读中国文学的兴趣, 进而培育了中国文学在欧美翻译和接受的土壤。其次, 国内知识界对于中国文学进入欧美要有定力, 既不要为某些人, 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 贬低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而沮丧和恼火, 也不要因为中国当代作家获得一些国际奖项而盲目自大。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自信, 在充分肯定我们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出现的问题, 在与西方的交流和互动中, 进一步开拓我们的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

当前, 我们重视中国当代文学走进欧美的同时, 也要重视中国文学走向欧美以外的世界。我们反对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 也要警惕自身是否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实践西方中心主义。更不可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 让世界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印象, 从而让中国威胁论变成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走进欧美与走进世界不应该是矛盾的, 而是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走进欧美离不开全球的语境, 也不仅仅因为走进欧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走进世界, 而更因为只有我们走进世界的不同地区和人民了, 走进欧美才能够真正持久地取得成效。

注释

- ①转引自Flood, Alison. "Mo Yan's Nobel Nod A 'Catastrophe', Says Fellow Laureate Herta Müller." *The Guardian*. 26 Nov. 2012.
- ②Link, Perry. "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 Dec. 2012.
- ③Lodén, Torbjörn. "Mo Yans Hyllning till Mao Förvänar." *Dagens Nyheter*, 10 Dec. 2012. (<http://www.dn.se/kultur-noje/kulturdebatt/mo-yans-hyllning-till-mao-forvanar/>).
- ④Tatlow, Didi Kirsten. "The Writer, the State and the Nobel." *The New York Times*. 12 Oct. 2012.
- ⑤应瑞典学院的邀请, 本文作者前往斯德哥尔摩, 参加了莫言的“诺贝尔演讲”等一系列活动, 获得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讯息。
- ⑥莫言: “讲故事的人”。©诺贝尔基金会 2012 <https://>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yan-lecture_ki.pdf

- ⑦He, Chengzhou. "Rural Chineseness, Mo Yan's Work, and World Literature."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Eds. Angelica Duran and Yuhuan Huang.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P, 2014, p. 85.
- ⑧Laughlin, Charles. "What Mo Yan's Detractors Get Wrong." *New York Times*, 17 Dec. 2012.
- ⑨Sun, Anna.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The Kenyon Review*. Fall 2012. (<http://www.kenyonreview.org/kr-online-issue/2012-fall/selections/anna-sun-656342/>)
- ⑩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2000 - Press Release."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5 Dec 2014.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0.press.html)
- ⑪Fong, Gilbert C.F. "Introduction: Freedom and Marginality: The Life and Art of Gao Xingjian." *Cold Literature: Selected Works by Gao Xingjian*. Gao Xingjian. Trans. Gilbert C.F. Fong. Hong Kong: Chinese UP, 2005. VIII-L, xxiii.

参考文献

- [1] 高方, 许钧. 中国文学如何真正走出去? [N]. 文汇报, 2011-01-14 (12).
- [2] 王宁.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1-24 (B01).
- [3] [18] 马会娟.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 现状与问题 [J]. 中国翻译, 2013 (1): 64-69.
- [4] 季进. 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为例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 (1): 29-31.
- [5] 爱克曼. 歌德谈话录 [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13.
- [6]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31.
- [7] 方维规. 何谓世界文学? [J]. 文艺研究, 2017 (1): 5-18.
- [8] [9] E Apter.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M]. London & New

- York: Verso, 2013.
- [10]D Theo. "For 'Global Literature', Anglo-Phone" [J]. *Anglia*, 2017 (1) : 35-50.
- [11]H Goldblatt. "Forbidden Food: 'The Saturnicon' of Mo Yan[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0 (3) : 477-485.
- [12]熊鹰. 当莫言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时——对英语及德语圈里“莫言现象”的考察与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 (3) : 76-85.
- [13]刘靖之. 翻译与诺贝尔文学奖[J]. *中国翻译*, 2002 (6) : 43-44.
- [14]A Pettersson.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 Beyond Constricting Notions of World Literature*[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2013 (3) : 463-479.
- [15]S Owen. *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J]. *The New Republic*, 1990 (11) : 31-33.
- [16]R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4 (1) : 186-187.
- [17]Y Huang. *Transpacific Displace: Ethnography, Translation and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19]陈思和.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J]. *中国比较文学*, 2001 (1) : 8-39.
- [20]吴俊. 走向世界: 中国文学的焦虑[J]. *南方文坛*, 2012 (5) : 13-16.
- [21]J H Miller.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J]. *Neohelicon*, 2011 (2) : 251-265.

The Challenge of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He Chengzhou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recep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is an issue that merits attention, namely, the barriers caused by prejudices and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Entrenched as it is, this issue has become all the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 typical example worth further research is tha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cultural controversies broke out right after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2012. Western scholars often employ their standard of world literature to evaluat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ven attempt to exclude it from world literature from time to time. Based 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world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then discusses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spread and reception of some write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Mo Yan and Bei Dao, as well as their works in the Western world, which mostly result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ies and the lack of cultural exchanges. Therefore, some new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re discussed for the sake of better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While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e should reflect on the emerging issues and unceasingly broaden our worldwide vision and develop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 Yan; Bei Dao; World Literature; Ideology

小问题，大历史：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

李伯重

摘要：明清之际的南明永历朝廷，从建立伊始就处于不断的播迁之中，从广东转移到广西、贵州、云南，最后流亡到缅甸。这一皇帝流亡国外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永历朝廷为何要选择这样的西迁流亡路线？只有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得出合理的答案。用新的眼光来看问题，从“小问题”可以看到“大历史”。

关键词：全球史；南明；永历朝廷；西迁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1-0062-10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祯年间受封为永明王，1646年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戴为监国，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年号永历。他在位15年，辗转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地，最后逃入缅甸，为吴三桂索回，绞杀于昆明。在中国古代，皇帝流亡被称为“巡狩”，因此永历帝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也就是“永历西狩”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巡狩”之事屡见不鲜^①。不过像永历帝这样，从广东一路“西狩”到了国外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无仅有。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西狩”：永历朝廷的唯一选择吗？

因为无法抵御清军，永历朝廷只能不断播迁。但是除了“西狩”之外，永历朝廷还有其他的选项。

首先，永历朝廷可以东迁，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

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经营，到了永历时期，郑氏集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明亡之后成为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

郑成功率17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洋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次年郑成功再次率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后因郑成功轻敌，遭到清军突袭，大败后撤，试图攻取崇明作为再次进入长江的阵地，但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随后收复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郑氏集团在明亡后能够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可见其实力之强。

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支持永历朝廷。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郑成功宣布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随即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其子孙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郑氏集团在控制地区铸造和使用“永历通宝”，表示对永历朝廷的承认。

对于永历朝廷来说，东迁台海不仅路途近，而且比较安全。永历初期，广东在李成栋的控制之下。李成栋本是李自成部下，降清之后，官至广东提督。他后来反清，归顺永历帝政权，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11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托庇于李成栋的武力保护。如果李成栋无法抵御清军，那么由广东东渡到台湾也很方便。1651年（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清军大举南下，形势紧急。

作者简介：李伯重，男，云南昆明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永历帝召群臣商议，即有人主张到李成栋义子李元胤那里去，李元胤也上书奏请出海。此外也有人主张渡海依靠郑成功，或者主张进入安南避难。

因此，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到台海，投靠郑氏集团，在郑氏集团的武力庇护之下生存，应当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次，永历朝廷也可以南迁，从广西流亡到安南或者暹罗。

安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永历朝廷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前来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永历帝遣翰林潘琦与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朝的太上皇为安南国王。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镇南关，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今河内），行颁封礼。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广州，永历帝自肇庆逃至南宁。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永历帝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令其资矢、象、粮、銃，以助恢剿。该年十月，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宁，就有大臣议去安南。随着清朝控制中国大局已定，安南各政权态度逐步转变。但安南高平一带的莫氏政权仍与南明保持密切关系。永历十二年南明光泽王朱俨铁、总兵杨祥等逃入高平地界，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同时南明德阳王朱至睿与太监黄应麟等也居于高平，并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1]。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兵逼近昆明，孙可望拟派人把永历朝廷迁移到云南广南府。但因清兵逼近广南府，路不靖，遂断此议。永历帝出逃后，李定国南退撤至中、老、越边境，后盘桓于安南境界。如果永历朝廷要去安南，可以依仗李定国的帮助。由此可见，安南确实是选项之一。

暹罗与明朝关系一直很友好。据中国史籍记载，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的253年间，暹罗遣使来华访问达105次之多，居亚洲国家的首位^[2]。明朝遣使访问暹罗也达19次之多。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即1643年，崇祯十六年），暹罗还遣使入贡^②。永历十三年（1659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帝出逃。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罗派使者六十多人来

联络永历朝廷的主要支持者李定国，请他移军景线暂时休整^③，然后暹罗提供象、马，帮助他对抗清军，收复云南。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勘合，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并且告知李定国：“前者八十二人驾随，流落在我国，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3]李定国对暹罗非常感激，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因此，在此之前永历朝廷如果想要流亡暹罗，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永历朝廷的流亡的方向，有向东、向南和向西的诸多选项。在这些选项中，西迁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

西迁的第一步是到云南地区，再进一步到缅甸。那么，明代云南地区与缅甸的情况如何？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云南地区与缅甸，是否比流亡到台海、安南、暹罗更安全、更保险呢？

明代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嘉靖时人桂粤、陈全之和万历时人王士性都说云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时恬则蜂屯蚁聚，有事则兽骇禽奔。盖人自为险。势难统一者也”；“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④。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孙承泽仍然说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⑤。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及其家属，即如王士性所言：“诸省惟云南诸夷杂聚之地，布列州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⑥129}

占云南人口大多数的各少数民族，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很复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依靠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了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来年二月，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将楚雄城层层包围，围困八十多天，城中弹尽粮绝，几乎失陷。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李定国率兵进攻沙定洲，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

余部。不仅如此，永历朝廷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余部。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永历帝来说也有深仇大恨。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桂王朱常瀛携子安仁王朱由棖、永明王朱由榔仓皇逃出。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棖继位桂王，不久朱由棖突然死去，只剩下朱由榔，承继桂王之位。因此，可谓是有国仇，又有家仇。

因此，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来说，投靠有血海深仇的大西军余部，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把永历帝安置到贵州安隆所。永历帝为摆脱控制，和吴贞毓等十八位朝臣密谋，企图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密谋被发现，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为将来篡位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在宿敌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台海地区，在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中国云南毗邻缅甸，如果永历朝廷最后走投无路，可以继续向西，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差。永历朝廷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规模、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出动的军队每次都达三十万人（或者号称三十万人）。从兵力投入来说，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因此可以说，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差的国家。

那么，永历朝廷为何还要向西流亡呢？

二、云南：为何成为南明政权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

永历政权迁移到何处，并非永历帝及其小朝廷自身所能够决定的。永历朝廷本是依靠以瞿式耜为首的华南明朝残余势力拥立的，而瞿式耜是反对

永历朝廷西迁的。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清军攻占湖南，瞿式耜被杀，永历帝先逃到梧州，又逃南宁。这时可以依靠的只有大西军余部了。此时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大将率领，从四川撤退到云贵。四大将又以孙可望为首。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二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商讨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孙可望主张继续与明朝作对，撤到广东南岭一带，建立地盘。如果形势恶化，则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国则力主联明抗清，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恢复明朝江山。双方发生激烈争议，以致李定国拔剑欲自刎。众将夺下剑，撕破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致表示接受李定国的意见。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但是1651年（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翼王，但孙却表示不接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与永历朝廷谈判，孙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永历朝廷的五大臣，逼迫永历帝改封他为地位更高的秦王。年底南宁陷落。次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偏僻山区的安隆千户所，改名安龙府。永历帝允许孙可望对今后的大小战事都可以先斩后奏。同时，永历朝廷中的权臣马吉翔也不希望去投靠郑氏集团。这样，永历朝廷决定与大西军余部联合。

孙可望有野心，意图以贵州和云南为基地，自立为帝。因此他对永历朝廷苛刻，蓄意改称“安龙”为“安笼”^⑦，意思是永历朝廷只不过是“笼”中之“鸟”。真正拥戴永历朝廷的是李定国。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兵败广东新会的李定国率部至贵州，将永历帝从安笼迁到了昆明。因此，永历朝廷西迁，绝非走投无路时的病急乱投医之举。

当永历朝廷不得不选择流亡地时，李定国提出西进云南的方针。永历“西狩”主要是李定国的决定。此外，永历小朝廷里的权臣马吉翔、太监庞天寿也主张西迁。马吉翔是贵州人，不希望投靠郑成功。马、庞与孙可望有交情，孙的主要势力在贵州。永历帝不愿去投靠孙可望，又认为到海边路途遥远。他将此事交朝臣商议，仍然难以决定。后来李定国派兵保护永历帝进驻云南。马吉翔大力拉拢李定国，取得李定国的信任，于是推荐马吉翔入内阁办事，马吉翔也乘机

挟李定国之势以制朝廷，要求遵照李定国决定，迁往云南，永历朝廷也只能顺从。

为什么李定国要选择云南呢？主要因为云南是他的地盘。他在云南经营了数年，并训练出三万人的军队，这是他依靠的基本武力。不仅如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云南也可能真的是复兴明朝的唯一基地。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国中央王朝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威胁出现了。南诏兴起于云南，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南诏的两大邻国唐朝与吐蕃都是强国。南诏向东、北两个方向发展都遇到困难，因此积极向南、西两个方向发展。南诏设置了开南、银生和丽水三节度，统治着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沈曾植说：“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誇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⑧可见南诏势力范围一直达到南海。南诏军队还与女王国、昆仑国发生冲突，到过真腊国（今柬埔寨）。南诏的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⑨。换言之，其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云南），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俨然成为中南半岛上的超级强权。

南诏强大起来后，与吐蕃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唐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大举进攻西川（亦称益州，中心在成都平原）。南诏军占领了成都外城，虽然未能攻入内城，但退兵时，把成都各种技术工匠连同家人都掠到南诏，人数达数万人。两年后，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要求南诏放回被虏的人，南诏放回了四千人。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军第二次进攻西川，与唐军大战，虽然最后被击败，但战争对益州造成了重大损害。不仅如此，咸通元年（860年），南诏出兵东下，攻破唐朝安南都护府的首府交趾城（今越南河内市）。唐军不久后收复安南。但三年之后，南诏再次攻破交趾，唐军退守岭南。南诏两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调用重兵镇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导致“庞勋之乱”，严

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导致最终灭亡。陈寅恪指出：“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舆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着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逼，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④向达则指出：南诏之患，“以懿宗时为最繁，几乎每年都有边警，而以中国的南部如安南、邕管为最甚。咸通时安南为南诏攻陷，于是邕管骚然，乃调东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庞勋叛变，遂兆唐室灭亡之机。所以南诏的盛衰，安南的得失，关系于唐朝者甚大”^⑩。

南诏衰落后，大理国代之而起。大理国也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强国，其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⑪。大致说来，与南诏国基本相同，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大理国与宋朝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两国之间始终未发生过战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理是一个弱小国家。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国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安南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大理又介入安南国的王位继承之争。安南国王李乾德有一庶子，从小被送入大理国寄养，改名赵智之。绍兴八年安南国王李阳焕死，大理国派军队护送赵智之归国，与宋朝支持的嗣子李天祚争夺王位^⑫。

从公元738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1253年大理国灭亡的五个世纪中，云南一直是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上超级强权。元朝灭了大理国后，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从而以往几百年的南方威胁也随之消失。

云南被元朝纳入版图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元代云南的实际统治者是元朝的梁王和大理国王室后裔段氏。梁王以昆明为其统治中心，段氏则以大理为其统治中心。元朝灭亡后，元顺帝逃到漠北，与新建立的明朝对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奉元朝正朔，服从北元的命令。段氏则处

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屯曲靖抗拒。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1382年），梁王兵败自杀。因此云南是明朝统一的最后一个地区。

明代云南依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潜力。云南西南边疆的麓川（今瑞丽一带）掸族政权在元代兴起，到了元末明初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与明朝和缅甸都曾多次发生战争。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大小战事不计其数。其中第二次征讨，明朝调集了南京、湖广兵15万，第三次出动了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土汉军13万^⑤。明军在战争中死伤惨重^⑥，军费浩大^⑦，最终还是以讲和告终。麓川之役给明朝带来严重影响，史称“昔年麓川之役，用兵二十万，用饷千万，兵连十年”“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麓川之役，大费财力，骚动半天下”^⑧。

明代云南还在经济上拥有一种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势：白银。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白银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由于对白银需求巨大，全国到处都在积极寻找银矿，但是只有在云南取得较好的结果。明代后期旅行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采矿事惟滇为善。……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⑨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全国产银的省份，除了云南外，还有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河南、四川、甘肃八省。“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行也”。由于云南是全国最大的白银产地，手里握有大量“硬通货”，当然经济实力也颇为可观。正因如此，明朝宁可放弃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始终是中国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一个行政区、到了明朝又重新恢复主权达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愿放弃元代以前长期独立的云南。

此外，虽然汉人在明代云南是“少数民族”，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居于统治地位。由于各方面的原

因，云南汉人对朝廷表现出罕见的忠诚。弘光帝敕监军监察御史陈荇来云南征兵，“意在匡复”大明江山。《明末滇南纪略“滇南总论”》载陈荇到达云南后“征兵于各土司”。不到一年的时间，即调募近二万人^[5]。当永历朝廷最后从昆明出逃时，出发时竟有数十万人哭泣随行。

因此，上述情况使得云南成为永历朝廷流亡的最佳选择。李定国之所以选择云南为永历朝廷的流亡目的地，应当是考虑到了这些情况。

三、缅甸：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最后的栖身之所？

如前所言，对于永历朝廷来说，如果最后不得不流亡外国，选项有安南、暹罗和缅甸。与安南、暹罗相比，缅甸无疑是最差的选项。

南诏、大理的相继灭亡，造成了中南半岛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原先在南诏、大理威慑之下的安南、缅甸得以乘机发展。到了15—17世纪中期，安南、缅甸以及暹罗兴起，积极向外扩张，成为中南半岛的新兴强权。

1531年，缅甸东吁土邦领袖莽应龙建立了东吁王朝，在之后的二十年完成了缅甸的第二次统一。东吁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其鼎盛时，国土东到老挝的万象，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北到今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后，四处征战。1556年，缅甸军队占领今泰国北部的兰那泰王国。兰那泰是通往暹罗和老挝的重要跳板，也是进入明朝领土的另一条途径。此时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和老挝都无力和缅甸抗争。莽应龙率军进入老挝本土，大肆劫掠，并夺取了明朝封给老挝国王的官印。位于老挝北方、在今云南省境内的车里国也表示臣服。缅甸的势力渗透到了湄公河流域。

莽应龙率军于1563年大举进攻暹罗，大败暹罗军，势如破竹。暹罗国王摩诃查克腊帕克被迫与莽应龙订立城下之盟，交出主战的王储拉梅萱等为质，向缅甸进贡，暹罗遂沦为缅甸的保护国。然后，莽应龙回师攻打兰那泰和老挝，前后共征剿了八次之多。1567年，莽应龙向暹罗国王摩诃查克腊

帕克求婚未遂，勃然大怒，于是发兵进攻暹罗，所调动军队的数量竟然号称有90万之众。1568年11月缅甸包围阿瑜陀耶城，1569年8月攻克。攻下之后，处死了暹罗国王。在进行了大肆劫掠之后，将阿瑜陀耶的臣民掠走，带回缅甸，只留下不到一万的居民，为之设立了傀儡国王。从此，缅甸对暹罗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治。

莽应龙死后，缅甸内乱。莽应龙幼子良渊侯（1600—1605年在位）保住了上缅甸半壁河山。继其王位的阿那毕隆（1605—1628年在位）又收复了下缅甸失地，并于1613年收复了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沙廉，把葡萄牙人驱逐出缅甸。他隆执政时（1629—1648年），缅甸又变得强大起来。

缅甸在向东扩展时，也积极北进，与明朝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冲突。

万历十年（1582年）冬，投靠缅甸的中国商人岳凤带引缅兵及土司兵共数十万人，分头进攻云南西南部各地。万历十一年正月，缅军焚掠施甸，陷顺宁（今云南凤庆）、破盏达。岳凤又令其子曩乌领众六万，突攻孟淋寨（今云南龙陵东北）。明军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等率兵阻击，分别战死。这时缅王莽应里也“西会缅甸、孟养、孟密、蛮莫、陇川兵于孟卯（今云南瑞丽），东会车里及八百、孟良（今缅甸东北部，府治在今缅甸景栋）、木邦兵于孟炎（在今缅甸兴威以北），复并众入犯姚关”^⑩。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底，缅军再次大举入犯，号称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云南巡抚陈用宾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派人联络暹罗夹攻缅甸，暹罗方面口头上答应了，但慑于缅甸的强大，未敢出兵。

从1584年到1593年，缅王莽应里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由于缅军主力用于对暹作战，因此对明朝的攻击减少了。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年），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但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开采玉石的矿井，缅甸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土司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求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在缅军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人少无力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只得杀了思正向缅军求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缅军三十万进攻木邦，木邦

失陷。此后，中缅战争才基本上停止。

由于明朝在战争中失利，明初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及孟良御夷府均为缅甸控制，缅甸由此大大扩大了疆域。明朝人沈德符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说：“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藪，识者忧之。…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刺靖安三尉，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宣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甸图中，他时南中倘有征发，严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有车耶？”^⑪

由此看来，在中南半岛三个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大。如果永历朝廷要找一个庇护者的话，缅甸无疑比安南、暹罗更有资格入选。

1658年（永历十二年）年底，清兵从四川、贵州、广西三路猛攻云南。李定国督帅兵马分三路堵御，结果全线溃退，败归云南，请永历帝出逃。逃亡何处？朝臣意见分歧很大。沐天波建议西走缅甸，马吉翔和掌司礼监太监李国泰都赞同，李定国也赞成这个主张^⑫。沐氏家族受明廷之命治理云南，前后12代，为时264年。他们对主要邻国安南、暹罗和缅甸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李定国等人采纳沐天波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由上可见，“永历西狩”是李定国基于明代人对云南地区和缅甸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做出的选择。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疑最佳选择。

四、中国云南和缅甸：为何难以挽救永历朝廷？

中国云南不仅拥有支撑抗清战争的物质潜力，而且控制云南的李定国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黄宗羲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⑬李定国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成为抗清的主力。顾诚说：“李定国在…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

帅。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顾氏对另外一位抗清领袖郑成功则作了如下评价：“郑成功最大的失策是私心自用。……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决不肯出兵配合作战。”^②这里姑不论顾氏的评价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永历旗号下积聚的各抗清势力中，李定国是永历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对于仰人鼻息的永历朝廷至为关键。此外，与中国接壤的安南与缅甸两国，安南处于分裂状态，各政权之间相互混战，其中比较强大的后黎政权及广南政权到了1657年（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左右，已对南明政权不太友好，而对南明态度较好的莫氏政权，力量又很微弱。与此相较，缅甸虽然也陷入内乱，但情况比安南还是好得多。因此，相对于其他选项来说，云南地区和缅甸确实是永历朝廷流亡时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中，云南地区和缅甸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云南地区在与缅甸的几十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云南西部地区遭到缅甸不断入侵。缅军所到之处，“杀掠无算，大肆破坏”^③，“三宣（宣慰司）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④沙定洲之乱则严重破坏了云南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云南南部和中部地区都被沙定洲占领，连省城昆明也被占领达555天。“（定洲）据省城，逐黔国，流毒两迤，先后死难者三十余万人。”^⑤其部下王塑、李日芳攻下大理、蒙自后，“屠杀以万计”^⑥。沙氏部队无纪律，滥杀无辜，抢劫财物，连黔国公府也被焚毁。由于战乱，云南已残破不堪，无力抵抗清军。

在缅甸方面，多年征战的结果，不仅使得国力消耗，而且国内各族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同时，缅甸政府的横征暴敛，连东吁王朝的立国之本阿赫木旦阶层也难以承受^⑦，不少人卖身为奴以逃避徭役，步兵、枪兵、骑兵、轿夫等都有不少人负债累累，有的要求成为王公大人的奴隶^{[6]156}。统治集团内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也越演越烈。在17世纪的头六十年中，至少有3起王室成员的谋反事件^{[6]156-157}。平达格力1648年继承王位后，情况更是江河日下。缅军在

北碧被暹罗军队击败，暹军乘胜追击，兵锋深入到下缅甸腹地。1661年，缅甸发生宫廷政变，平达格力被杀，其弟莽白继位为王，混乱状态逐渐平息下来，但国势已难振兴。东北部重镇清迈被宿敌暹罗夺取。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地区和缅甸，肯定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

由于内乱，缅甸对永历朝廷流亡来缅也充满疑惧。永历朝廷逃到云南后，向位于中缅边疆的兴威^⑧和孟卯（今云南省瑞丽）的土司要求提供人力和粮食。缅王平达格力得知，派兵帮助这些土司进行抵制。永历朝廷逃到缅甸八莫后，即被缅甸解除武装，安置在缅甸都城阿瓦附近的赫径，寄人篱下，处境艰难。李定国得知后，和白文选分别率军进入孟定、孟艮、木邦一带，力图进行解救。1659年4月，白文选率数万军队进入缅甸，“杀缅兵四五万人”“缅人大恐”。1660年9月和1661年初，李定国和白文选又两次率军入缅“迎驾”，逼近阿瓦，与缅军大战于洞帕、象腿等地。三年之中，李、白部队几万人数次入缅作战，从阿瓦城下和远至南方的蒲甘的广大地区都遭到了破坏。这进一步引起缅甸官员对永历朝廷的不满^{[6]142}。

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攻下云南地区，随后率十万大军进入缅甸，逼其交出永历帝。缅甸此时无力抵御清军，只好同意引渡永历帝，以换取清军撤兵。次年，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缢杀永历帝，南明最终灭亡。此时还在云南西南部抵抗清军的李定国，闻讯后悲愤成疾，于该年六月在勐腊病逝。至此，“永历西狩”的故事也划上了句号。

五、结语

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两大缺陷：第一，主要着眼于“中原”（包括黄河和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区）之历史。一个政权一旦掌握了这些地区，就成为历史的“中心”，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则是无关紧要的“边缘”，那里发生了什么，似乎对中国历史发展并无多大影响。第二，主要着眼于中国本身历史的研究。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入侵，中国史研究也随之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

中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则被漠视。这些陈旧的看法，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偏颇。由于这种偏颇，像“永历西狩”这样的事件，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然而，中国是由多个地区组成的，“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受到同样重视；其次，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把中国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孤立地研究；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在“永历西狩”这个时期，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世界各地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费尔南德兹-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说：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⑧。

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⑨。

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后隐藏着的大历史。“永历西狩”这件事本身，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没有实力的小朝廷，在华南和西南的穷乡僻壤东游西荡十多年，最后在许多人心目中的蛮荒之地的缅甸终结。在那些持有“中原中心”和“中国中心”观的学者眼中，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然而，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这一事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皇帝流亡外国”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也在于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之覆灭和东亚世界整个格局的剧变，因此是

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永历政权存在的时期，在中国和东亚世界并存着多种政治军事力量。如果把每一种力量当做一根线条，那么可以看到在当时中国以及东亚世界并存着多股粗大的线条。清朝方面，有入关的八旗（代表人物如豪格、多铎、孔有德等）、降清的明朝残余势力（如吴三桂等）和大顺军余部（如李成栋等）等；南明方面，有弘光、鲁王、隆武政权的残余势力（如瞿式耜、何腾蛟、张煌言、马吉翔等）、地方势力（如沐天波等）、郑氏集团、叛清拥明势力（如李成栋父子等）、由反明转为拥明的大西军余部（如孙可望、李定国等），等等。此外，还有西南地区的反明势力（如沙定洲等）、反复无常的西南土司势力。中国之外的众多力量也出现于这个场景。除了本文上面谈到的中南半岛三强——安南、暹罗和缅甸外，日本、葡萄牙等，都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南明政权建立后，多次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著名学者朱舜水从弘光元年（1645年）起，曾多次到日本、安南、交趾（两国即今越南）、暹罗等国活动，前后十五年，历尽艰辛，终未成功，最后于永历13年（1659年）第7次到日本乞师未成后，决心不再回国，而定居日本水户。始终抗清的郑氏家族与日本有密切的往来，曾多次派人到日本“乞师”，还在日本寄存了巨量的贸易盈余，作为抗清的军饷。垄断郑氏与日本贸易的郑泰一人寄存在长崎的白银就有71万两之多^[7]。

永历政权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更深。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偕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e）往澳门求援，葡澳当局对南明政权的请求十分重视，很快便征募得士兵300名，大炮数门，火枪一批，派尼古拉·费雷拉（Nicolas Fereira）为统帅，以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é-Xavier Koffler）为随军司铎。行至中途，得到隆武政权灭亡的消息。随后永历朝廷于1646年12月24日在广东肇庆建立，庞天寿于是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政权。这批澳门援军于永历元年（1647年）初抵达桂林，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起了一定作用^⑩。永历二年（1648年），在永历帝倚重的大宦官庞天寿和传教士的劝说下，永历帝的嫡母王

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进行过洗礼，同时宫中受洗的还有嫔妃、大员以及太监多人。1648年10月，永历帝再次派人赴澳门求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仅以火枪百枝相助。于是王太后决定派使臣陈安德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直接赴罗马向教皇求援。

这些都表明：诸多国外力量也介入中国当时的变局，形成了多条国外力量的线条。

上述国内外诸多线条中，有许多线条彼此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都交织到了“永历西狩”这个事件上，因此“永历西狩”由此也成为这些线条相互纠结的节点。各种力量通过这个节点，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大洗牌。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上述各种力量都代表着某种文化。例如南明所代表的是明代中国内地形成的“传统”的儒家精英文化，清朝代表的是加入了满族元素的“新”的儒家精英文化，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代表的是中国北方农民的草根文化，华南和西南各土司代表的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安南和日本代表的是本土化的儒家文化，缅甸、暹罗以及老挝、掸邦代表的是南传佛教文化，而葡萄牙代表的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文化。这些内容和形式都各有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彼此冲突，另一方面又相互融合，深刻地表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文化的大变动^③。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说过：“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8]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则说：“今天的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9]事实确实如此。只要眼光改变了，同样的史料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因此，通过新的眼光，使得我们能够从“永历西狩”这个“小问题”看到“东亚历史大变局”这段“大历史”。

注释

- ①有些“巡狩”是皇帝为避外敌而流亡。例如唐玄宗为避安禄山、史思明而“西狩”四川，南宋恭帝为避蒙古人而“南狩”岭南，清德宗（光绪帝）为避八国联军而“西狩”陕西。有些则是皇帝被作为阶下囚而被押解到外“国”去的。例如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朝俘获，发配到东北五国城。宋恭帝被元朝俘获到北京，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到漠北。
- ②《明史》卷24庄烈帝二。本文所引《明史》以及其他二十五史，皆系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1986年刊印影印武英殿本之《二十五史》。
- ③亦作锦线，现在泰国境内昌盛附近，与缅甸、老挝接壤。
- ④参见桂粤著《云南图序》，收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卷183；陈全之：《蓬窗日录》，上海书店，1985年，卷1《环宇·云南》；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
- ⑤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本，“云南备录”；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卷43兵部二舆图考，第857页。
- ⑥参见王士性著《广志绎》，第121，129页。
- ⑦邵廷采著《西南纪事》，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22页。
- ⑧沈曾植著《蛮书校本跋》，收于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⑨见《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上》。
- ⑩向达著“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收于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 ⑪《元史》卷61，《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 ⑫徐松著《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蕃夷四之四三“交趾”；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库全书》本，卷114绍兴七年，卷118绍兴八年。
- ⑬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卷30《麓川之役》，英宗正统十三年春三月。
- ⑭《明史》卷162《刘球传》：“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
- ⑮王世贞著《弇山堂别集》卷23《史乘考误四》：“军费所需，万万不可计”。
- ⑯《明史》卷304《王振传》，《明史》卷171《王骥传》，《明史》卷314《云南土司》；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第819页。
- ⑰顾祖禹著《读史方輿纪要》，卷119，云南七，中华书局

2005年,第5129页。

⑱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30页。

⑲邓凯著《求野录》,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书店,1982年,第224-225页;徐鼐:《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57年,第70页。

⑳黄宗羲《永历纪年》,收于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6页。

㉑顾诚著《南明史》,第960、1025页。

㉒见《明史》卷247《刘綎传》。

㉓朱孟震著《西南夷风土记》,收于《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页。

㉔杨琮著《滇中琐记》,出版者不详,民国元年刊出,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沙乱殉难”条。

㉕原出自冯菘著《滇考》。此处引自方树梅辑《滇考摘录》,出版信息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普吾沙乱滇”条。

㉖东吁王朝实行的兵农合一、以兵为主的制度。阿赫木旦的主体部分具有国家的“常备军”作用,因此可以说是东吁王朝的基础。见贺圣达:“阿赫木旦制度与缅甸封建经济的特点”,《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

㉗又称登尼,以前明朝设置的木邦宣慰司所在地。

㉘费尔南德兹-阿梅斯托:《一四九二:那一年,我们的世界展开了》,中译本,左岸文化出版社(台北),2012年,第5、6页。

㉙李伯重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第3章《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第5章《角力海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国际纷争》。

㉚关于这支部队所起作用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参见陈文源:《西方传教士与南明政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6期(2003年),余邦定:《澳门耶稣会传教士与南明政权》,提交“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

㉛李伯重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第4章《大洗牌: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

参考文献

- [1]牛军凯.南明与安南关系初探[J].南洋问题研究,2001(2):91-97.
- [2]黄国安.明代中国与泰国的友好关系[J].东南亚纵横,1996(3):37-40.
- [3]刘莹.狩缅纪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0-11.
-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355.
- [5]李建军.南明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J].南开学报,2000(6):62-66.
- [6]贺圣达.缅甸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 [7]冯佐哲.郑成功一家与日本[EB/OL].(2004-07-07)[2017-12-20]<http://www.huaxia.com/zt/jl/2004-53/797073.html?ejnc5>.
- [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
- [9]阿里埃克斯.心态史学[M]//勒高夫.新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73,188,176.

A “Minor” Issue but a Larger History: The “Western Exile” of the Emperor Yong Li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Li Bozhong

Abstract: The Yongli royal court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was constantly on the move since its found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South China in the mid-17th century. It first moved westward to Guangxi, then southwestward to Guizhou and Yunnan, and finally reached Burma outside China's southwestern border. That a Chinese emperor and his royal court were forced to exile in a foreign country is the only one in Chinese history. Why did the emperor Yong li take such a route to his exile? Only by examining this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history can we find a reasonable answer. In this sense, it is a “minor” issue that reflects a larger histor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Global history; Southern Ming Dynasty; The Yong li Royal Court; Westward Moving

宏观丝绸之路，见识文明交融

胡 戟

摘要：将丝绸之路誉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在中外文明的交融和进步的历程中，起过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以及艺术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受惠于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实现的中外文明交流和交融。总地来看，中国对人类文明有很大贡献，然而事实是中国更多地学习了外国，更多受益于人类进步的创造。本文分六个时间段，比较研究隋唐以前中外文明成就，把中国放进世界，中外比较着看在交流、交融中相互的促进，掠影文明进步的伟大历程，理解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创造。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明交融；人类进步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1-0072-10

纵观数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是文化交流促进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现在我们享受的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以及艺术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受惠于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实现的中外文明交流和交融。

回顾一下我们每天餐桌上的食物，从粮食作物到水果，很多都是数千年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科技文化更是这样。不仅物质的交流，思想观念的交流也很频繁。连我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也并非全是自己独创。

总地来看，中国对人类文明有很大贡献。中国

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四大发明”。笔者主张可以讲九大发明，就是在原来的四大发明上，再增加丝绸的发明，瓷器的发明，茶叶的发明，中医药的发明，科举即文官考试制度的发明^①。2017年5月出版的一本《中国三十大发明》的书，里边也讲到中国不止有“四大发明”，这本32位作者花了三年时间写的书里，重新遴选出30大发明^[1]。我们说的九大发明，除了科举制一项，都列入了。

总地看中国对人类文明有很大贡献，然而事实是中国更多地学习了外国，更多受益于人类进步的创造。

表1 四大文明古国成就比较年代表

四大文明	最早步入文明	最早统一	出现城市	使用文字	文明创造
古埃及文明	公元前3500年	公元前3100年	公元前3500年左右	公元前3100年	金字塔
古巴比伦(两河流域文明)	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18世纪	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4000—3000年	汉谟拉比法典、陶轮、小麦、绵羊
古印度文明	公元前3200年	公元前261年	公元前2500年	公元前3000年中期 哈拉巴文字	印度教、佛教、耆那教
中国	公元前1994年夏代建立 (据《竹书记年》) ^②	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2500年前后 陶寺古城、良渚古城、 石家河古城	公元前15世纪左右的 甲骨文	礼制、儒学、道教、中医、 蚕桑丝绸

作者简介：胡戟，男，上海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主任，从事隋唐史研究。

本文选择隋唐以前六个时间段，回顾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明交融历史。把中国放进世界，中外比较着看，希望能够比较容易理解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创造。

一、第一个时间段：人类文明初绽期，公元前七八千年到距今四五千年

上古人类的四大文明是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叫巴比伦文明、印度河和恒河的古印度文明与黄河、长江乃至辽河的中国文明。

公元前3500年左右，尼罗河下游两岸出现一系列小国，通过不断的兼并战争，公元前3100年，埃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比约在公元前2070年夏代的建立早1000年，比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早2900年。古代埃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始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比中国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大约早1600年；埃及在公元前2560年完成了花费20年时间，用230万块平均2.5吨重的巨大石块砌成的胡夫金字塔，高146.5米，底边长230米。远远在中国之前，已经创造了旷世奇迹。据说世界上是法国在1889年建起了30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才超过了它。中国古代最高建筑被认为是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而毁于公元534年的雷击的洛阳永宁寺塔，《洛阳伽蓝记》记为高九层，一百丈，其他记载为塔高四十九丈或四十余丈，所以有认为高136.71米，晚于埃及金字塔3000年。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修的天堂号称高一千尺，以小尺计也在245米以上。但都没有实物可以测量，历史上的描述难以遽信。

两河流域最早是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苏美尔文明，有了各苏美尔城邦和苏美尔人的文字，文明程度高于年代相当的渭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2000年前）。汉谟拉比在公元前18世纪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巴比伦王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比秦统一早1500多年。两河流域文明有世界上第一种文字——楔形文字，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编制了第一

种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发明了第一个制陶器用的陶轮。这些领先于中国，也领先于世界。

古印度文明中，印度河流域文化（又称哈拉巴文化）存在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1750年间。印度河流域文化是青铜时代的文明，公元前3000年，已出现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这三处主要城市遗址，公元前25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开始使用文字，比中国夏商时代早数百年至1000年。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西北部，逐渐向南推进，印度文明的中心向东推进到恒河流域，恒河文化昌盛于公元前1800到公元前600年间，为印度著名的吠陀时代。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566—前486年）创立佛教，和中国的老子（约公元前570—前500）、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世的年代相当。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73—前236年在位），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比秦统一早约40年。佛教的创立早于中国道教的创立700年。

中国人上上下下有一种好胜争强的第一情结，追求最，最早、最高、最大、最强。其实我们能跻身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就已经很好了，我们起步虽不是最早的也是最早的之一，而且我们中国的汉字文化是唯一一种能够一直延续不断使用到现在的文明，有丰厚的积淀，这就更好了。现在要做的是，努力为人类文明添加原创性的贡献。

下面我们回溯一下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文明的历史性进步。

我认为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应该是以火的使用和掌握取火技术、火种的保存技术为标志。而根本上使人脱离禽兽，成为人的是什么？我认为文化，是具有进步向上意义的精神和物质的创造和传承。

火发明之后，距今七八千年到一万年前后人类发明陶器，是重要的又一进步。陶器的制作，从盘条捏制，再从慢轮到快轮的轮制；从无窑制作，经过一次性使用的薄壳窑，到固定窑的烧制，也是一个漫长的进步过程。

考古发现9800—8000年前的上埃及西部沙漠中纳布塔培亚（Nabta playa）遗址陶器，9400年前苏

丹喀士穆附近出现陶器^[2]，8000—9000年前希腊爱琴有鸟纹彩陶水注^③，9000年前，波斯也有了陶器^[3]，8000年前陶器在欧洲就普及了。伊朗最早的彩陶出土于锡亚尔克（Sialk）等地，已经很精美，代表作是直管状流的陶壶。古代印度河谷文明梅尔迦尔文化五期彩陶，距今约5300年；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在今在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彩陶罐，产生于公元前2350—前1750年^[4]，稍微晚些，距今也有4000年上下的历史了。

中国的彩陶，最早是距今6800—6300年前的西安半坡式彩陶，6000—5500年前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壶^[5]；公元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梅堰遗址出土天然漆彩绘陶罐，远到距今5300年前；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的马家窑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也有5000年了。因为马家窑的陶器与仰韶文化相近似，不排除可能是仰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我们在伊朗考察时注意到锡亚尔克彩陶上的蛙纹，几乎与马家窑彩陶的蛙纹无二致。高启安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河西这一时期的彩陶、出土的鹰首权杖、青铜冶炼、碳化小麦，以及在楼兰出土的许多黄发、蓝眸干尸等，都说明很早以前，古波斯一支人辗转到了西域乃至河西”。他们带来了彩陶、小麦，甚至青铜冶炼技术，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前^[6]。如果是这样，“前丝绸之路”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了，给我们的文明进步以重大影响。因为彩陶是在中国一下子发展起来的，而且一开始水平就很高，所以有彩陶文化是不是西方传来的猜疑。5000年前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在陶器制作上也较早采用了轮制、部件拼接及闭窑烧成等技术，使得它拥有了同期文化中最为精美的陶器群。但要说那里的制陶术也是西方传来的就更困难了。更早的半坡和庙底沟的彩陶，和西方有没有什么联系还可以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家对这被批为“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讳莫如深。现在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了，当然这是一个还要谨慎研究的大问题。

再说“民以食为天”的食物，首先是粮食。中国传统的粮食作物“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菽。

中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以前，学者们多认为水稻在三四千年前起源于印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南方陆续发现早于5000年的稻谷的遗存，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稻谷遗存距今近7000年，引起学界巨大震动，改变了人们认为稻谷起源于印度的认识。但是这个问题的争议和研究并没有结束。

再说小麦。西亚是小麦的故乡，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被驯化是10500—9500年前的事^[7]。现代的小麦，还有燕麦、裸麦和大麦，以及山羊、绵羊、牛、猪都起源于中东，时间是10000年前—2000年前^[8]^[50]。一万年以前，上埃及西部沙漠中纳布塔培亚遗址发现原始种植作物，还有驯化牛^[9]。这时近东也出现农业，畜牧部落，伊朗可能是最早的农业和饲养家畜地之一^[10]。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进入新石器时代，出土石制锄头，开始种植大麦、小麦，有了畜牧业，留下化石，时间是9000年前^④^[13]。古印度的迈尔戈，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谷物的地区之一，有单粒小麦二粒面包小麦，时间也是9000年前。伊朗高原从北部到里海东南，将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成今六倍体小麦——普通小麦，是在8000年前。7000年前，小麦传到中亚西南部的土库曼^[11]。

中国是从中东引进小麦和大麦的，有明确时间是公元前1300年前后^[8]^[52]。甲骨文“来”字表明小麦殷商时已传入中国，时间是距今3300年。赵志军认为小麦传入中国是在距今4500—4000年前，说甘肃东灰山遗址发现中国最早传入的小麦，时间是距今3600年左右^[12]。总之，小麦是引进的，时间只有三四千年，是在栽培小麦在世界上出现四五千年之后。现在米面是我们天天离不开的主食，研究稻米和小麦之路也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自己最早的传统主食是五谷中的粟、稷和菽。粟就是谷子、小米，没有争议，半坡就种植粟，是北方主食，直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时代，农民交粮还是以租粟计。稷很多人以为就是粟，既然五谷里并列了这两样，应该是不同的。可能稷即糜，又称糜子，一种类似小米，但是颗粒稍大，没有黏性，煮成干饭是散的，古代也是重要的粮食，所以代表国家的社稷，就用了这个同音字。粟和稷，是中国的贡献。菽是大豆，原产中国，有5000

年的栽培史了。

关于上古时代中外文明比较研究，还应该讲到城市。

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城市的出现。在夏代以前，其他文明古国已经建城建国。具体如距今8000—6000年前两河流域开始出现的城市，以巴勒斯坦的耶利哥最早^⑤。也有把公元前5000年也就是7000年前，今伊拉克东南约300公里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人建的乌尔，视为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城市^{[13]5}。

中国最早的城市石家河古城，位于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距天门市城区约16公里，是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余米，面积120万平方米。城墙残高3—8米，墙底宽30—50米。城外侧有护城河，宽60—100米，深4—6米。古城存在年代是公元前2600—2000年。比人家晚三四千年。而且我们看到波斯、希腊、罗马的一些古代城市规划很注意修好下水道，一直用到现在，甚至比我们现在做得还好。

波斯地区最古老的文明始自公元前3200年左右建国的埃兰，距今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土耳其的伊兹密尔是爱琴海地区最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有5000年的历史；印度在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之间创造了印度河文明，4000年前就创立了源于古印度韦陀教及婆罗门教的印度教；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些讲希腊语的部落开始在希腊半岛定居，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后期，希腊半岛出现迈锡尼文明。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他制定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已经强调有证据才能定罪，还设置公民陪审团。这些都早于或高于我们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夏代的文明。

二、第二个时间段：公元前1000年前后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这前后的公元前1200年，希腊处在“荷马时

代”；公元前1000年左右，伊朗游牧民族占有中亚地区，以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为统治与文化中心；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城市发展进入第一个鼎盛期，土耳其一座黑海边的港口城市特拉布宗市，据称大约已有近4000年的建城史，在公元前746年左右就有建卫城的历史记载；位于今塞尔丘克小镇的土耳其以弗所古城，始建于公元前七、八世纪；稍前，公元前九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即亚平宁半岛）中部兴起了与古希腊文明并称的古罗马文明，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城。公元前八世纪起，希腊半岛陆续出现了一批“城邦”小国。上述情况表明公元前1000年前后，城市建设风潮涌起，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规模壮观的石头建筑，或者能辨认出蓄水池和完善坚固的地下排水设施。而我们那时西周的都城沔京镐京，只剩几个车马坑，至今找不到城市的城墙和准确位置。但那时周公已经提出敬天保民的进步治国理念，成为儒学的渊源。

在中国商周交替之间，青铜文化相当发展，以致可以把这个时代称为“青铜时代”。收藏西周青铜器的宝鸡博物馆最近升级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非常精彩。更早，安阳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已很精美了。然而从时间上看，公元前4000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13]1}。公元前3000年代末，青铜文化出现于希腊克里特岛。据说一两千年后、距今4000年前，我们河西地区有了青铜冶炼痕迹，但是在整个夏代时间段，青铜器十分稀少且粗陋。大家知道四川广汉三星堆出了一批神秘的青铜器，是什么年代的，什么人造的，是个谜。我们在印度孟买威尔士王子博物馆展品中看到一个凸眼的铜人首，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人“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没有下颏，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很有点神似。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还出现了原本盛产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的以吨来计的象牙，出土了5000多枚经鉴定来自印度洋的海贝。我们是不是要从印度找一找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外星人”呢？只是时间好像不会很早（学者们多认为属于殷商后期）。

问题是青铜器的冶炼铸造技术，东西方有没有相互影响？谁影响谁？恐怕还是要从西向东找。

三、第三个时间段：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东西方出了一批文化巨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老子、孔子。

释迦牟尼（公元前566—486）创立了佛教，面对种姓制度，提出众生平等。

老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471年之间），主张无为而治，奠定道教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创立儒学，讲究三纲五常的伦理，他是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家，“有教无类”的教育家，讲“克己复礼”的政治家。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的《理想国》讲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问题是，2500年前，希腊的、印度（尼泊尔）哲人们都提出了平等的观念，可是中国的思想家始终坚持的是尊卑等级制度，自古以来，中国人有自由和博爱（泛爱众）的观念，就是不讲平等。为什么在平等观念上，东西方有这么大差别？值得研究。

再说城市建设。

在这个时期，巴尔干半岛上希腊于公元前580年建卫城，前480年波希战争时破坏，公元前五世纪重建，并在公元前470年至前456年建宙斯神庙。希腊的首都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建设。亚平宁半岛上，庞贝城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在公元前510年，建立了共和国。

伊朗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米底王国（公元前678年—前550年）建立了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后，在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年—前486年）统治下，波斯帝国国力达到鼎盛，其疆土东起

葱岭、西至巴尔干半岛，北逾高加索山脉、南抵埃塞俄比亚，地跨亚欧非，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波斯文明成为有世界性影响力的重要文明。2500年前，在佛教产生后不久，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称祆教），成为波斯帝国至萨珊帝国时期的国教。设拉子附近在大流士一世时始建壮美的波斯波利斯，为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仪式之都。

中亚也有一批名城出现，大流士一世时土库曼的马雷城初建于公元前六世纪；塔吉克斯坦的胡占德（苦盖）公元前513年建城。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在公元前五世纪，由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建造成一座美轮美奂的都城。公元前三世纪，当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该城时不禁赞叹：“我所听说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撒马尔罕要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

那时中国也建成了齐国的临淄那样繁荣的城市，有7万户20多万人口，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但是只留下殉马坑，除了书上说人多得挥汗成雨的文字，城市没什么痕迹。整个国家长期陷于春秋战国的纷争中，国家统一的进程，比西方一些国家相对晚300年，大城市的建设更要晚约500年。

四、第四个时间段：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

这时世界上是罗马、中国、安息（波斯）、印度四强，尤其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辉映。这是我们积极开拓丝绸之路的年代，代表性的事件是张骞通西域，一是为联合月氏、乌孙对抗匈奴，也是为找天马——汗血马。我们的蒙古马耐劳，但是速度不快，影响战斗力。求取汗血马，以改良马的品种。敦煌附近就有渥洼池，称出天马。真正的汗血马出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说出在他们那里。当年引进汗血马时，连马必须吃的苜蓿也引进了，那是很好的饲料。

古罗马文明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初兴起，公元前510年罗马结束王政时代，建立共和国，逐步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公元前299年，罗马势力开始侵入巴尔干半岛。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罗马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夺取地中海霸权。西泽（公元前102—

前44年)时, 罗马又征服了高卢和埃及。公元前86年, 罗马攻占雅典。前30年, 罗马灭亡了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古代希腊的历史随之告终。

在这期间罗马建了许多成为重要文化遗产留下来的石建筑和石刻艺术品。公元前27年, 罗马建万神庙, 公元120年重建。罗马竞技场, 由沦为奴隶的八万名犹太和阿拉伯俘虏用8年时间修建, 于公元82年落成。公元一世纪在广场上竖罗马皇帝石柱。土耳其棉花堡, 公元二至三世纪时建成古罗马的温泉中心。土耳其以弗所在公元二世纪建了号称当时世界第三大的塞尔苏斯图书馆。印度巴特那市, 佛经里记载为“华氏城”, 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建为孔雀王朝阿育王的首府。阿育王在室利·达磨罗吉迎塔之前的阿育王石柱的四头雄狮柱顶, 现在用在印度国旗上。印度还有珀鲁德宰堵波塔门和栏干, 约建于公元前150—前100年的巽伽王朝, 1875年移至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复原保存。

中国这时的秦汉帝国, 平六国统一以后, 汉军又三次远出对匈奴作战, 和罗马一样, 天下无敌, 成为大帝国。不一样的是罗马留下壮观的建筑遗址和石刻艺术品, 秦汉留下的只是秦始皇陵、汉武帝陵、阿房宫、汉宫这样的土堆, 以及秦始皇陵和汉阳陵陶的木的兵马俑。石质艺术品只有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有数的石雕。从宫殿、陵墓到雕塑艺术, 使用材质中外都有土木和石头的区别, 除了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建成的圆明园的西洋楼, 在中国很少有石建筑, 连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冠名还是土木工程系。现在看遗址, 怎么看也是人家雕刻的石柱子比我们的土堆好看。现在确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好大一部分是石建筑, 没有几个大明宫这样的土堆。中国只用土木和用土烧的砖盖房子, 不用石料, 建筑文化非常不同, 这一点中国不学外国, 这是为什么? 这又是一个问题。

这时期还可以注意的是以水为动力推动石磨运转以加工粮食的机械工具水碓, 国外学者有研究, 认为其最早产生在希腊(可能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 传入中土当无异议。东汉、魏晋时, 中土突然显现诸多小麦粉食品, 与加工工具石磨的改进, 特别是磨齿的有规律排列, 有极大关系。唯何时从

丝绸之路上传入引进, 尚需论证。水碓一直用到上世纪使用电磨之前, 在唐代是很能盈利的加工场, 王公贵族们利用特权拦截水道设置水碓赚加工费以至影响灌溉, 朝廷不得不多次下敕禁止。

五、第五个时间段: 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的三至六世纪

中国在公元二世纪末的东汉末年开始, 长期陷于军阀混战和南北分裂割据, 实行门阀政治的门阀时代。但是时代进步的脚步没有完全停止, 经过十六国南北朝, 五胡民族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 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统论种族的好传统, 也就是不论你是什么族群, 只要文化相同, 就是一个民族, 消解了民族矛盾, 开启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新篇章。那时通过丝绸之路与外界的联系也没有中断, 北魏建都大同时, 通过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联通丝绸之路^[14]。西魏时, 丝绸之路上一支去北齐的商队, 规模达到“商胡二百四十人, 驼骡六百匹, 杂彩丝绢以万计”^⑥。波斯锦开始返销中国。

国外的情况, 统一和建设发展成为潮流。萨珊王朝(224年—651年)在224年再次统一波斯, 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239年—272年在位)将设拉子比沙普尔古城建为首都。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0年迁都拜占庭(君士坦丁堡)。395年, 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去世, 他把帝国一分为二。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

315年, 罗马为了庆祝君士坦丁大帝在城北米尔维奥桥击败暴君马克森提而建立凯旋门。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为供奉智慧之神索非亚而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建大教堂。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0年迁都拜占庭(君士坦丁堡), 后来建起非常壮观的新老皇宫。君士坦丁大帝还在梵蒂冈建老的(公元四世纪)圣彼得大教堂。公元320—500年, 笈多王朝(Gupta)在北印度崛起。在395年去世的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 他把帝国一分为二, 希腊归东罗马帝国管辖, 和我们稍后开始南北朝有点像, 不过罗马是东西分开。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等分裂争战, 也有五胡民族或族群及辽金元清等的南

下，甚至统治了全中国。中国无论统一无论分裂，大家都争中国的正统地位，中华汉字文化标志的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古文明延续下来没有中断。看其他古文明：公元前2300年兴起的印度哈拉帕文化，也就是印度流域文明，于公元前十八世纪灭亡；古巴比伦王国也早在公元前729年就退出历史舞台，伊拉克那里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城市和空中花园都成废墟；公元前3150年形成的古埃及文明，随着古埃及建立第一王朝在公元前30年被罗马灭亡而结束；公元前30年这同一年，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灭亡了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就是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被灭亡，古代希腊的历史随之告终。西罗马帝国也亡于476年。

问题是，为什么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都中断了甚至消失了，唯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值得探讨。

六、第六个时间段：相当于中国隋唐时期，共326年（581—907年）

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治理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段。从隋朝建立到唐前期的175年间，出现了开皇之治、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

其间隋炀帝、唐太宗两位是热心丝绸之路事情的皇帝。隋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⑦。为解决吐谷浑在青海威胁河西走廊阻遏丝绸之路，他亲自西巡，带40万大军赶走了吐谷浑。“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⑧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皇帝亲自在天山廊道主持二十七国君主参加的丝绸之路大会。而后他们被邀去了洛阳，商人们要求入市交易，隋炀帝不仅准许，而且宣布对他们给予吃饭不要钱的优待。真可见他发展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片苦心。

隋炀帝热心丝绸之路的再一件事是遣使去赤土。在中印半岛这个方向，隋炀帝在远征林邑之后，曾派出和平使者常骏等往赤土，那是七世纪初中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赤土后称环王国，其地有巨港、马六甲、泰国的宋卡等说，还有以为赤土即羯荼国的异译，为马六甲海峡北端的重要港口。虽然《隋书·赤土传》和《通典·防边典四》对其位置有较详叙述，并注称“在日南郡西，陆行二十余日方至”，但确切所在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只能大致判断其地在中印半岛南端的马来半岛，应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一带，近年那里有六七世纪的遗址发现。

大业三年隋炀帝召募能通绝域的使者，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两位九品官表示愿冒险募，隋炀帝非常高兴，各赐帛百匹和时服一袭，派遣他们出使赤土，带去约合六万米的绢帛五千段赠赤土王。

当年十月从南海郡（治今广州市）出发，扬帆远航，二旬后过焦石山，傍林邑东南行，过师子石、鸡笼岛到赤土界，赤土王派婆罗门鸠摩罗率三十艘的船队隆重迎接，“吹蠡击鼓，以乐隋使”。又月余至赤土国都，王子那邪迦来迎，送金盘、金合香油、金瓶香水和白迭布四条供使者盥洗用。当日下午未时，那邪迦王子又驾象二头，持孔雀盖迎接使者入王宫，递交国书。以后接连数日宴请隋使，食物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种菜肴，金钟置酒，女乐助兴。

赤土王派那邪迦王子跟随隋使回访，回赠隋炀帝的礼物有金芙蓉冠、龙脑香和各种土产方物，派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欢送。海上行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循海岸北上到交趾后改陆行。大约在大业五年二月，那邪迦王子在常骏陪同下到弘农（治今河南灵宝）谒见，隋炀帝十分高兴地接待了客人们，给那邪迦及其随员封官和赏物。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交往^⑨。据隋纪记载，在常骏出使前后的大业四年三月和六年六月，赤土国曾不断派使者入隋，两国保持着频繁的交往。

这是郑和下西洋前800年，海上丝绸之路最大一次出使活动，如果能弄清赤土确实在吉打，这是中马两国关系史一件大事。那邪迦在马来西亚语中就是王子的意思。这件事隋炀帝做得非常有气魄。他应该想到，这是为开辟海上对外通道。

隋唐有点独步天下的意味，我讲的不是他强大到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经济繁荣、政治文

明、文化昌盛、民众的品德素质和生活的幸福感, 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前几年组织写的《唐代政治文明》^[15]。和为两部墓志书撰写的两篇序言《走进隋唐人的精神世界》^[16], 努力说明这一点。

那时候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对世界做出了空前的贡献。纸张是电子书之前最重要的保存信息、传播文化的载体。用来记录文字的材料还有竹木丝帛羊皮金属泥块石头。5000年前古埃及使用了世界最早的专用书写工具——芦苇笔、莎草纸。公元前2250年左右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 不仅发明了楔形文字, 还发明了“泥板书”。以上这些不是材料贵重, 就是不便折迭保存, 更无法印刷。

中国的造纸术在八世纪中叶从中亚传到阿拉伯, 又过了4个世纪传入欧洲。我们考察时, 在尼泊尔看到了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土法造纸。他们说: 这个山区的手工造纸有1500年的历史。它使用的原材料来自瑞香皮(Daphne Cannabina)或者白瑞香(Daphne papyracea), 本地人称之为洛克塔(Locta)纸。它非常有名, 因为它特别耐用和具有特殊的质地, 用于最早的印度和佛教徒的经书手稿。皇家法令和法律档有数百年的历史, 一直都是用手工造纸记录。树皮是在2000米以上的山上采集, 并且关注于保护脆弱的森林生态。树皮是蔡伦造纸用的原料, 没想到在尼泊尔还恪守这一点。1500年前, 还在唐之前的南北朝, 如果所说无误, 那造纸术南传比西传还早。现在在泰国国家博物馆的展陈中, 有存留至今的土法造纸的录像, 和我们传统的工艺如出一辙。

印刷术配合造纸术, 完成了信息保存传递普及的要求, 对文化事业至关重要。我们的雕版印刷术, 大概在隋唐之际发明, 我国现存公元868年纪年实物出自蜀地传入敦煌, 印的金刚经文图都很精美, 不是最初发明时粗糙的东西。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里出了武则天时代的印刷品, 韩国有人说这证明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我们学者驳斥, 他们只有这样一个孤立的证据, 而中国发明印刷术, 是文献、实物、技术各种材料都齐全的。但确实纪年可考的印刷品, 以韩国出的这件最早, 那很可能是从洛阳带过去的。听说原卷上是有刻印经卷的坊名的, 和洛阳的里坊名字一对就清楚了。现在见到复

制的卷子上没有坊名, 此事可以留意。雕版印刷术传到伊朗已经是十三世纪了。指南针在十二世纪传到阿拉伯, 火药在十三世纪初期和中期传入阿拉伯, 下半期传入欧洲。这些是后来的事了。

再说其他几项中国的发明。

外国知道中国丝绸是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罗马皇帝穿上这皇帝的新衣之前很久。至少比张骞早一二百年, 印度和希腊、罗马的著作中, 包括后来的《圣经》里, 用产丝之地的“赛里斯”等概念来称中国。更早公元前十世纪埃及金字塔中发现法老木乃伊头发上系的一条丝绸, 据维也纳大学科学家考证确认是中国产品。蚕桑丝绸技术的外传, 最晚在南北朝, 已经有向中国返销波斯锦的时候。我们在伊朗、土耳其看到的现代丝毯, 制造精美, 据说要两人织三年。杭州国礼丝绸的老总告诉我, 这技术我们还是有的, 纯丝的太费工, 但卖不上价。应该作非遗项目保护起来, 传承下去。

烧制瓷器技术在十一世纪传到波斯, 再传给阿拉伯, 1470年传到意大利。许多外国博物馆里收藏着中国瓷器, 现在他们的烧瓷技术非常高, 中国恐怕连景德镇算上, 都不是老大了。

土耳其的红茶很有名, 品茶的待客之道也非常讲究。我们在土耳其考察了他们的茶园茶厂, 了解了他们茶叶生产的全过程。采茶是用带兜的修树的大剪子, 几剪子就是一兜子, 一会儿一个人就剪下一大床单做包袱皮的一大包茶叶, 直送茶厂, 只见无人操作的流水线, 瞬间把洗茶叶, 剔茶梗, 烘干, 成型, 包装都完成了。人工成本比我们一片片摘, 一小锅一小锅炒, 效率要高不知多少倍。导游很友好地请我们品茶, 说我们是远亲, 他们就是唐代和西突厥作战时, 跑去土耳其的, 把喝茶的习俗也带去了, 虽然茶树不一定是这边移过去的, 但是这么爱喝茶的习惯是从中国带过去的。而且土耳其语的发音也还是茶, 一点没变。我们终于在坎儿井、巴扎、馕之外, 又找到一个丝绸之路通用的汉语词汇了。

这阶段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 至少还应该提一下玻璃和艺术。

出土玻璃的代表器物, 是法门寺地宫中的20余件琉璃器, 图案有伊斯兰式的。中国的玻璃, 早年在

烧制陶器时，就会有一些矿物质结晶出来，这些琉璃珠多被当做装饰品用了。西晋以后琉璃的烧制技术一度中断，到隋朝由何稠给恢复了^⑩。这何稠“巧思过人”，造车桥羽仪，是一位无所不能大国工匠。《法书要录》卷六注称其父：“何妥，外国人。”应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何国的粟特人，带来很多西方技艺。大唐西市遗址唐代地层出土有玻璃窑渣和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的钠钙体系的玻璃锭^[17]。用实物证明唐代有玻璃器生产，部分原料是通过丝路贸易引进的。中国的玻璃工艺后来没有大的发展，是因为受到制约。有高丽纸一类很好的窗户纸，制约了平板玻璃的发展；有很好的瓷器，制约了玻璃器皿的发展。现在有文章研究说，中国近代的落后与玻璃工艺的落后有关。西方玻璃工艺的发展，制作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对现代科技的进步至关重要。

艺术方面，石刻建筑文物艺术品，总的来说是我们的弱项。西方的，包括印度、斯里兰卡的都很精彩。印度阿旃特、埃洛拉、克久拉霍等石窟寺艺术的规模水平，盖世无双，无可企及。无怪有玄奘、义净等百千僧人不畏险阻迢迢万里去学习取经。在大同云岗石窟之后，这时我们也终于有了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和咸阳顺陵石狮这样中国历史上可以傲世的石刻艺术横空出世。但是无疑，从题材到艺术，都是借鉴了印度佛教的，甚至犍陀罗艺术的创造。作为中国艺术宝库的敦煌石窟也是这样。

隋唐之后，宋元明清，经历一千年（公元907—1911年），中外文化交流，不论物质还是精神领域都更加广泛深入，限于题目和篇幅不容详述。天文学、科学技术的更无遑论及。物质以食品为例，精神以语言为例，简言几句。

食品凡挂番字、洋字、西字、胡字的许多食品都来自外国。红薯又叫番薯，也叫番芋，还有番茄（西红柿），番木瓜（木瓜）、番石榴、番椒（辣椒）、番蒜（芒果）等。洋，有洋白菜（圆白菜）、洋芋（土豆）、洋葱头、洋姜（鬼子姜）等。西有西红柿、西瓜，胡有胡瓜（黄瓜）、胡萝卜、胡豆（蚕豆、豌豆）、胡桃（核桃）、胡麻（芝麻、油用亚麻）、胡蒜（大蒜）、胡椒等等。其中很多是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

中国化的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印度佛

教改造而成的，不仅在艺术上、在思想观念上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甚至连说话的语言，也处处留下印记。赵朴初先生指出：“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比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都来自佛教，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全了。”这是他给《俗语佛源》一书写的序里说的。这本书里列举了大约500个现在流行使用的来源于佛教的语汇^[18]。包括我们常用的导师、语录，学生每天要做的功课这些词，都来源于佛教。而如平等观念，在讲尊卑等级的儒家文化中原来是没有的，是强调众生平等的佛教传来的，现在是包括我们在内全世界公认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我们在丝绸之路上亲眼看到成百个世遗单位展示的人类文明成果，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也看到中国古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看到一些技艺在异国发扬光大，做得更精湛，更工业化，真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感受到融入人类文明进程的自豪和温暖，这是很让人欣慰的。

这样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学会尊重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把以前流行的打倒、消灭、废墟思维，换成共同建设和谐、和平、共赢的世界，共创人类更加文明的家园，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才有未来。

注释

- ①播发于2016年初凤凰卫视开播的大唐西市《丝绸文明》节目。
- ②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为前2070年。
- ③台湾故宫《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图录》。
- ④翁淑玲等《用年表读通世界历史》，台湾商周出版，2013年，第13页。
- ⑤翁淑玲等《用年表读通世界历史》，台湾商周出版，2013年，第13页。台湾故宫《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图录》说是9000年前。
- ⑥《北史》卷96《吐谷浑》，中华书局，1974年，第3187页。
- ⑦《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5635页。
- ⑧《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 ⑨事见《隋书》《炀帝纪》和《赤土传》。

⑩《隋书·何稠传》：“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

参考文献

- [1] 华觉明. 中国三十大发明[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 [2] [9] 余太山, 李锦绣. 丝瓷之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47.
- [3] 戴尔·布朗. 波斯人 帝国的主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16.
- [4] 图说天下·探索发现系列编委会. 世界十大考古发现[M]. 吉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36-37.
- [5] 敬泽昊. 西安发现国内首片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EB/OL]. (2017-11-09) [2018-03-03] http://www.sn.xinhuanet.com/2017-11/09/c_1121931515_2.html.
- [6] 高启安. 中亚伊朗段纪行[G]//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 西安大唐西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文集.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5: 142.
- [7] [11] [12] 赵志军. 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J]. 南方文物, 2015 (3): 44-52.
- [8]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10] 张铁伟. 列国志 伊朗[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4.
- [13] 郭豫斌. 东方古文明[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 [14] 胡戟. 北魏平城时代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J]. 西北历史资料, 1980 (3).
- [15] 胡戟. 唐代政治文明[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3.
- [16] 佚名.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7] 温睿, 郑逸轩. 唐传成西安遗址出土玻璃残块初探[G]//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 西安大唐西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文集.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5: 60.
- [18]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俗语佛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The Macro Silk Road Shows the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

Hu Ji

Abstract: It is never too exaggerated to praise the Silk Road as “the main ax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because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Nowadays, Our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together with the artistic and spiritual cultural life, benefit from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via the Silk Road. In general, China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however, the fact is that China has learned more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more benefited from the creation of human progres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periods, which includ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efore the Sui (581-618) and Tang (618-907) Dynasties and put China into the world landscape. The mutual promo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sketching the great course of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at civilization is the co-creation of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 human progress

军民融合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

谭云刚

摘要: 十九大报告为在新时代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落实军民融合的战略部署关键在于教育创新和军民融合人才的培养。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军民融合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以及军民融合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育创新问题。进而,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培养军民融合复合型人才,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军民融合教育创新体系建设问题,为我国国防工业和部队早日进入“人才红利期”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军民融合;教育创新;军民融合人才;人才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82-10

201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同志任主任。这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兴国之道、强军之策、富民之举,利党利国利军利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军民融合在富国强军中的战略地位,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新时代下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利于科学制定和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有利于我国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军民融合处于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的过渡阶段,深入分析研究军民融合与教育创新关系的问题,对于转变教育理念,促进教育创新,增强教育自信,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必然

军民融合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同时,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成果应用于

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国家战略竞争力,形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将军民融合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是我国国家安全和战略需求,是战争形态信息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经济形态市场化时代条件下,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1]。要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逐步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最根本是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创新军民融合理论体系、军民融合管理体制、国防动员教育体系、军民两用人才培养体系,为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政策支持和人力保证^[2]。一流的人才需要教育培养,一流的武器装备需要一流的人才研制生产维修保养,尤其需要一流的创新型人才建造。

(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体制处于重大调整与转型阵痛期,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国民经济产业正在向中高端迈进,战略新兴产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政治体制处于调整改革重大期与稳步推进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处于重

作者简介: 谭云刚,男,贵州绥阳人,空军军械通用装备军事代表局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大校,从事装备采购管理、军民融合研究。

大调整转折期。“能打胜仗”的要求与国防军队建设能力不相适应的差距，以及国防和军队出现的重大腐败案件，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求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军民深度融合的呼声日益高涨、刻不容缓。我军武器装备水平主要取决于国防科技工业十二大军工集团总（主）承制单位的技术质量水平，既缺少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非军工科研生产主体，参与武器装备建设的战略规划、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法规政策，更缺少吸引世界各国先进技术和产品参与武器装备建设的方针、政策、策略和路径。实施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略举措，是适应世界高技术发展、我国民用技术和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壮大的迫切需要，更是深化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采购制度调整改革、打破军工行业垄断、促进装备采购竞争、提高装备发展效益的必由之路。

（二）是实现兴国强军富民有机统一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将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升为兴国强军的国家战略。强调指出：

“军民融合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利益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要综合运用需求牵引、政策引导、计划调控等多种手段，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消除准入障碍，加强信息互通，推行竞争采购，强化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引导作用和采购需求牵引作用，形成常态化推进、市场化运作、法制化管理的工作态势，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创新能力，真正实现兴国强军富民的有机统一。

（三）是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方略

同传统的军工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机制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和产业化优势，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自主创新的生

力军。2016年，华为以5200多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第二大数据通信产品供应商；联想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供应商；华为、光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京东、苏宁、联想、万达等民营企业，代表未来新技术发展、新商业模式、新经济形态、新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引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先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开放，向中高端挺进。他们许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先技术与产品，已经用到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修理上，为提升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已经高于军队信息化程度。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和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民营企业有1千多家，这些优势民营企业已经参与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活动，为电子、航空、航天、舰船和兵器等多个行业提供配套服务，部分企业还承担了整机或主战装备科研生产任务。

二、我国军民融合与教育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军民融合处于初级阶段，一直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影响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1. 体制性障碍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计划体制的束缚。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采购管理体制仍然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装备科研生产管理和采购工作基本上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反映的供求、竞争、价值、效益等规律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民营企业长期被限制在计划体制之外。特别是对于作为特殊商品的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与采购，如何发挥好军事需求的牵引作用、计划管理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二，管理体制的制约。基础设施、科学技术、人才培养、装备科研生产与采购、国防动员、后勤保障等六大军民融合领域管理体制是军民分立的，军地之间缺

乏有效的法制化的体制联接整合,军地两大系统各自为政,“多张皮”“多龙治水”现象十分突出,难以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军民融合新形态,难以实现国家一份投入产生两份、甚至多份效益的军民融合新目标^[3]。由于管理体制的分立,大运的科研条件保障费、生产技术改造费,装备研制费、购置费、维修管理费,阵地建设费、使用保障费管理,分属于国防科技工业、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后勤保障部三大管理部门,不能统筹计划与使用。科学技术、基础建设等领域的重复投入产生的浪费更是惊人。第三,所有制的限制。十一大军工企业都是公有制企业,95%以上的民营企业都是私有制企业。以国防军工为代表的金融、石油、电信、铁路、电力等国家垄断行业,由于所有制限制,民营企业难以进入。正在启动的包括军工在内的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处处受限,举步维艰。

2.结构性矛盾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需求侧结构性矛盾。缺少军事作战需求、武器装备需求、人力资源需求、后勤保障需求融合一体的统筹论证规划。装备规划计划联合决策体制尚未建立,作战需求对装备规划计划的牵引作用未能充分体现;装备规划计划的制定局限于军队内部,甚至局限于军队装备系统内部;国际、国内两个装备市场培育、开放不够,国际、国内两种装备资源开发、利用不够;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需要的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高技术武器装备和先进保障手段较少。第二,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供给结构单一。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修理基本依赖于国防军工十一大集团公司,没有更广泛地依托整个国家工业、科技基础,造成单一的投资主体、单一的产品来源、单一的订货渠道、单一的定价模式,难以满足高科技、多层次、多样化的装备需求,难以取得军事上、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最佳效益。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结构不够合理。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军工企业多、民营企业少,一般武器装备生产能力过剩、高技术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不足,自主研制装备少、仿制装备多,信息化装备少、机械化装备多,进攻性装备少、防御性装备多,这种结构性矛盾与“能打胜仗”要求不相适应。

3.政策性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装备科研生产修理准入政策不平等。由于武器装备在技术水平、环境、质量、保密等方面有特殊要求,装备审批程序严格,军工内部的行业保护高于民口的行业保护,形成了现行军品市场进入“门槛”高的局面,制约了军品市场上足够数量竞争主体的形成,难以实现较为充分的竞争。第二,投资政策不平等。基建和技改费的投向、投资强度和进度,与装备采购的招标竞争和合同订立不配套,军品基建技改投入对象与军方通过竞争择优确定的承研承制单位时有不符,且基建技改投入数额很大,事实上造成接受基建技改投入的单位与未接受的单位,在同类武器装备科研采购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不利于公平竞争。第三,税收政策不平等。现行军品价格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不匹配,参加装备研制生产的民营企业,难以享受军工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土地使用税减免优惠。一般工业企业不能与军队、军工系统所属企业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实质上产生了不公平竞争。第四,信息不对称。目前建立的装备采购信息发布渠道较少,由于保密等原因,发布的装备采购需求信息局限性较大,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修理项目还没有向社会公开发布。信息不对称,排斥了不少有实力的非军工单位参与竞争;缺乏合理的军品市场准入和退出的保障机制,使竞争力弱的企业不易退出,竞争力强的企业难以进入^[4]。

(二)我国教育创新存在的问题

素质教育实施十八年来,很多政策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军民融合教育创新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思想观念淡薄。军民融合教育观念淡薄,不论是国家教育部门,还是军队政治工作部门,军民融合教育观念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还没有统筹制定军民融合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教育创新观念淡薄,传统的应试教育思维和做法还没有根本改变,教育管理制度、模式、方法手段创新跟不上国家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管理体制缺位。缺少统筹国民教育和国防教育资源的组织管理机构、工作机制和法规制度,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难以融合,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的

路子难以走开，军事人才培养开发的整体效益难以体现^[5]。2017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工作规则和省（区、市）军民融合发展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设置的意见，为包括国民教育和国防教育资源统筹在内的六大领域统筹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最后，“四多四少”问题突出。多教少育。教会方法、解疑释惑较多，德育、心理教育不够；多知少识。传授知识、应试作业较多，传道、能辨别、要知其所以然的教育较少；多科少学。注重各门学科课程的教学较多，开展学习方法创新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各门学科融合学习、系统思考的更少；多技少能。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技术理论教学较多，通过实践锻炼变成洞察力、想象力、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学较少。

三、推进军民融合与教育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 充分认识民参军的重要意义

民参军是军民融合最重要、最薄弱的环节。推进民参军深度发展，大力吸纳优势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有利于引入市场竞争，打破军工企业封闭垄断格局；有利于军民创新思维、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的推广应用，大大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水平；有利于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缓解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建设投资资金不足问题，提高国防经费使用效益；有利于建立军民一体维修保障机制，使大量军民通用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得以充分利用，满足应对现代战争多种安全威胁、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求，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2. 转变思想观念

树立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克服本位主义思想，行业利益、企业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并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中。树立开放合作意识，打破国防科技工业自成体系、垄断封闭的传统思维，确立开放思想、竞争观念和包容合作意识；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建设要面向市场、面向世界，向

非军工企业、非国有企业开放，与国际、国内技术领先的企业合作，与民营企业合作。树立平等共赢理念，抛弃零和思维，无论是国有军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组成部分，都是市场竞争的平等主体，要充分发挥军民各自优势，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只有建立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最优质的产品、最便利的资金、最灵活的机制基础之上，只有深深根植于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全体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我们才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

3. 健全军民融合管理体制

美国有国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总统科技政策局等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国家、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地方三级军民融合管理体制。成立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军民融合国家指导委员会，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制定军民融合规划计划、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检查指导军民融合工作。充分发挥全国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作用，以及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改善的独特作用，引导民参军方向，搞好民参军服务，推进民参军进程。成立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协调军民融合推进组织，负责制定推进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保障军民一体化路线图与时间表，确定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建设军民融合项目和实施办法。地方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负责所在地区军民融合协调管理工作。完善国家、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地方三级军民融合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军民融合法规制度，抓紧制定出台军民融合促进法，武器装备军民一体化科研生产法，武器装备军民一体化维修保障法，军民两用人才培养条例，军民两用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密系统、物联网系统、机场、铁路、公路、码头、医院、油库使用管理办法；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制度和武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制度。

4. 大力推进竞争性装备采购

竞争是提升装备承制单位技术创新能力和质量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民参军的重要抓

手。一是建立军品市场准入制度,把现行的科研生产定点制度改变为以承制单位资格审查制度为基础的装备采购市场准入制度,减少市场准入限制,逐步实现“四证合一”,最终达到习主席提出的“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目标。二是建立和完善装备指令性计划采购与竞争性市场采购相结合的装备采购管理体制机制。三是建立和完善国防军工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技改投入面向所有军品研制生产企业,包括国防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特别是一些关键配套产品的民口企业的投资体制机制。四是实行所有装备承制单位一视同仁的免税、贷款、定价普惠制。通过大力推进竞争性装备采购,引入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军工企业参与装备科研、生产、修理竞争,将民营企业标新立异的设计思想、异想天开的创新理念、另辟蹊径的技术路线、独具匠心的工艺诀窍、独一无二的优质产品,融入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可以更广泛地依托整个国家工业、科技、人才基础,让全社会优势资源汇集到装备建设上来,让蕴藏在各行业各领域中的巨大能量在装备建设领域得到充分释放,提升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使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建设真正走上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逐步建立起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和一体化保障体系^[6]。

5.促进军民技术标准融合

一方面,大量以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民营高技术及产品难以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大量不必要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用标准阻碍了民营高技术及产品的进入。融合军民两用技术,集中国家和民间相关技术人才、资金、设施设备等资源,协同攻克硬科学、黑科学、软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的一个个“哥德巴赫猜想”,尽快突破和创新军民两用集成电路技术、动力技术、核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卫星通信技术、量子通信与计算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等。很多优质民营企业在部分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有效解决了武器装备技术“瓶颈”。江苏丹阳精密合金制造厂,引进核心技术专家,花巨资购买高端加工设备,掌握的先进合金精密浇铸技术,成功运用于

某型航空发动机机匣制造,解决了制约航空发动机研制的一个重大难题。江苏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是全球知名的大型涡轮叶片专业化制造企业,其数控锻造设备群的加工制造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企业已承担了加工难度较大的风扇转子叶片、机匣锻件生产任务。江苏恒神纤维材料有限公司,为我军新装备研制生产提供大量紧缺的新材料。统一军民两用标准,包括知识产权管理标准、技术体制标准、质量管理标准、成本管理标准、服务保障标准等;建立军民融合技术标准管理机构,制定军民融合技术标准管理办法,清理影响军民融合的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和行业企业标准。中控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主持制定了第一个国际标准,参与制定了5项国家标准。

6.建立信息平台融合机制

武器装备采购需求信息、科研生产与配套保障信息、民用高技术企业及产品信息发布渠道狭窄,发布平台建设滞后,没有建立信息融合机制。完善武器装备采购信息发布平台,军队装备采购主管部门和十一大军工集团要定期分别发布单一来源装备和竞争性装备采购需求信息;实行装备采购政策法规和相关信息的公开制度,切实解决民企“参军”的信息不对称与安全保密问题;将有关装备采购方面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等尽可能进行解密处理,并公开发布,使所有潜在的厂商都能够通过正常渠道了解装备科研、采购和维修保障方面的政策和程序。实行装备采购项目分类适度公开制度,根据项目的重要程度和密级,可将装备采购计划项目及配套项目的需求信息分为三类:秘密类、内部类和公开类。对于秘密类项目,只能通过保密渠道向特定的合格厂商发布需求信息;对于内部类项目,可以通过内部网络、内部报刊、信函等多种方式,向符合条件的厂商发布需求信息;对于公开类项目,应该通过网络、报纸、刊物等公开途径,向所有厂商发布需求信息。这样,可以在保证不泄密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吸引尽可能多的单位参与军品市场竞争。发布信息的内容,必须对所有的潜在投标人或供货人一致,不得有任何信息歧视。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采购的信息,应向装备采购合格厂商名

录中具备该产品生产能力的厂商发布。公开招标信息要在公众媒体上发布。同时,建立军事代表机构和地方政府国防工办的信息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分析、报告所驻地区企业的科研生产情况。建立合格装备承制单位信息发布平台,军委装备发展部定期发布合格装备承制单位注册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定期发布国有企业有关信息,全国工商联定期发布民营企业有关信息。建立军队装备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 and 全国工商联军民融合信息交流机制。

7.完善资金融合制度

建立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投资多元化管理体制,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对建立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融合“五费”(武器装备科研费、购置费、维修保障费与国防科研条件保障费、生产技术改造费)统一使用,建立面向军工企(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的“五费”管理办法。建立民间国防投资基金,制定民间国防投资基金参与武器装备投资管理办法。充分利用民营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服务与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股份制改造,加快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为军民结合产业化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二)推进教育创新的几点思考

在解决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时,教育发挥着根本性作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质量取决于人的质量,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水平同样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人的质量取决于教育,尤其取决于以人为本的教育。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7]。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强教育资源统筹,完善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提升军事人才质量。实现强军兴军战略目标最紧迫最重要的是以人才集聚优势谋求备战打仗。把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式教育创新,作为加快转变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重要途径,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走出一条兴国强军的办学兴校之路。

1.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理念

教育创新是实现包括军民融合在内的任何国

家战略的根基。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理念是实现包括军民融合战略在内的任何伟大工程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理念就是注重和满足人的社会性、经济性和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

(1)人的社会性

恩格斯说过“人是一切动物中最好集群的动物”。这里所说的“集群”是指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由于共同的理想与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的劳动行为的社会性,主要由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以及劳动成果来体现,同时,还由人们的向往水平、成就感、价值观和人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中的影响来体现。因此,要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就必须为劳动者创造一个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和政治地位、满足其精神需求的客观环境;同时,注意引导人在非正式组织中的活动紧紧围绕正式组织的建设目标来进行。建立真正体现劳动者意志的民主管理制度和社会文化,让劳动者真正拥有参与管理、监督与决策的实际权力,增强他们的民主观念和参与意识,并注意培养他们行使这些权力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知识与能力,使劳动者表现出强烈而持久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并通过长期不懈的教育与培养,逐步形成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和弘扬传统优良作风的社会文化。

(2)人的经济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国民收入还处在中低端的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行为的经济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劳动者都无时不在自己的所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和所得(劳动组织分配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等收入)的比较中做出一定的选择。人的劳动首先要满足个人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生活用度,即人自身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这种个人的生活用度,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者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价值量的大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劳动组织的分配制度是否合理。而劳动者的贡献大小,由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劳动组织分配制度合理与否,又由社会制度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劳动积极性只有在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和应得的物质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上,才能

充分发挥。因此,要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就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增强其自身素质的教育机会,同时,注意研究和制定能较好地体现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制度与形式,在严格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双重利益制约方式:一是把劳动者的收入和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量直接挂钩,即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越多,其收入就越多,反之则少。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的近期利润水平和长远发展目标相联系。二是以个人贡献率(一定时期内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价值量与个人收入额的比率)作为评价劳动者功绩、升降劳动者职务和工资的最主要指标,使劳动者的利益目标和非物质目标与企业目标、国家目标内在结合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3) 人的个性

人的个性就是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的自我调节方式,而且是经常发生并且逐步定型化的、稳定的态度和方式。个性完全取决于人周围的现实生活,并且积极作用于周围的现实。个性的倾向性(需要、动机、理想和信念等)决定了一个人对现实事物的积极态度和选择,它可以对人的各种心理活动起支配作用。由于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受的教育和家庭影响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性格、志趣、习惯和作风。又由于人们所处的具体客观环境的不同和表现个性的机会不均等,使人对现实的态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行为的自我调节力和个性表现度有坚强与软弱之别。一般地讲,人对现实的态度越积极,个性表现度越强;教育者、领导者对每个人的个性特征认识得越深入,人的积极性就越高。因此,要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就必须研究劳动者的不同个性和志向,了解其特长,并采取适当的方式、给予适当的机会来提高其劳动积极的个性表现度,为良好个性的充分发挥创造尽可能好的客观条件和提供尽可能多的发展机会。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人才是军民融合式教育创新的第一要素和核心资源,把培养国防科技和军事人才放在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战略位置,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调动人才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以及基于能力和业绩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推动人才教育创新培训体系的建立与

完善,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8]。

2. 塑造具有崇高信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创新之灵魂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创新的灵魂”是教师、教育管理者最本质、最重要、最关键的职责要求。通过素质教育、发现教育、未来教育、个性教育,培育学生对新奇事物的敏感,对真知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发现、发明、开拓、进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创新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洞察能力。

(1) 确立崇高的信仰

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战争年代,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中国共产党人获得胜利;在最艰难的和平改革时期,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渡过了难关,取得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无数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信仰是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渴望,是鬼斧神工的辉煌,是碧海蓝天的梦想,是创造奇迹的力量。信仰是人类生命动力与活力的源泉,是一切真善美的集聚地,是一切珍贵灵魂聚会发光的场所。我们的教育首要的是信仰教育,教育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德载物,成仁取义,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崇高而坚定的信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推改革成功的法宝,更是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的创新意识、创新情感和创新意志品质。

(2) 培养独立的人格

成为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独立的精神价值,形成高尚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与世俗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在政治与世俗的参与中具有独立的自主精神。教育学生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朝三暮四,不为崇拜的偶像而活,不为名利而活,不为金钱而活。“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将廷黻认为耽误 20 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知识阶级和官

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高尚而独立的人格,不仅是一个人精神价值的体现,更是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思考、创造性思维、批判性取舍的特殊品质。

(3) 启迪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思想是指个人的思想能够不受社会的、传统的、宗教的、民族的既成观念、思维方式和基本理念的束缚和左右,而以自我的、独立的眼光去观察、审视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和发现,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教育学生忠于自己的内心和良知,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从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再到家庭背景,套上各种各样的笼子。教育正是人们摆脱客观环境限制、打破围墙、走向广阔开放人生空间的重要途径。如果教育的结果是将我们洗脑成僵化的心态和思维,我们的思考不过是画地为牢、自以为是。自由之思想,不仅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保证,更是创新的源泉和温床。

(4) 塑造创新之灵魂

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信仰、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培养学生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前所未有”“无中生有”的创造力。硅元素通常以人们司空见惯的石英沙粒出现,经过科学家们的“再次发现”创造出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使“沙粒变成了黄金”。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常常遇到由于科学原理没有研究透彻而使技术难以突破的瓶颈。其实,其他很多领域存在同样的问题。制约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塑造创新之灵魂的人才教育体系。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3. 创新军民融合式教育管理体制

健全创新发展的教育管理体制是推进包括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内的任何伟大工程的保证。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爱因斯坦、没有出乔布斯,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教育管理体制不注重鼓励创新、不注重鼓

励独立自由的思想。小升初、中升大,唯一由考试分数决定的教育制度,注重的是应试教育,且大多数教师也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素质教育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创新教育更是稀罕物,难能可贵。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创新能力不仅是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还是军队战斗力生成与提高的核心要素。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就是要按照以人为本、自主创新、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建立完善军民融合式教育创新组织管理机构、工作机制和政策制度,统筹国民教育和国防教育规划、优化配置军地教育资源^[9]。建立完善从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到装备采购、使用、维修、保障等环节,军民高度统筹、充分协调的法规制度和标准。建立健全军地教育协同工作机制、联合培训机制、共享使用机制,充分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和价格杠杆,充分发挥投资、金融、证券等工具对优质资源、优秀人才的激励作用和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效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满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

4. 创新军民融合式教育体系

创新军民融合式教育体系是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途径。第一,创建军民融合基本理论体系。组织军内外力量,联合开展国内外军民融合理论研究,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搞清楚军民融合基本概念、内涵外延、历史沿革、现状问题,研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结构、内容和发展趋势,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第二,健全军民融合国防教育体系。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普及国防知识,使全体公民增强国防概念,增强保卫国家安全的意志、技能和体魄。通过建立军民融合国防教育基地、全面深入开展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开展军民融合文化教育等筑牢全民国家意识和国防意识,营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的浓厚社会氛围。第三,完善军民融合人才培养体系。拓展渠道,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人才,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专业人才,使军事人才培养深深根植于国民教育丰沃土壤,获得持续有力的智力

支撑。借才引智,吸引更多的社会优秀人才服务军队,既是适应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的需要,更是适应武器装备技术含量提升和军队知识密集程度提高,实施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需要。共育共用,军地人才开发共享互补,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也是国防竞争制高点,建立军地人才培养协作机制和共享机制^[10]。探索军地人才双向流动办法,打造军地结合、优势互补、相互支撑、互惠共赢、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军民融合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最大限度地吧有限资源转化为部队战斗力和现实生产力,为增强国家战略竞争力提供最重要的人力支撑,增强我国的教育自信。

5.创新教育模式

第一,教与育并举,教是基础的、短期的、有形的,育是根本的、长期的、无形的。在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完成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学生德育和心理教育内容,走进军营开展国防教育,走进革命圣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性。第二,知与识并重,知是局部的、有限的、经验的,识是整体的、无限的、科学的。在传授知识、开展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互联网、虚拟现实、模拟场景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注重学生学识、辩识、意识、胆识的培育,增强学生识别真假、勇于担当的见识和能力。第三,科与学并行,科目是固定的、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是灵活的、系统的、主动的。在教育学生掌握各科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主动性、系统性、开放性、互动性学习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主动意识和自觉意识,养成系统思考、相互借鉴、博采众长的学习习惯。第四,技与能并训,在搞好技术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学生能力形成的教育内容,增加学生见习范围、次数和时间,引导学生到国防科技工业科研试验场所、高技术武器装备生产企业、部队演习训练基地参观见习,锻炼他们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1]。

随着军民融合与创新驱动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随着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教育、科技、信息、资金深度融合的不断推进,随着一批批具有崇高信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创新灵魂之新

兴人才的崛起,必将极大地增强全民创意创新创造的素质,大大增加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军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机会,许多优势民营企业的先进技术、顶尖人才和优质产品,将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与维修领域。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必将建立在开放的平台、高效的体制、灵活的机制、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基础之上,增强国防军工企(事)业单位体制内外协作配套能力,提高装备采购质量和效益,真正形成强大的军民融合合力,共同推进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建设,努力实现中国教育报国强军的“民族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6[R].国防大学,2016.
- [2]张建卫.军民融合教育组织行为学:案例研究与理论解析[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 [3]姜鲁鸣.深入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N].解放军报,2015-11-18(7).
- [4]游光荣,闫宏,赵旭.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17(1):150-156.
- [5]张建卫,赵辉,郭保民.军民融合式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现存问题与改革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8):37-41.
- [6]许达哲.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之路[J].求是,2015(13):5-6.
- [7]赵荣,徐芳,黄春平,等.军事教育与国民教育融合的军事人才培养问题研究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3(4):19-22,25.
- [8]夏桂华.积极构建人才培养军民融合体系——普通高校在人才领域的军民融合经验[J].人民论坛,2017(6):35.
- [9]杨梅支,刘永涛,焦永.我国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3):165-171.
- [10]梅阳.进一步完善军民融合人才培养研究[J].国防科技,2015(5):14-18.
- [11]陈润华,周莉.军民融合视角下高校国防教育实践的思考[J].高校后勤研究,2017(7):77-80.

The Research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Tan Yungang

Abstrac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vides the basic foundation for boos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mong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n a new era.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strategy deployment lies in innovativ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he paper firstly narrates the systematic obstacle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policy issues and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ostering talents during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uctural proposals which could promote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o a large extent from seven aspects. What's mor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train the well-rounded talents i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ll of these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ou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and troops entering talent dividend period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nnovative Educati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System of Talents

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初探

栾大龙 薛莲 唐波

摘要: 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习近平同志先后担任地方和中央行政领导职务期间,曾在部队与国防建设相关机构兼任领导职务、从事军民融合相关工作的具体活动内容为主线,深入探寻了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系统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正确把握新时期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初步对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开启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发展新境界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 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 形成

中图分类号: D251; F0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92-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军情的变化,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把军民融合发展确立为兴国之举、强军之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形成了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作为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重要内容,并写入党章,明确要求在新时代要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论指导、战略地位、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彰显了军民融合在强国强军中的战略地位,强化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and 能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党在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中取得了伟

大成就。实施军民融合是党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为新时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平衡、兼容发展提供了遵循。

一、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79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习近平同志曾先后任职于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军队和地方相关工作。后来,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兼任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机构领导职务。2010年,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延续着他饱含“军民融合”特色的职业生涯。他曾深情地说过:“我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对军队怀有深厚感情。从小我就较多接受了我军历史的教育,亲眼目睹了我军很多老一辈领

作者简介: 栾大龙,男,山东青岛人,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从事军民融合、项目管理研究;通讯作者,薛莲,女,山东泰安人,火箭军后勤部政工干事,从事政治工作研究;唐波,男,陕西澄城人,从事军民融合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副院长,东莞市三航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院长,工大资本创始合伙人,高级经济师,广东省发改委军民融合领域外聘专家。

导人的风范,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对军队的真挚感情。后来,我在军队工作几年,到地方任职后也时时关注着军队建设,经常同军队的同志打交道,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情况还算比较了解。”

1979年至1982年,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处理很多繁杂的地方和军队事务,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大量的工作和考察实践,使他能够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在工作中具有大局意识,树立军地双方“一盘棋”思想。在当时,刚刚开放的中国,少有的军事外交活动,也使习近平同志开阔了面向世界的视野。早在1980年,习近平同志就曾随时任国防部长的耿飏同志访美,参观了五角大楼,登上过美军航母^[1],美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现代化作战能力,无疑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了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的深远意义。

1982年后,习近平同志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中央军委,转入地方工作,在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同时,也兼任国防和军队机构领导职务。他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时,兼任正定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职务。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市政府、市委以及省委和省政府担任领导职务。在此期间,习近平同志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大校军衔)、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等职。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巩固国防、支持军队建设,是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部队的事,是国之大事,也是不寻常的特事。既然部队的事是特事,那就要特事特办。”^[2]1991年1月,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习近平同志赋诗《军民情·七律》相贺:“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3]在福州工作时,习近平同志被评为全省26名拥军优属模范之一,1992年起,福州市连续7次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1996年始,习近平同志担任福

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大校军衔),对这支部队的管理、建设身体力行,他亲身体验高炮炮手的训练,对预备役部队的高炮编组、作战方案的拟定,到部队的训练、基础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做出过很多具体指示和要求,他曾说“重视国防建设,就是重视经济发展,重视支持预备役部队建设,就是支持全省的改革开放”^[4]。在长达17年的福建工作经历中,习近平同志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促进协调发展都有着直接实践和深远思考。

2002年始,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省工作,在此期间,除了担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工作,他还先后担任过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他重视国防动员的组织领导,强调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武装的正确方向,毫不放松地推进浙江省国防动员建设向纵深发展^[5]。他提出,要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习近平同志不仅要求地方干部认真学习驻浙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全面推进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也很重视发扬英雄部队的革命传统,强调部队优良作风的重要性,给部队提出深入抓好铸魂育人、抓好练兵备战的要求^[6]。

2007年,习近平同志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任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在短暂的在沪工作期间,他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要求上海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要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创新发展,继承和发扬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军地齐心协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保卫国防的生动局面^[7]。

二、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鲜明提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时代命题,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

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我党在新形势下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到“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再到“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军民融合的定位不断提升,军民融合发展迈出历史性步伐,取得一批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逐渐步入提速增效的快车道,促进了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新发展。

2016年3月25日,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这是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第一个指导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首次从中央层面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它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聚焦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明确了新形势下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并根据我国正处在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求,提出了在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等六大体系中,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任务要求,确立了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框架。2016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与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共同参观了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在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展品中高技术产品、高新技术成果有关情况后,他强调,要继续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从需求侧、供给侧同步发力,从组织管理、工作运行和政策制度方面系统推进,继续把军民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实,加快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切实打造军民融合的龙头工程、精品工程,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主任,标志着军民融合组织领导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强化了党对军民融合发展的集中统一

领导,这是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最有力保障,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6月2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全面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时代要求,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定位、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对传统领域六大体系的军民融合提出要求的同时,也明确要求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是军民融合工作,要形成多维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两天后,6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视察驻晋部队某基地时再次强调,要着力深化军民融合发展,抓住党中央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契机,加快探索实践脚步,在技术、产业、设施、人才等方面走开深度融合路子,努力使太空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走在全国全军前列。9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他强调,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重点突破,既要抓好当前又要谋好长远,强化需求对接,强化改革创新,强化资源整合,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科技军民融合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改革强军战略的交汇点。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我军军事创新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坚定不移走军民融合式创新之路,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军事创新体系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实现两个体系相互兼容同步发展,使军事创新得到强力支持和持续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2014年12月,在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针对装备战线需要重点关注并抓好的工作提出要求,指出要坚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结合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扎实推动国防科技和装备领

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2017年3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他强调,要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习近平同志关于科技军民融合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推动军民融合、推进科技创新的重大问题,揭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和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契合我军建设实际,抓住了科技领域军民融合的关键,吹响了科技兴军的时代号角。

五年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理论创新和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统一富国和强军两大目标、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经济和国防两种实力,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进行总体设计,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战略指导和规划显著加强,重点领域军民融合深化拓展,体制改革扎实推进,法治建设步伐加快,区域性军民融合蓬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呈现整体推进、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三、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路径选择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要在深化改革创新,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上下功夫。2018年3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抓实干,紧抓快干,不断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

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2017年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对国防科技工业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方面

作出了部署。2018年1月,国防科技工业局和交通运输部签署了《关于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两部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相关任务的实施,成为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签署的第一份军民融合合作协议,对加快交通运输行业服务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实现国防科技工业支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推动交通强国、航天强国、海洋强国建设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为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需求信息发布共享制度,充分利用全社会优势资源,激发国防科技创新活力,国防科工局还在1月份印发了《军工科研项目指南公开发布规程》。2018年3月1日,国防科工局发出通知,公开征集2018年度技术基础科研项目,征集内容主要包括纳米薄膜力学特性计量技术研究、军民通用的军工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内容,以充分吸纳社会优势资源力量,支撑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基础科研工作。

按照习近平同志关于“各省(区、市)要加快设置军民融合发展领导机构,完善职能配置和工作机制,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的要求,截至2017年12月底,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相继组建了军民融合领导机构。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在贯彻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军民融合两级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建成,责任主体得以明确,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等将得到进一步排除。随着各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的陆续成立,军民融合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展现。

2018年1月8日,国家发改委等7个部委发布《关于支持中央单位深入参与所在区域全面改革创新试验的通知》,对中央单位参与所在地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将创新有关事项的重点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央单位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承担军民深度融合改革试点任务的改革试验区域,如四川成(都)德(阳)绵(阳)、西安市等,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营管理模式和技术基础管理等改革创新,更好地适应军民融合发展现实需要;二是中央单位特别是军工科研生产

单位要充分发挥自身各种资源优势,更好地融入和带动所在区域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破除自成体系封闭发展的旧模式;三是中央单位要带头复制推广全面改革创新试验中军民融合发展的有效经验,更好地激发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活力。

为落实习近平同志“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发挥好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加快推进军民融合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的重要指示,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军民融合发展法规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对需要清理的军民融合发展法规文件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了4个方面14条清理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对纳入清理范围的文件,将分别采取废止、失效、修改、整合、降密解密、继续有效等处理措施。《军民融合法》在2017年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第一版专家建议稿将成型,并会很快进入继续征求各方意见的实质运作阶段。未来,军民融合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将继续扎实推进,分领域展开,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基础工作,充分反映广泛民意、集中民智的军民融合政策制度建设有望取得更多新突破,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崭新法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试验田”,是培育先行先试的创新示范载体,是探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的重要举措。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及第一批创新示范区建设名单,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入加速期。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两会上,包括安徽、重庆、湖南、四川、河南等多个省份都在为设立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积极发声,提出了在本地区争设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建议。安徽代表团在《关于设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建议》中提到,近年来,安徽省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科技协同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共建、军地人才共育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重庆代表团将《关于支持重庆设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

建议》作为全团的建议。湖南代表则提议应当设立长株潭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充分激活区域创新资源,在促进军民融合发展上探索经验,争取到2020年,军民融合重大科技成果本土转化率达30%以上,国防专利转民用数量年均增长20%,湖南军民融合产业规模达到4000亿。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创新发展已经开启。2018年3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选择,要加强战略引领,加强改革创新,加强军地协同,加强任务落实,努力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航向、航程已明确,立体制、定格局、擘新图,军民融合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军民融合重大改革明显提速,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重点突破、集聚发展、合力推进等方面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 [1]佚名. 外媒: 习近平的“七项超越”[EB/OL]. [2014-08-06]. [2018-03-06] http://news.china.com.cn.2014-08/06/content_33163570.html
- [2]段金柱, 郑璜, 张静雯, 等.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曾赋诗: 爱我人民爱我军[EB/OL]. (2014-08-01) [2018-06-06].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4/08-01/6449250_2.shtml
- [3]习近平. 七律·军民情[N]. 福建日报, 1991-01-10(1).
- [4]鄢行龙, 尤华, 郭生教, 等. 支持国防建设就是支持经济发展——记福建预备役高炮师第一政委、福建省省长习近平[J]. 国防, 2015(1): 76.
- [5]周咏南. 习近平: 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推动全省国防动员建设[N]. 浙江日报, 2006-08-03(1).
- [6]田亮. 从首长秘书到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军旅生涯[J]. 环球人物, 2015(24): 12.
- [7]缪毅容. 习近平: 在更高起点推进上海国防后备力量建设[N]. 解放日报, 2007-09-14(1).

Probe the Form and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uan Dalong Xue Lian Tang Bo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or a New Era.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form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different stages on which comrade Xi Jinping, in charge of military and local leader, is engaged in work related to concrete activities towards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he paper shows tha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tting out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Xi Jinping grasp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economic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making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o become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refore a new situation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been formed. In the end, the paper conducts object tracking on the pattern of forming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eeply,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opens a new way and measurement to Xi Jinping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m

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及路径优化研究

——基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的分析

吴刚 刘晓惠 冉淑青

摘要: 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变动影响着经济规模实力的变化,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稳步提升市场主体成长力是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支撑。本文基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分析的视角, 构建涵盖市场主体增长指数、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数、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指数、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指数、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指数的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呈现差异化趋势特征, 并且市场主体成长力多项指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准。对标施策, 提出通过提升市场主体总量规模、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非公市场主体、引进外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对策措施, 促进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稳步增强市场主体成长力。

关键词: 市场主体; 成长力评价; 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98-07

一、引言

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提升发展实力是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支撑。据相关研究表明, 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变动影响着经济规模实力的变化。当前, 西部省(区、市)面临市场主体(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规模偏小、成长力相对较弱的突出问题, 加大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稳步提升市场主体成长力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路径选择。

二、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差异化趋势特征分析

市场主体成长力是市场主体成长所依赖的资源

和能力的重要体现, 由于各种要素对市场主体成长性的影响程度以及市场主体自身资源的异质性而不同。可以通过计算市场主体各项指标的增值情况, 来评判市场主体的成长力大小。基于工商登记信息数据分析的视角, 建构涵盖市场主体增长指数、活跃度指数、分布强度指数、投资强度指数、人口分布密度指数、经济贡献强度指数等不同维度的指标体系研判分析市场主体成长力。

据全国工商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数据反映,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总量为2088.28万户, 同比增长9.47%。分省(区、市)来看, 其中, 四川省市场主体总量427.35万户, 占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总量的20.46%, 优势地位突出。其他地区依次为云南257.92万户、广西216.55万户、贵州216.46万户、重庆214.41万户、陕西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地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力评测及路径优化研究”, 项目编号: 14BJL098。

作者简介: 吴刚, 男, 陕西凤翔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从事工业经济及新兴产业研究; 刘晓惠, 女, 陕西西安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事区域研究。

211.26万户、内蒙古174.66万户、甘肃141.66万户、新疆127.77万户、宁夏47.89万户、青海33.30万户、西藏19.04万户^[1]。如图1所示。目前,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呈现如下趋势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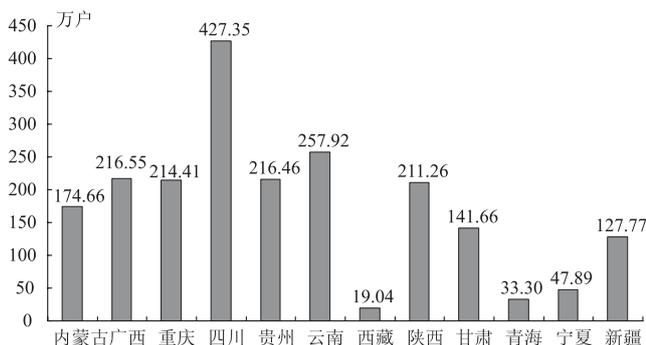


图1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总量分布情况

(一) 西藏、青海、新疆、贵州、宁夏市场主体保持超高速增长态势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同比增速分析显示:西藏市场主体增速23.49%、青海15.27%、新疆15.15%、贵州13.37%、宁夏13.05%,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2.37%),处于西部第一层次;重庆10.67%、甘肃10.65%、云南10.37%,市场主体增速均超过同期西部地区平均水平(9.47%),处于西部第二层次;陕西7.78%、四川7.18%、广西6.98%、内蒙古4.94%,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地区市场主体增速较为缓慢,预示着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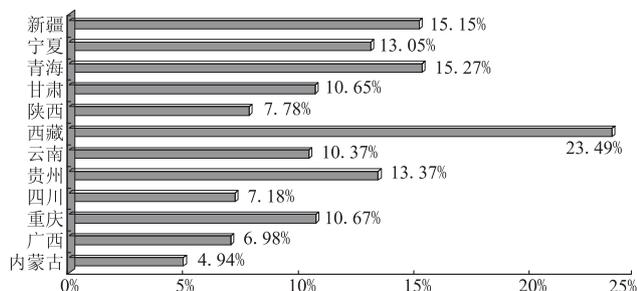


图2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增长指数比较图

(二) 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市场主体投资活跃度较高

市场主体活跃度QRI(Quantitative Relative Index)

是指某一段时间内进入市场的市场主体净户数与某个观察期间内存活市场主体总个数的比值^[2]。这一指数越高反映这一段时期区域内投资活力越强。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分析显示:西藏24.85%、青海21.47%、内蒙古21.05%、新疆20.10%、宁夏19.71%、广西19.32%,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8.97%),处于西部第一层次,这些地区投资较为活跃,市场主体增长能力较强;云南18.82%,市场主体活跃度略高于同期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8.47%),处于西部第二层次;甘肃18.37%、陕西18.30%、四川17.33%、贵州17.18%、重庆16.64%,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地区投资活力缺乏,预示着经济活跃度呈现下滑态势。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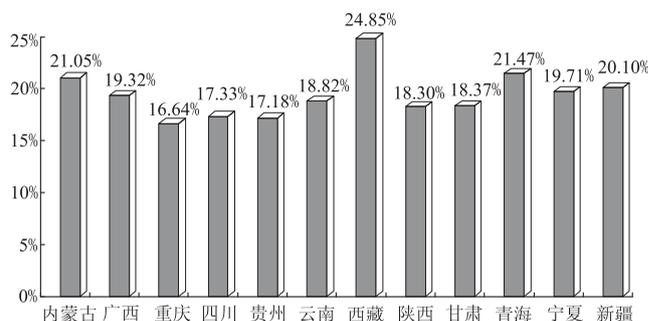


图3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比较图

(三) 四川市场主体总量全国占比较大,领先地位明显

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是指区域内市场主体数量所占全国份额的大小,通常情况下市场主体分布强度越大经济规模越大。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数分析显示:四川省市场主体总量占全国市场主体总量的4.91%,全国占比份额较大,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云南2.96%、贵州2.49%、广西2.49%、重庆2.46%、陕西2.43%、内蒙古2.01%、甘肃1.63%、新疆1.47%,处于西部第二层次;宁夏0.55%、青海0.38%、西藏0.22%,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地区市场主体总量相对较小,反映出区域经济规模也相对较小。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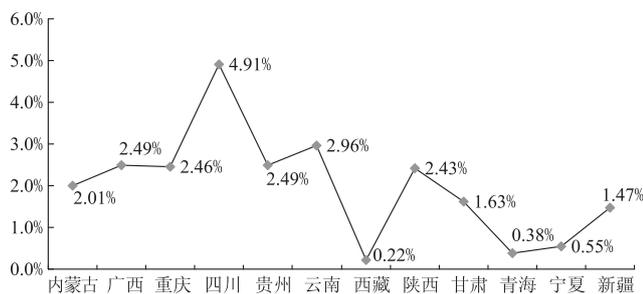


图4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数比较图

(四) 西藏市场主体投资规模远高于西部其他省(区、市)

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是指单位市场主体投资规模大小,通常用单位市场主体注册资本金来衡量。市场主体投资强度大小一定程度上体现市场主体质量水平。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指数分析显示:西藏市场主体投资规模为413.77万元/户,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266.92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一层次;青海258.29万元/户、宁夏254.28万元/户、陕西247.95万元/户、新疆237.53万元/户、内蒙古214.31万元/户、四川196.94万元/户,这些地区市场主体投资规模均高于同期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94.42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二层次;贵州192.98万元/户、重庆177.83万元/户、甘肃161.99万元/户、云南150.39万元/户、广西144.91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地区小微企业居多,市场主体投资规模尚待提升。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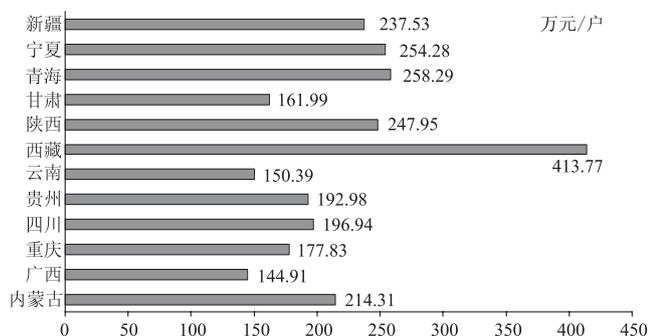


图5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指数比较图

(五) 宁夏、重庆、内蒙古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是指市场主体平均人口占有状况的指标,该指标反映市场主体在一定人口规模中分布的稠密程度。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分析显示:宁夏706.53户/万人、重庆703.35户/万人、内蒙古693.06户/万人,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629.59户/万人),处于西部第一层次;贵州608.88户/万人、西藏587.78户/万人、青海561.19户/万人,这些省(区)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均高于同期西部地区平均水平(559.21户/万人),处于西部第二层次;陕西554.11户/万人、云南543.94户/万人、甘肃542.76户/万人、新疆541.39户/万人、四川517.25户/万人、广西447.60户/万人,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省(区)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较低,预示着市场主体增长空间相对较大。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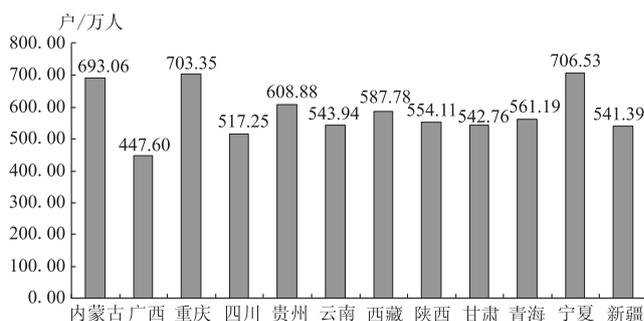


图6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指数比较图

(六) 内蒙古、陕西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是指市场主体对区域经济贡献能力大小的指标,通常用单位市场主体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分析显示:内蒙古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106.68万元/户、陕西90.72万元/户,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85.48万元/户),这些省(区)市场主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大,处于西部第一层次;广西84.25万元/户、重庆81.89万元/户、青海77.24万元/户、宁夏74.11万元/户、新疆73.11万元/户、四川72.11万元/户、贵州71.11万元/户、甘肃70.11万元/户、云南69.11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二层次;宁夏68.11万元/户、重庆67.11万元/户、青海66.11万元/户、新疆65.11万元/户、四川64.11万元/户、贵州63.11万元/户、甘肃62.11万元/户、云南61.11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三层次。如图7所示。

户、四川76.47万元/户、新疆75.27万元/户,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均高于西部地区同期水平(74.95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二层次;宁夏65.77万元/户、西藏60.29万元/户、云南57.65万元/户、贵州54.21万元/户、甘肃50.49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地区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相对较弱,预示着提质增效尚待持续发力。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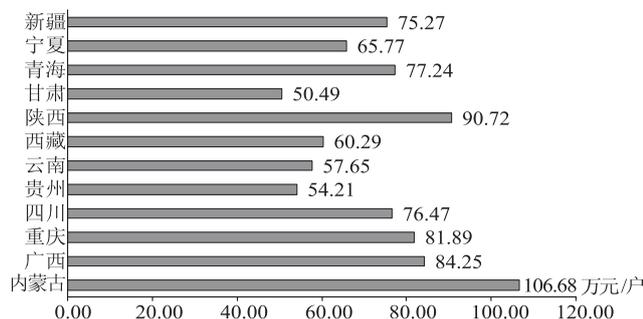


图7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指数比较图

(七) 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分布态势

依据上述分析,通过德尔菲法分别赋予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指标参考权重,并经过加权平均计算,得出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成长力排序如下:

西藏为0.714分,市场主体成长力西部排位第一,其后依次为内蒙古0.683分、四川0.659分、陕西0.648分、重庆0.642分、新疆0.633分、青海0.623分、宁夏0.604分、贵州0.587分、广西0.577分、云南0.572分、甘肃0.514分。如表1所示。

三、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提升面临的突出问题分析

对标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多项指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主体成长力尚待进一步加强。截至2016年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总量2088.28万

表1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成长力对比情况

	市场主体增长指数(0.16)	活跃度指数(0.14)	分布强度指数(0.16)	投资强度指数(0.15)	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0.14)	经济贡献强度指数(0.25)	市场主体成长力综合分值	排名
内蒙古	0.034	0.119	0.065	0.078	0.137	0.250	0.683	2
广西	0.048	0.109	0.081	0.053	0.089	0.197	0.577	10
重庆	0.073	0.094	0.080	0.064	0.139	0.192	0.642	5
四川	0.049	0.098	0.160	0.071	0.102	0.179	0.659	3
贵州	0.091	0.097	0.081	0.070	0.121	0.127	0.587	9
云南	0.071	0.106	0.097	0.055	0.108	0.135	0.572	11
西藏	0.160	0.140	0.007	0.150	0.116	0.141	0.714	1
陕西	0.053	0.103	0.079	0.090	0.110	0.213	0.648	4
甘肃	0.073	0.103	0.053	0.059	0.108	0.118	0.514	12
青海	0.104	0.121	0.012	0.094	0.111	0.181	0.623	7
宁夏	0.089	0.111	0.018	0.092	0.140	0.154	0.604	8
新疆	0.103	0.113	0.048	0.086	0.107	0.176	0.633	6

户,仅占全国总量的23.99%,同比增长9.47%,低于全国市场主体平均增长水平2.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为18.4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投资强度为194.42万元/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2.5万元/户;西部地区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为559.21户/万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0.38户/万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为74.95万元/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53万元/户^[3]。进一步分析,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提升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 高质量市场主体数量相对较少

与个体工商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非企业相比,企业在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能力突出,对区域发展贡献较大,企业是重要的高质量市场主体^[4]。从企业所占区域市场主体数量比重分析来看,2016年西部地区仅有重庆31.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82%,其他省(区、市)均低于全国均值。依次为广西26.99%、陕西26.65%、宁夏25.43%、四川24.64%、西藏22.45%、青海22.34%、云南21.18%、贵州21.06%、新疆21.04%、甘肃19.97%、内蒙古

18.74%。从企业数量增幅来看,2016年全国企业数量增长18.77%,西部地区仅有西藏、青海、云南、新疆、宁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比增幅分别为45.95%、26.51%、21.72%、19.01%、18.90%;而贵州、甘肃、广西、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幅分别为18.15%、16.64%、15.49%、15.05%、14.28%、13.41%、9.45%。

(二) 非公市场主体发展较为缓慢

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体现着区域发展市场活力^[5]。从非公市场主体在区域市场主体中所占数量比重分析来看,2016年全国非公市场主体所占比重为97.28%,西部地区仅有重庆、宁夏、云南、甘肃、内蒙古、陕西、贵州非公市场主体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98.26%、98.17%、97.93%、97.86%、97.80%、97.64%、97.60%;而四川、新疆、广西、青海、西藏非公市场主体所占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97.14%、97.02%、97.01%、96.91%、96.22%。从非公市场主体同比增幅来看,2016年全国非公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1.24%,西部地区仅有西藏、青海、新疆、贵州、宁夏非公市场主体增幅高于全国水平,分别为18.51%、13.51%、13.30%、11.82%、11.60%;而甘肃、重庆、云南、陕西、四川、广西、内蒙古非公市场主体增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9.92%、9.82%、9.47%、7.56%、6.93%、6.79%、4.67%。

(三) 外资企业极为短缺

西部地区外资企业普遍数量少、实力弱,外向型经济发展能力较弱。从外资企业所占区域市场主体数量比重分析来看,2016年全国平均水平0.58%,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依次为陕西0.28%、重庆0.26%、四川0.24%、广西0.21%、内蒙古0.19%、云南0.16%、甘肃0.15%、宁夏0.14%、青海0.13%、新疆和西藏0.12%、贵州0.07%。从外资企业增幅来看,2016年全国平均水平为4.98%,西部地区仅有内蒙古、宁夏、重庆、青海、西藏、新疆、广西外资企业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3.31%、11.47%、10.90%、8.91%、6.79%、6.50%、6.41%;而云南、陕西、四川、甘肃、贵州外资企业同比增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4.77%、-1.06%、-2.11%、-2.39%、-9.09%。

(四) 传统产业数量大改造升级挑战艰巨

从市场主体产业类型分析来看,2016年西部地区批发零售、农林牧渔、租赁和商务服务、建筑、传统制造等产业仍然占据绝对主体位置,电子商务、文化创意、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新业态数量少、发展滞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任务艰巨,新旧动能转化步伐缓慢。

四、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提升路径策略选择

(一) 市场主体总量规模提升路径

西部地区市场主体主要指标均落后于全国水平,市场主体总量规模提升尤为必要和迫切。一是继续优化政策措施,积极培育更多的企业主体,重点培育发展资源禀赋突出、引领作用较强的龙头骨干企业、创新型企业,增强市场主体贡献能力。二是大力实施“个转企”工程,积极引导帮扶个体工商户转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畅通绿色通道,确保“个转企”顺利过渡^[6]。三是加大引导农业科技人员、专业种养大户、返乡创业人员组建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家庭农场,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基地、种养基地、农家乐休闲基地,培育根深苗壮的现代农业市场主体^[7]。

(二) 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发展路径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置换的市场空间需要大量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四新”市场主体填补。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加大“四新”市场主体超常发展。一是系统推进新兴主体、载体建设、重点项目、产业投融资、政策与服务环境融合互动,共同激发“四新”经济发展活力。创新“四新+基地+基金”的载体建设模式,推进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四新”产业集聚基地建设,加速孵化“四新”主体,形成梯队,孵苗成林^[8]。二是聚焦“四新”领域,推进智能制造、精益制造、绿色制造及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引导转化过剩落后产能,引导生产要素向高端、高附加值环节配置^[9]。三是建立“四新”经济协同推进模式。围绕“主体、载体、项

目、投融资、环境”建设,制定“四新”主体培育成长计划,搭建政府、企业、投资机构面对面交流“四新”经济发展平台,建立和完善涵盖“四新”的市场主体扶持政策,促进“四新”市场主体超常发展。

(三)非公市场主体培育发展路径

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劳动就业、增加税收、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目前,西部各省(区、市)非公经济所占份额较小,支撑能力薄弱。一是进一步深化细化“放管服”各项政策举措,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非公企业真正分享政策红利。二是积极探索向民间资本开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新途径、新模式,让非公企业享受更多的盈利可控、回报预期显著的项目^[10]。三是大力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培育发展更多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平台,破解非公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激发非公市场主体发展活力^[11]。

(四)外资企业培育发展路径

西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发展仍然处于落后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极为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较弱。随着国家新一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战略实施,以及重庆、四川、陕西自贸区的获批,西部地区开放平台、政策环境进一步趋好,开放促发展机遇良好。为此,加大外向型产业培育,拓展外资利用新方式,加快培育发展新优势。一是主动作为,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吸引国际商务、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离岸服务外包、国际认证检测、期货保税等产业在西部落户^[12]。二是积极拓展利用外资方式,鼓励现有外资企业以利润再投资、增资,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实现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突破。三是搭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城市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深化产能合作^[13]。

(五)全面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

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政府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区域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并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包括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基于自愿的初始投资、扩大投资、并购投资等投资经营行为及其他市场进入行为^[14]。按照国家整体部署,2018年全国将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一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大范围内推广复制自贸区相关制度创新成果,促进外商、非公投资准入的开放度、便利度、透明度。二是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规定,结合西部各省(区、市)资源禀赋、优势产业,梳理和制定适合本区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规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权责和标准,建立和完善清单公开制度,创新公开载体和形式,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新途径,不断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三是加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宣贯和解读,推进建立第三方政策跟踪评估、实施效果反馈预警长效机制,营造市场主体培育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五、结论

本文基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分析的视角,构建涵盖市场主体增长指数、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数、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指数、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指数、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指数的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德尔菲法分别赋予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指标参考权重,经过加权平均计算,对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进行量化排序,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多项指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主体成长力尚待进一步加强。针对高质量市场主体数量相对较少、非公市场主体发展较为缓慢、外资企业极为短缺、传统产业数量大改造升级挑战艰巨等突出问题,规划设计了市场主体总量规模提升、新产业新业态培育、非公市场主体发展、外资企业培育、良好营商环境营造等路径。

参考文献

- [1]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016年陕西工商登记信息报告[EB/OL]. (2017-1-15) [2017-3-20] <http://www.snaic.gov.cn/>
- [2]马建堂. 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EB/OL]. (2016-07-19) [2018-01-09]<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719/c148980-28567151.html>.
- [3]李耀新. 上海: “四新”经济成发展新亮点[N]. 光明日报, 2015-09-27 (2).
- [4]任杰. 新常态下青海省培育和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研究[J]. 攀登(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6): 102-105.
- [5]周端明. 中国产业升级研究: 文献脉络与评价[J]. 产业与区域经济管理, 2014 (1): 34-40.
- [6]陈芳.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 河南农业, 2014 (1): 8-9.
- [7]江维国. 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创新的战略构想[J]. 农业经济, 2014 (3): 62-64.
- [8][9]杨雪峰, 李维昆.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主体培育[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3 (4): 64-67.
- [10]李建锋. 改革创新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J]. 商场现代化, 2013 (30): 177.
- [11]邢善芳, 赵惠芳. 东部三大经济区域产业升级能力评价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 16-21.
- [12]X Zhu. 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2 (4): 103-124.
- [13]CH Yang, HL Lin. Opennes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12 (2): 333-355.
- [14]S Chen, G H Jefferson, J Zhang. Structural change,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 (1): 133-150.

The Research On The Growth Capacity Evalu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Market Subje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data based o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Wu Gang Liu Xiaohui Ran Shuqing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Market Entity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scale strength, so fostering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subject and steadily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subject are the basic supports of tamping down the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round way.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arket subject growth capacity evaluation including growth index, activity index, distribution intensity index, investment index,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density index, economy contribution index. And many indexes among market principle growth force lag behind the standard of national averag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subje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steadily strengthen the market by upgrading the total quantity of market subject, cultivating new industry, developing non-public market subject, introducing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 and creati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Market subject; Growth Assessment; Path study